



教授妈妈 亲子三书

父爱如山

李振霞◎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爱如山 / 李振霞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
（教授妈妈亲子三书）
ISBN 978-7-121-24751-4

I. ①父… II. ①李…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8569号

出版统筹：李朝晖
责任编辑：刘娴庆
文字编辑：任婷婷
责任校对：杜 皎
营销编辑：王 丹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3.75 字数：19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目 录

自 序 天下最好的爸爸	1
第一章 融融的父子情	1
父爱子女情意深	3
用生命换来的牛奶	10
让孩子感受最真诚的爱	13
抓好孩子启蒙的金钥匙	15
协助妈妈喂母乳	20
平等商谈不霸道	23
不把坏心情带回家	29
再苦也要笑着说	34
暖水瓶爸爸	37
第二章 强烈的责任心	41
细微处见精神	43
不做“甩手掌柜”	46
百善孝为先	48
自己的孩子自己带	52
撑起家庭的重担	56



父爱如山

教子养伤不忘读书	61
尽一切可能让孩子读书	64
热心关爱第三代	69
建立稳定的大后方	72
第三章 耐心好“家教”	77
养成学习的好习惯	79
像萤火虫一样照亮别人	82
和孩子谈话有诀窍	85
不怕别人问	91
家有藏书胜黄金	93
玩中乐、乐中学	96
什么才是真正的偶像	100
舍得让孩子吃苦	103
两耳需闻窗外事	106
与孩子分享成就	108
时间都用来读书了	112
第四章 “修身齐家”的顶梁柱	115
知子莫若父	117
家里的第一“小提琴”	121
适当开开小灶	124
教孩子恋爱	127
变化再多，也要计划	132
不用“铁腕”治孩子	135
给自己加压	140



爸爸开刀不叫痛	143
走自己的路	146
每个孩子都应该会劳动	149
精打细算过日子	152
教孩子做人	155
 第五章 快乐的“老教练”	 161
带孩子玩的“大哥哥”	163
注意锻炼孩子的胆量	165
勇于自我批评	168
别让神经绷太紧	171
小病小痛不是事儿	175
鼓励孩子玩游戏	179
学一样，精一样，狠练基本功	186
学习与健身要兼顾	189
和孩子一起增强体能	193
让孩子自幼经受各种“洗礼”	196
搞好素质教育，让孩子全面发展	199
 后 记	 203





父爱如山

自序 天下最好的爸爸

2001年3月份，我写的书《我家走出四博士》出版以后，先后有十七个省、直辖市请去到四十多个地区，做了一百三十多次巡回演讲。每次课堂，大家反映和我所看到的情况是来听讲的人妈妈居多，爸爸很少。散了会，买书、“抢书”，也都是妈妈冲在前面；挤到台上恳请我签名的也都是妈妈，爸爸寥寥无几。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有的听众，当然也是妈妈，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应该讲讲爸爸，讲讲爸爸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责任。有的听众还建议让四个博士的爸爸也来讲一讲。后来，博士爸爸也尽可能参加了一些这方面的活动，但这个问题却始终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里。

我讲课的题目是“成才与家教”，重点是介绍我家的四个博士儿女成才的家教经验。我一直认为，家庭教育是父母双方共同的责任。在我家，孩子爸爸的责任心是非常强的。凡是家长会及其他有关孩子们的会议、报告，他都同我一起参加。可是，在我面前的听众中，每位妈妈背后的那位爸爸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在家里是否负起了做爸爸的责任？

这确实是家庭教育中值得注意和关怀的一个大问题。

我希望，每个孩子的爸爸都是关爱孩子、教育孩子、责任心很强的爸爸。怀着这种期盼，我总结了我家四个子女教育中的父教经验。我希望，天下的父亲都能成为一个好爸爸。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爸爸，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标准



父爱如山



金春明教授，1989年摄于德国德累斯顿市

各不相同，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著名古代通俗人生百科《三字经》中讲得很泛：“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里提出了爸爸有教育子女的责任，而且提得很高、很重，同教师的责任并列。这恐怕是古往今来千古不易的通理。严格说，一个不想承担教育子女责任的爸爸，不仅不是一个好爸爸，而且从根本上丧失了做爸爸的资格。《三字经》里讲的“教”，自然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当时是上私塾或请家教）。但说教得好不好，责任完全归咎于老师，这在我看来是不够恰当的。爸爸对孩子受教育的效果，也同样有责任。应该说，《三字经》中对这点是没有忽略的。在这两句话之前，就举出一个例子加以强调：“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把子女教育好当然是父母的荣耀，但首先是责任。不教育，没有适宜的方法，哪里能够



“名俱扬”呢！

一篇以生动事例论述古代贵族如何对待子女教育的著名文章《触龙说赵太后》流传很广。这篇文章中的一个观点至今仍是颇有价值的，叫作“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所谓“深远”，就是要看得深一点、远一点——不但要关注眼前吃得好一点、穿得漂亮一点、玩得痛快一点，而且要考虑到子女们一生如何处世为人、建功立业，为社会做贡献。因此，触龙特别不赞成贵族子弟“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这里说的“重器”是指权力，也可以说是贵族的特权。他认为这种无功的位尊与权力、无劳的厚俸和过多的物质享受，不仅会危及子女身心和整个家族，而且会祸及子孙、殃及社会。所以，触龙主张做长辈的不要总把子女掩护在自己的羽翼下，要及时支持子女自立，尽可能地创造机会，放手让他们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在这篇文章里，触龙要劝说的主人是赵太后，是长安君的母亲，虽是女人，但却是赵国当朝的主事人。因而，文章所说的道理对于任何要做一个家庭主心骨的爸爸，应该也是适用的。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精华，是值得很好学习和继承的。

但是，我也听到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这些老道理已经过时了，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分工很细，教育也已经产业化了。做爸爸的只要能挣钱就行了，只要有钱，就不难找到合适的场所、优秀的教师；有了教师，就可以把子女教育的全部责任都承担起来。像西方的什么“伊顿公学”之类，从小学教育到大学教育一概都承包了，那多省事又省心啊！也有个别师范学校的教师说：“你们只要把小孩养到六岁，胖胖的，以后的事就全交给我们了。”

我听后十分怀疑。父母对子女们的爱心、亲情、关怀、诱导、开智和身教等，难道是用大量的金钱，或者是某个能干的老师完全代替得了的吗？教育是要投入心血与精力的，是钱能够替代的吗？家庭教育对孩子难道是有可无的吗？所以，我不认为这种以“家教现代化”为口实，把家庭教育全部



父爱如山

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基础、委托他人的教育理念是正确的，不相信这样的模式会成功地培育新中国的第四代、第五代。

让我们回到本题上来，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怎样才算一个好爸爸？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我先生的经验和他自身的体会，以及其他好爸爸的示范，起码应该做到三条：

第一，尽最大努力保证孩子们生长发育的基本物质需求，让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身体是人一生活的物质载体，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多的知识和技能也是无用的。这一条在今日之中国对大多数人已无困难，但在我们孩子生长发育的年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却是颇不容易做到的。当然，今天也有今天的问题，如营养失衡、肥胖症等，所以我提“基本物质需求”。

第二，保证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灵和乐观的性格。孩子心灵的培养，不只是个别家庭的问题，而是会受到社会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家庭对孩子健康心灵的培养无疑处于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位置。精神疾病在某一个家庭里常常是多发的，就是一个证明。心理不健康，可能会导致心理失衡、抑郁、多虑、失眠，甚至精神病。当然，精神病患诱因颇多，有先天性的，也有遗传因素的区别，并非都是由心灵不健康引起的，但家庭环境是重要因素。而为人父者，作为孩子们的第一个也是终身的教师和榜样，地位重要，责无旁贷。

第三，为孩子们建立一个立身社会的基础。尽最大努力保证他们的受教育权，培养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帮助他们完成基本的学业，掌握一技之长，并鼓励他们拥有各种健康的业余爱好。

我想，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灵，必要的文化准备，这三条是缺一不可的。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才能使孩子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作为父母，才能算是起码有了对子女的“深远”的爱。这三条说来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因而都要爸爸和妈妈的共同努力，而其中爸爸的责任尤重。所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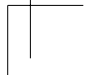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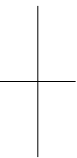
想它应该成为判断是否是一个够格的好爸爸的基本标准。

美国出了一个对孩子严厉得被人指责为虐待的“虎妈”，曾著有《虎妈战歌》。时隔不久，中国又走出一个“狼爸”，自称“打孩子”是他家教中“最精彩的部分”，并著有《所以，北大兄妹》一书。四个子女中有两个同时考上北京大学，于是，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狼爸”。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荣誉”称呼，并且说自己是“天下最好的爸爸”。

上面我谈到的做一个好爸爸的三条基本标准，看似简单，要想真正做到却需要下真功夫，千方百计做实事。这不是靠摆摆父道尊严的架子，板起一副神圣威严的冷面孔，动辄训斥甚至体罚，讲什么“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成器”等貌似正确的歪道理，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以爱为基础的深切关怀，巨大耐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千方百计地诱导和采取适宜的方式才能做到的。有人说，好爸爸不仅是好老师、好保镖，还得是好朋友、好哥们儿。对此，虽然大多数人都难以完全做到，但这多种身份的形象说法，作为对一个好爸爸的基本认同，大概不会遭到绝大多数父亲的反对吧！

下面结合四个博士的爸爸的大部分生活现实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其他人的个例，特别是对于现在已经做了爸爸的三位博士儿子的少许了解，谈谈我对“做个好爸爸”的看法，供有兴趣的朋友们参考。

写于2004年春，修改于2014年春





第一章 融融的父子情

人的爱应该是大自然里一种最高级的爱，而且在父母对子女的爱中，不应该具有父母的自尊、利己和虚荣的打算。父母应该首先把儿童当作一个未来的人去爱，因此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基础不应该是对自己的爱，而是对真理和对人类的爱。

——俄国哲学家别林斯基





父爱子女情意深

亲子之爱在离别时，常常表现为对子女可爱形象割舍不断的思念，以及日夜盼望早日拥抱亲吻的急切心态。

可是“狼爸”却与众不同。他每当出差时，都让孩子妈妈记下四个子女所犯的错误，并在电话中或见面时一一汇报，作为他到家后立即严惩子女的凭据。他说：“常年出差在外的我，无暇抽出全部时间来关注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孩子想趁我出差时‘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思完全无法实现。一旦他们触犯了任何‘清规戒律’，妻子就会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消息、细节都汇报给我，而犯了‘戒条’的孩子们就只能等着我回来乖乖受罚。”^①

我家孩子的爸爸同孩子离别或分处两地时，和“狼爸”迥然不同。他从未向在孩子身边的姥姥、舅舅查问过女儿犯过什么错误、犯过哪条“戒律”。

我们的大女儿金莹，是1956年我在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时诞生的。当年我先生二十四岁，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为了读书，孩子只好请哈尔滨的姥姥代为抚养。1957年底回沈阳工作后，我们把女儿接回来，姥姥也一道来了，继续帮忙照看。1958年，我哥哥、嫂嫂被哈尔滨市委下放到通河县工作，姥姥需要回去照顾孙子和孙女。我当时要教全校各系的哲学课，我先生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工作，两人都无法在家照顾宝贝女儿。没

^① 萧百佑：《所以，北大兄妹》，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本文所选“狼爸”语录均选自这一版本，下不赘述。



父爱如山

有办法，我女儿只好和姥姥一起随同从哈市下放的舅舅、舅妈来到了通河县。

“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家里经济紧张，但思儿心切，1960年年底我曾到通河县去看过一次女儿。

1961年4月，我们从沈阳被调来北京，到中共中央党校教书。自此，我先生就开始积攒路费，每年夏天都要回去看女儿。当时我身边有大儿金煜，虽然已上幼儿园，但接送离不开大人，只能让我先生一个人踏上看望女儿的北国之旅。由于生活拮据，先生从北京上火车就坐硬座，一晚上都没合眼，第二天下午才到哈尔滨。

因哥哥全家已经从哈尔滨迁走，举目无亲，我先生立刻跑到松花江边的码头，去买船票。但是，当天的船已经全部开走，只有第二天早晨才有船回来。当时也不预售船票，据说半夜12点才开始售票。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在候船室等。

那时候的候船室面积不大，人又很多，长椅早被占满。我先生只好找块地，铺张报纸躺下，用一个帆布小包作为枕头。

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当时那个样子，就像今天的农民工进城一样，往地上一躺，很可怜。”

深夜12点多钟，船来了。

他站起来观望，意外的是，从下船的人当中发现了我的哥哥。

哥哥高兴地问：“怎么在这里碰上了，你上哪儿去了？”

我先生也格外兴奋地说：“我上通河看你们和孩子啊！”

哥哥说：“小萤不能先到通河，现在她在木兰县的舅奶家。”

得知他还没有买到船票，哥哥急忙带他上码头售票站，找熟人买了一张票。

后来又问他：“你住在哪儿？”

他说：“没处住。”



哥哥又带他到附近的招待所，找了一个大木板床的房间，两人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把他送上船，船开走，哥哥留下了。哥哥是来哈尔滨办事的。他原来是哈尔滨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这个时候已经下放到黑龙江省通河县任县委宣传部长。

从哈尔滨到通河，要经过木兰，往返只有两个很小的破旧的轮船。我先生到船上一看，舱里没有铺位，只有长条凳子，早已被人坐满。他只好到外面，把船的甲板当座位了。旧轮船像牛车一样走得很慢，他只能耐心地熬时间。

傍晚，船终于抵达木兰。到了木兰街上一看，这哪是什么想象中的县城，完全是一个很破旧的小村庄，路不像路，巷不像巷，没有街道与门牌号。这怎么去找？我先生四处打听了好一阵子。幸亏小萤的舅爷是木兰县的老住户、砖厂的烧砖技师，在当地知名度比较高，很多人都认识他。一个热心人把我先生带到舅爷家。但是一进屋，他只看到舅奶一个人，没有看到女儿，心有点凉——可能孩子又上哪一个亲戚家去住了，说不定还得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找到女儿。

就在这个时候，舅奶的儿子跑了进来，知道我先生的来意后说：“小萤在松花江边玩，我带你去。”我先生顾不上歇息，立刻随同他去看女儿。

他一到岸边就喊：“小萤，爸爸来了。”

女儿回头，看见了爸爸，两只小手一张，喊着“爸爸，爸爸”，飞快地跑过来，让爸爸抱。

当年，她已经五岁了，长得很胖，满身是肉。我先生当时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又在路上奔波劳累，身上好像一点儿劲都没有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把她抱起来。虽然一心想把孩子抱着走回来，但无能为力，他只好蹲下来亲亲女儿。

女儿搂住爸爸的脖子，不肯放手，问：“爸爸，你这回不走了吧？”

我先生很巧妙地回答：“咱们在这儿再玩上一周，然后一起到通河去看姥姥。”



父爱如山

小姑娘听了这话，好像比较满意，就让我先生牵着她的小手回到舅奶家。因为女儿是特意到舅奶家玩的，才来不久，所以爸爸不能立刻领走她，于是陪她在木兰玩了一周。

每当带女儿出去逛木兰码头前唯一的一条小街时，她总要一种饮料喝。一开始，爸爸问她：“要什么？”

她说：“要砖名汤。”

我先生很奇怪，怎么还有这种东西，是不是饮料的盒子像块砖？后来就带她到小卖店，没承想她指的是一个大玻璃瓶子里面装的水，底下沉了很多酸梅，上面贴着一张纸，写的字是“酸梅汤”。这是当时的中国偏远县城里能买到的唯一饮料。

我先生笑出声来说：“你怎么把‘酸梅汤’叫‘砖名汤’？”接着反复教她说“酸梅”两个字，孩子怎么也学不会，一直说“砖名”。孩子重复的话始终是“砖名汤”。

我先生这个时候，忽然感觉心里一颤：“难道孩子是‘大舌头’？‘酸梅汤’和‘砖名汤’怎么也分不开！”女儿已经五岁，快上小学了。老师教字这样费劲，真愁人，怎么办？爸爸当时没有向孩子说，怕影响孩子情绪。

“真愁人，怎么办？”这种话在“狼爸”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打。他说：“我妈妈怎么打我的，我就怎么打我的孩子。”他还说：“我常对儿女们津津乐道的，便是母亲的打文化：拿不到满分，打，差一分打十下……”“狼爸”这样说他打的情形以及孩子们的看法：“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就是古代拿着教鞭的教书先生，一个不小心，读错一个字，那教鞭就会狠狠地挥过来。”按照“狼爸”的做法，校正金萤的发音，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一下一下地抽打了！

没有想到，我先生没打也没骂。我们的女儿金萤回北京上了小学后，说话逐渐清晰，普通话也讲得字正腔圆，而且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优秀生。



我先生当时的忧虑和困惑，没有说出口，不过还是很高兴地给孩子买了酸梅汤。虽然只有三分钱一碗，孩子却喝得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和爸爸到江边玩去了。

一周过后，我先生带女儿上路。坐的还是那种旧轮船，但由于有朝思暮想的女儿在身边陪伴，他不再感到漫长和孤寂。两个人欢欢乐乐地到了通河，去看望孩子的姥姥。

在木兰的松花江畔，每次看到爸爸钓上鱼来，女儿都开心得蹦蹦跳跳。看到女儿高兴的样子，我先生也非常开心。

在通河县和女儿虽然玩得十分开心，但时间也不能过长。因为这是借暑假回去的，时间有限。而且开学前，我们当教员的需要提前上班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

在从通河返回哈尔滨时，船上给每人提供一顿午餐。按当时的规定，在长途客运途中吃饭，只要钱票而不要粮票。当时，因为人们的口粮定量很少，手里的粮票不多，有一顿饭不要粮票，就很高兴了。

而我先生当时把回京的路费钱装好后，外边只留下一张五元票。当时，五元的整票已经是大票了。他用这张五元的票子买了午餐，买完后找回四元多。没想到被人盯上了，下船时只觉得别人使劲地挤了一下，他当时以为人多下船，碰撞难免，没想到是被小偷光顾了。

到火车站去买车票时，他从里面衣兜掏出了准备返京的火车票钱，买了车票后想去吃点晚餐，可一摸衣兜钱全没了，只有上衣的左兜还剩五角钱。我先生想，回北京从火车站到中央党校路很远，要坐公共汽车，中间还得在西直门转车，这点钱只够坐公共汽车了。所以他只好饿着肚子，乘上火车，坐了一宿零半天的硬座才到北京站。

到家后，他和我讲述了路途中的经历：“多亏去的时候，你把给姥姥带的



父爱如山

一百多元钱缝在里面的衣兜了，不然，可能也会丢。剩的钱又分散在了每个衣兜里。即使丢了一点，也能维持到家。”我先生在困难时总往好处想，也让我很感动。

我看他疲惫不堪，十分憔悴，便立刻打点他吃饭、休息。但是，他在睡前还高兴地说了一句：“虽然路上很累，但最终看到了女儿，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我先生和我一样，很爱孩子。大女儿金萤是“上帝”带给我们的“小千金”。

我家四个博士子女的教育，之所以比较成功，其基础就是我和我先生对孩子深切的爱。这种爱又传承给后代，我们的子女对他们的子女也爱得十分深切。

一位大教育家形容说，没有爱的教育，是空虚的。在亚米契斯《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我国著名教育家夏丏尊非常形象地说：“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名人家教集锦》，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94 页）

我先生和我教育孩子，是一以贯之的，从没有什么朝三暮四的情况，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情、有爱。最近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散步，回忆起一件一件的往事。我先生说：“那次去看小萤，是我生平外出最狼狈的一次。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就是那种经济状况，而且想孩子想得厉害。你去看她的时候，我当时工作忙，脱不开身，可是一直想去看女儿。想孩子嘛，就要吃一点苦，付出一点代价。”

我们的几个博士儿子，继承了他们爸爸的好传统，在家里建立了“有水的池”，深情地爱着他们的宝贝女儿。在我家看不到任何重男轻女的现象。大儿子金煜称他的女儿安妮是自己的“小棉袄”，关怀备至。二儿子金侠的爱女



卓安娜在一周岁前，夜里哭闹，他经常抱着女儿满地走，把女儿看成爸妈的“小公主”。三儿金延，由于孩子妈妈既工作，又攻读学位，他对自己爱女的吃喝拉撒睡无所不管，且声称艾米是“我的心肝、宝贝”。这三个儿子像他们的爸爸一样，都是我们全家公认的好爸爸。

金家的三位博士儿子和他们的父亲金春明教授一样对子女爱得深切，使我们联想到“狼爸”宣扬的所谓对子女教育的“成功”范例。不同的父亲给予孩子的童年迥然不同：一个给予了孩子如天上人间、阳光灿烂的欢乐的童年；一个给予孩子“彻底失去了乐趣”的童年。正如萧尧所述：“尽管当时一个字的意思都不明白，但那些《三字经》《论语》却也让我们兄妹在懂与不懂之间明白了道理。尽管如此，但是当时的我们四兄妹，却的确在‘苦难’中成长着，那没有自由的生活，已经让我们的‘童年’彻底失去了乐趣。”



三儿金延教他的小宝贝艾米摄像

金教授和女儿金萤的父女深情，闯入人们眼帘的是，毫不夸张的那种厚重如山的情谊。五岁的金萤，和爸爸在一起，愉快而又幸福地享受着父爱。



用生命换来的牛奶

千方百计满足孩子生存的需要，这既是一种舐犊之情，也是为人之父的基本要求。

可是，“狼爸”却规定孩子不能随便开冰箱，他说：“现在的‘90后’大概从小开始，饿了就能打开冰箱翻寻吃的喝的……”而狼爸则规定“想开冰箱，必须先问过父母”。有一次在小笼包子铺前，萧尧饿了，吃一个同学送的小包子，被爸爸发现了，竟受到惩罚。书上写道：“那个正往嘴里塞着小笼包的孩子，不是我儿子又是谁？！我一个箭步就跨到了他的眼前。”“狼爸”问他：“你哪来的钱？”回答说：“我就是……饿了……同学说请我……”然后回到家挨了一顿揍，“狼爸”竟然在书上说“回到家中，惩罚是必需的”。

每当读到这儿，我多次联想到我先生为了不让孩子饿着，用生命取回儿子的一瓶牛奶，骑自行车差一点和大汽车相撞的危险情景。

这件动人的事情，牢记在每个孩子的心里。

1991年9月，我的心快乐得好像总是在歌唱，家中出现了令人不敢想象的喜事。大儿金煜和二儿金侠一起登上世界名校的“珠穆朗玛峰”：一个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一个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人热情地邀请父母到英、美一聚。

1992年在英国那段日子，金侠依然每天早晨匆匆吃完早餐就去上课，学习与研究十分紧张，有时一个课题实验要做到深夜，回家已经十分疲惫了。



可是，一到周末，他还和儿媳亲自驾车陪我们到伦敦参观，凭吊马克思墓地、参观大英博物馆、到著名的蜡像馆同世界名人合影，还游览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城。9月，他和儿媳又特意请了一周假，驱车千里，陪我们横穿英伦三岛，到苏格兰浏览异域风情。

离别之时，我心疼地对儿子说：“老三，爸爸妈妈来得真不是时候，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妈妈，您不能这么说呀！”金侠眼里噙着泪花，“小羊尚知跪乳，乌鸦还知反哺。为人子孝敬父母，天经地义！”

“爸爸妈妈花了你们不少积蓄，往后你们的日子会过得很紧巴。”

“你们一生为我们四姐弟付出的岂止是钱！”金侠哽咽了。他想起了妈妈讲过的六十年代初父亲舐犊情深的惊险一幕。

那是1960年一个多雪的冬天。由于经济困难，食品匮乏，大儿子金煜从吃母乳渐渐喜欢喝牛奶了。然而在当时，订牛奶很不容易。在我们住的沈阳市北陵的居民区订不到，只好由我先生在工作的省委机关里想办法订一份。辽宁省委机关和我家相距很远，在正常上下班的时候问题还不大，但碰到在别的地方开会时，不管多晚到家，都必须专门骑车去机关为大儿子取牛奶。

有一次大雪路滑，狂风卷着大雪，将他卷到马路中间，一辆大卡车疾驶来，他大叫一声，摔倒在地。司机急刹车，车子在离他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一场虚惊过后，瘫坐在地上的他第一个动作是用手摸摸大衣兜里的牛奶瓶，晓得完好无损，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说“不然宝贝儿子就要挨饿了”。

岁月如梭，流年似水。1998年秋天，我们夫妇与四个博士子女在美国旧金山金煜的寓所里，实现了全家十五口人十载难逢的大团圆。为了使我家老少会师美洲大陆，已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的金煜，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并以按揭贷款的方式购置了一套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花园



父爱如山

洋房住宅，新添了两辆轿车，激情满怀地接待父母来美国探亲。欢聚之时回首往事，不胜唏嘘。当谈到这次取牛奶险些被撞之事时，我先生说：“幸亏司机眼疾手快，不然真要为一瓶牛奶而付出血的代价了，也就很难有今天的幸福团聚了。”不记得哪位孩子说：“好人上帝总是会保佑的。”



爸爸为儿取奶遇惊险

在暴风雪中，爸爸的自行车被刮到，几乎被迎面来的大卡车夺走生命，可他刚回过神来，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自己是否受伤，而是怀揣的奶瓶洒了没有，儿子金煜是否还有饭吃。“数九寒天，孩子饿着肚子，会格外寒冷。”这件事已经成了我家大人和孩子永生难忘的记忆。



让孩子感受最真诚的爱

不顾自己的温饱，从自己口粮里省出粮食喂养孩子，这是许多父母在饥寒中都能做到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那种情况很难再发生了。然而，有的爸爸却故意为自己的孩子制造一种不该发生的情景，比如“狼爸”。假日里，他把孩子安排在麦当劳，学习一天，看孩子眼巴巴地瞧着别的孩子吃汉堡包、喝可乐，硬是不给买，顶多买一小包薯条给四个孩子吃，作为学习好的奖励。书上说：“孩子们看到我拿着一包小小的薯条回来，眼里当然有些失望，尤其我买的薯条是分量最少的。”难道给孩子吃一顿麦当劳，就会惯坏孩子吗？“狼爸”的这种做法是否太过分了？我们不赞成娇惯孩子，但也不赞成这样人为地制造特殊情况。因为这样很可能给儿童天真的心灵留下不应有的阴影。

1960年春，全国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而生在1959年国庆前的大儿子金煜，当时正处于生长期，急需各种营养。我的奶水是他生长的动力，可是我本身也已经处于营养不足的状态。面对这种窘境，我先生束手无策，却又心急如焚。

粮食能保证定量供应，已经很不容易了，品种只能供应什么吃什么。当时，我的先生在辽宁省委调查研究室工作，经常陪省领导外出开会。只要是在沈阳市内的宾馆开会，他总是把粥喝了，把馒头包好，揣回家，给我们的大儿子吃。



父爱如山

我每天看着他拿回馒头，亲自掰成一小块送到儿子嘴里，又想到他一米七六的大男人，一顿只吃一碗稀粥，怎么能顶得住。我难过地背过身去，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说：“你饿呀，怎么办？”

他说：“不饿，不饿。”

我们心照不宣，互相安慰，互相支持。我当时在大学里是全校哲学教学的总负责人。我的讲课任务很多，一顿也只能吃一两碗很稀的小米粥或玉米面糊糊，其他定量都省给儿子。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自觉地发挥最大忍耐力，去克服饥饿的折磨，同心协力保孩子。由于两个人节约粮食喂孩子，金煜小的时候没有饿着肚子，还长得很胖，外号叫“小胖”。

我们一直都很喜欢苏联大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话：“没有父母的爱，所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有缺陷的人。因此，社会要使他的每一个成员——最大不管他是多么幼小——都得到真诚的父母之爱。”（《父母必读》，第49页）我们对金煜深切的爱，宁饿自己保证孩子的牺牲精神，不能不说是“真诚的父母之爱”。



抓好孩子启蒙的金钥匙

幼儿的好奇心，是指挥他们启蒙的金钥匙。孩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从他们睁眼看世界开始，就很注意颜色与声音；一旦会说话，还会不断地提出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问题。作为父母，一定要深切理解这个启蒙阶段对孩子一生成长的重要意义，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求知欲望。

不顾孩子的好奇心，不去回答孩子的问题的“狼爸”，虽然能使孩子懂得不少知识，然而不让孩子说话，只听他自己滔滔不绝，岂不是让自己失去开启儿童智慧的“金钥匙”吗？不去回答孩子的问题，不去满足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怎么会有针对性的讲解呢？！

“狼爸”说：“在孩子们洗完碗之后，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泡上一壶茶，把四个孩子都叫到身边，开始对他们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畅谈人生。”

小萧冰说：“这是我们四兄妹最害怕的时刻，简直是‘黑暗一小时’。说一小时一点也不夸张，有时候甚至能到三小时，因为爸爸一说起道理来就滔滔不绝，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可怕的是有时候爸爸自己说累了，就不再言语，静静地看报纸，甚至是睡着了。即使这样，我们都不能随意走动，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客厅看着爸爸，等待他的下一步指示。那时候觉得时间是过得很慢很慢的，不能够看电视，不能够说话，不能够睡着，大家只能这样安静地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数着秒，想：爸爸怎么还不发话呀？直到爸爸突然抬头或醒来，说一句‘好了，差不多了，大家回屋睡觉吧’，我们



父爱如山

就像终于解放了的鸟儿一样，各自四散地飞回自己的房间。”

作为父亲，要学会和孩子对话。绝不能不让孩子说话，不能对孩子的问题不予理睬；不能因为自己知识多，对孩子的幼稚问题不屑一顾；不能由于某种知识缺乏，回答不了孩子的问题而赶走孩子；更不能对孩子的问题感到心烦，怕占用自己的时间。孩子的求知欲，如果能够得到爸爸的鼓励和满足，会拉近爸爸与孩子的距离，让孩子体会到学习上的无穷乐趣。这种在成长早期培养起来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会让孩子终身受益。

我家是非常尊重孩子的求知欲的。孩子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特别是我先生，总是很耐心地回答孩子的问题。

我家的大儿子金煜，话还说不全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汽车。当时我家住在中央党校的南院、颐和园的对门。一到星期日休息时，他不上幼儿园了，总是比比画画地让爸爸陪着去颐和园看汽车。我先生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抱着儿子去颐和园门口的小广场上坐着，看来来往往的汽车，一坐就是一上午。

金煜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汽车。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没有钱，只能买二手车。即使是这种旧车，他也精心爱护。去美国探亲时，儿媳告诉我：“他把儿子叫大猛，把他的车叫小猛。”毕了业，生活条件好转后，他不在乎吃和穿，但汽车一定要买好的。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汽车还不多，主要是各机关的公车 and 公交车。孩子问：“这是什么汽车？”“那是什么汽车？”我先生就告诉他：“那是小轿车，那是公交车，那是首长坐的红旗车、吉姆车……”当时的汽车比现在要少得多，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牌子。国产的只有长春第一汽车厂生产的红旗牌轿车和解放牌大卡车，进口的也只有苏联产的吉姆、吉斯、胜利、伏尔加和华沙等有限的几种。凭着先生当时关于汽车的知识，他的回答总是让金煜十分满意。



金煜从小到大大一直非常喜欢汽车

有一次，他一进屋就和我：“妈妈，汽车不能往天上飞。”他眼睛瞪得圆圆的，认真地对我说：“天上飞的是飞机。”他好像又知道了什么新鲜事，高兴得不得了。看着孩子那幼稚而又严肃认真的小脸，我忍不住想笑，可是怕破坏孩子的求知欲，还是强忍住了。后来，我先生向我解释：“他今天向我提出问题：‘汽车能飞上天吗？’我给他做了回答，他格外高兴，好像多么大的问题让我解决了。”我们二人相互看看，忍不住哈哈大笑。

由于我先生对于孩子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认真回答，激发了孩子的求知欲。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提的问题越来越多，有些问题我先生无法回答，便去查阅书籍和资料。他有时也叫孩子自己去查阅资料，这样不仅满足了孩子的求知欲，而且还可以培养孩子自己学习知识的能力。

在回答孩子问题的过程中，我曾经问过：“你解答孩子的问题翻阅资料，要花很多时间吧？”



父爱如山

他说：“实际上，回答孩子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

我家有这样一个学习型的好爸爸，对于孩子们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学习、不断迈上新的台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04 年秋，北京评选“学习型家庭标兵”。我家是中央党校推举的唯一代表，结果中选了。我上台领回了凸印有“学习型家庭标兵”几个大金字的漂亮奖状。这个学习型的家庭主要是爸爸带出来的。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在上海讲课时，有一个单位在会后请我到他们自己建筑的一个很漂亮的宾馆进餐。单位领导与餐厅经理一起陪同。经理的样子有四十多岁，很热诚，很善谈。他在饭桌上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并说要“求教于教授”。

他说，自己有一个独生女儿，过去对他非常好，有什么问题总找他问。每次解答，她都很满意。可是，现在孩子已经上了高中，而且课外书读得比较多，提的问题有些他答不上来。特别是英语和电脑，女儿的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自己。从那以后，女儿表现得对他不那么尊重了，而且开始改变称呼。过去都亲热地称呼“老爸”，现在称呼他为“臭爸爸”。每当上学时，就说：“‘臭爸爸’，我要走了。”下学时，又说：“‘臭爸爸’，我回来了。”

经理还说：“我给她纠正了多次，并说‘这样称呼爸爸不好听，也显得对爸爸不尊重’，可她就是不改。孩子还说：‘我就是这么认为嘛！’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对待她，怎么能让她对我服气，尊重我。李教授，您看怎么办？”

我当时回答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学习，做父母的也要不断学习、不断超越自我。”

我看了看，他还比较年轻，又对他说：“估计你的英文和电脑都不错。”他插话说：“都还可以。”

后来，我又告诉他：“你就在这个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吧。孩子的问题可能



会得到一定的解决，从而也会引起她对你更多的尊重。”

他说：“看来，也只好用这个办法了。”

我恳请那些有责任心的爸爸，也都要做一个和孩子一起学习，不厌其烦地回答孩子问题的好爸爸。



协助妈妈喂母乳

1963年的除夕之夜，正值北方严冬，寒风凛冽，草木凋零，一片肃杀。可是我家却热气腾腾，孩子们欢呼雀跃，大人们乐得一夜未合眼。因为家里闯进两只可爱的“小老虎”——我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下了双胞胎金侠、金延。这正是虎年之末。

孩子出生后，我向来喜欢给他们喂母乳，小孪生兄弟更是得天独厚。只是在闹奶疮的时候，有一个多月，老三没有吃母乳，其他的时间全是我自己以母乳喂养的。当时母乳很多，可能和我这个人平时爱运动、血液循环好有关系。当然，同当时全国物资供应情况有好转，北京的供应好于沈阳也分不开。老人常说：“奶水就是血水。”一个妈妈要想有好的奶水来哺育孩子，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能就是得益于我的好身体吧，我能够同时喂两个孩子。

奶水的来源不成问题，但是，产假过后一上班，怎样回来喂奶，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当时，中央党校的教师是坐班制。一般是趁课间休息，也就是上午10点，下午4点左右，各有半个小时课间操。从办公室到家里来回走路要二十多分钟，两个孩子轮番吃，时间自然不够。可当时制度比较机械，领导又不给照顾。我同我先生商量：“喂奶时间短促，问题怎么解决？”

我先生立刻回答说：“我每天用自行车送你回来，再用自行车带你回去。”



从这之后，他每天都早早地从他们办公室到我们办公室楼下等我，骑车驮我回家。天长日久，我觉得对他影响比较大。我喂奶如果推迟一点上班，他那里也得跟着请假，不然的话，在半个小时之内，两个孩子是怎么也喂不完的。有的时候，他开会也得请假，我觉得这影响也太大了。

后来，我跟他商量，以后不要用自行车来回带我，我自己走，快点走或者跑步。我当时是很能跑步的。过去在人民大学学习时，女排校队要求队员每天早晨跑两千米。可能是由于年轻时候的这种锻炼，走路、跑步都不发愁。但我先生说什么也不让我自己走。他说：“孩子吃奶，妈妈已经够辛苦了，还要来回跑步喂奶，那怎么行？”

又过了半年。我说：“夏天衣服穿得少，跑起来方便，我还是自己跑步回家喂奶吧，不要两个人一起耽误。”

他说：“那怎么行，夏天太热，本来妈妈就上火。听过去老人说，一上火容易没有奶；孩子吃了妈妈的火奶，也容易生病。”由于他的坚持，他每天总是往返四趟，用自行车驮我回家，给两个小宝贝哺乳。



孪生兄弟金侠（右）、金延（左）哺乳期

我这个人可能由于童年就当少先队大队长，接着又做青年团书记、班干部等，脑子很僵，一味讲纪律，生怕影响我和我先生的上班时间。有些天我自己早早起床，偷偷练自行车。先溜车，只有三天就能上车了。虽然骑起来歪歪扭扭，但总可以骑上去了。大约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能够在院里骑车了。

于是，对我先生说：“今后，我自己骑车回来喂奶。”

他看了两次我学车歪歪斜斜的样子，说：“你这个水平，不撞车也得自己摔。”



父爱如山

我当时已经二十八周岁了，在这个年龄学车，胆子非常小，唯恐碰人，又怕撞车。最后，我终于可以来回骑车了。也幸亏党校大院马路宽，人少车少，开始骑起来扭扭歪歪，但没碰过人，也没有摔过。这样，我骑我先生的车，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陪我走了有十多次，才放心由我自己来回骑自行车哺乳了。

尽管我坚持不让他再送我回家，可是，他常常放心不下。有的时候，我刚骑自行车到家，他也骑车到家了。他告诉我：“我没有在后面叫你，怕你突然回头摔倒了，慢慢跟着你，算在后面做保镖吧！”他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可是，我深深地感到他对我们母子的关怀，既考虑孩子又考虑大人，既让孩子吃上母乳，又不让大人有闪失。

像这样关爱孩子又细致周到照顾妻子的，在现代的年轻人当中不是很多了。所以，我觉得我先生对孩子的爱是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当中。有的时候，他不言语，但是你从他的眼神与行动中能够看出那种深情。

那个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三十岁。我很希望现在的年轻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能有这样的深情厚谊。这是家庭感情深厚的基础。



平等商谈不霸道

许多事情要做好，权威是不可缺少的。大海航行要有船长，乐队演奏不能没有指挥。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权威也是必须有的。然而，这种权威不能靠打骂孩子来树立，更不能怕孩子挑战自己的权威。权威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是以民主为前提的。

“狼爸”是怕孩子挑战自己权威的典型，他竟公然霸道地说：“在我的家里，我就是皇帝，是天。只要我提出的要求，孩子需无条件服从、遵守。”孩子要求民主，希望在家里有事和父亲商量着办。在“狼爸”的理念里，这是绝对不容许的。书上说：“萧尧曾经提出过抗议：‘现代社会是讲求民主的，我们家也应该民主一点！’我则提出了我独创的‘萧氏民主论’：‘民主民主，什么是民主？你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我们家里则完全是另一样。我先生很爱和孩子交朋友，从来不霸道，也不打孩子、不骂孩子，不以铁腕对付孩子。我观察到 he 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有自我“调控”能力。哪有什么孩子不气大人的？有时候明明看他生气了，在一般人非骂即打的情况下，他能克制自己，想办法耐心和孩子谈话。所以，每每看到他克制自己的情绪，心里有些憋闷的时候，我特意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人很会微调啊！”他笑着说：“我不仅会‘微调’，还会‘大调’呢！”

记得有一次，老三金侠读初中时，老师来家里反映说：“金侠大闹课堂，一堂历史课都没有上成。”



父爱如山

我先生当时很生气地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

我当晚正在加班，在学员楼的辅导室备课，接到他的电话，我反问：“你说怎么办？”

他带着气回答：“咱们两人一起跟他谈话。”

我说：“你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来吧，这里没有别人。”

于是，他把老三带了进来。

老三这个孩子思想敏锐、很聪明，又向来是爱思考、有主见、脾气犟。谈话如果情况有一点不属实，他是很难接受的。而且他自尊心非常强，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事事要求做好。我先生气呼呼地把他带到办公室来谈话时，他一直很抵触，所以这次谈话很不顺利。

爸爸谈道：“老师说，金侠上历史课站起来和他顶撞，使他没有办法上课，不得不拿着教材走出教室，一堂课没有上。全校都传开了：‘金侠大闹课堂，一节课没有上。’”

当爸爸向我转述老师的话以后，金侠立刻气鼓鼓地说：“老师说得不，不完全是这样，她有毛病。”

我问：“老师有什么毛病？”

他说：“老师骂同学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

“老师不会轻易骂这种话吧？你是不是听错了？”我表示怀疑。

“一点不错。”他回答得言简意赅。

“你自己讲讲经过。”我说。

我先生这个时候还继续生气，说：“你说老师讲的经过不对，你自己讲。”于是，老三就理直气壮地讲了起来。

他说：“在打上课铃时，老师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上课铃还没打完，当然教室里乱一点。当场老师就喊：你们简直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老三还继续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不对，老师刚站到讲台上，我就站起来给



她提意见：“‘老师，您怎么把我们同学叫作‘土匪’呢？’老师说：‘你看，你们当时乱的那样子。’我向老师解释：‘下课的时候，同学们都要玩，总不能不让他们玩吧。铃刚响，他们正在准备就座，怎么能不乱呢？可是你一进教室，他们就坐好了，这也不是在课堂上乱啊！’”

我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他抓住老师的话说学生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当时的样板戏很流行，每个人都知道，威虎山上的土匪都是非常坏的，属于人渣一类。用这类人比自己班上的同学，起码是比喻不当。孩子们的自尊心受伤，自然会产生抵触情绪。但是，我心里的这些想法当时没有讲，主要是担心爸爸在气头上，正要狠批儿子。我不能做个对孩子护短的妈妈。接着，听到了来自爸爸方面的声音。

爸爸说：“你有意见下课提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课上跟老师作对，弄得课都上不成？”

金侠很不服气地顶爸爸：“上不成课能赖我？老师就那么不能接受意见？”

这种顶撞，若是在一般的男同志那里，可能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可是，我先生对孩子有极大的包容度，他接着说：“你是班干部，上课应该帮助老师维持秩序，还大闹课堂，这还有理了？！”

金侠继续顶撞，说：“我没说我有理，可是，如果说我没帮助老师维持秩序，他也不该不上课啊？他骂同学，又不上课，这是老师的错，不能都怪我。”

我说：“咱们今天谈的是你的问题，先把老师的问题放在一边，你再好好想想。我认为爸爸说得对，有意见，可以下课跟老师交换意见，不能当场顶撞老师，让老师下不来台。”我还说：“你认为老师不上课是她的责任，但这件事是由你引起的啊！”孩子还是不服气。

爸爸说：“今天咱们是谈你的责任，你明天要向老师作检讨。”

金侠又顶撞爸爸说：“要检讨，老师得跟我一起检讨，我有错她也有错。”



父爱如山

他还挺生气地说了一句：“让我一个人作检讨没门！”他站起来，转身就走，而且把我的办公室门摔得“啪”的一声。

这对我先生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当然，我也很生气，觉得孩子太无礼。

我先生说：“走，我们回家继续谈。”他当时又急又气，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我有点跟不上。但是怕他回家打孩子，我也急忙地小跑往前跟。

到家一看，老三已经脱掉衣服，钻被窝睡觉了。

这个时候，他爸爸喊：“起来，穿上衣服。”

孩子问：“干啥？”

我先生说：“继续谈。”

老三慢慢地把衣服穿了起来，小嘴还鼓得很高。我怕老三再顶撞爸爸，爸爸会动手打他。于是，我让老三坐在桌子的一边，爸爸坐在桌子的另一边，自己坐在中间，把他们俩隔开。我先生看出了我的意思，说了一句：“你不用怕，我不会打他。”

然而，我先生还坚持让老三明天向老师承认错误。老三这时候倒不顶撞了，沉默不语，以沉默来对付爸爸。

我看了看表，已经一点多钟了。夜深了，总这么僵持着不是办法。后来，我就打了一个圆场，说：“这样吧，我明天上学校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找一找老师，咱们放一放再说。”这个时候，我真怕我先生还想继续坚持让老三承认错误。但是，我看了看他，他以极大的努力在克制自己，同意了我的意见。

第二天，我到学校了解，老师的心情比较好，平静了许多。我把我们同老三谈话的经过，一一向老师学说。

这位老师很讲道理，她听了之后立刻说：“金侠讲的经过是对的，我是有毛病，脱口而出批评学生那么重的话，谁也听不进去。金侠反应比较敏锐，当场对我提出意见。我这话说得不对，以后同金侠谈一谈。”

我一看老师特别有修养，就顺水推舟，说了一句：“老师，请你明天主动



找金侠谈一谈，好吗？”

老师说：“好。”

大约是在另一天的晚上，金侠放学后非常高兴地说：“老师跟我谈话了，老师承认了错误，我也承认了错误。”

他爸爸问：“你承认了什么错误？”

金侠说：“不就是你们跟我谈的那些吗？老师态度特别好，笑呵呵地对我认错，我想，爸爸妈妈说我的那些错误也都对，我也一一地说了我的错误。谈了以后，老师说：‘金侠，你是班上的好学生、班干部，希望以后多帮我维持秩序，也可以给老师提意见，不过，最好咱们下课谈。’”

老三觉得老师要求的也合理，所以两个人谈得特别开心。他放学以后，是笑盈盈地走进家门的。

老三从小就很倔强、有主意，又很调皮。他顶撞爸爸在我们家的“谈话小屋”之中，不止发生一次。我先生都是像这样克制自己，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从来没有对孩子采取野蛮的、粗暴的方法去教育。

在我这一生当中，只记得有一次，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打孩子。大约在女儿金萤三岁多的时候，我先生把她从幼儿园接了回来，一进屋，见妈妈不在，就哭着要找妈妈。当时，我在大学教书，正在给学生讲课。可女儿非要找妈妈，哭个不停。我先生没办法，只好抱着孩子去传达室打电话。从电话里听见妈妈的声音，小女儿不哭了。可放下电话回到家，见还是没有妈妈，她又大哭起来。我先生气得不行，打了她的屁股。不久，女儿发烧住医院，我们轮流看护。一次，她爸爸不在，一个平时非常喜欢金萤的朋友，去医院看她。问她：“你住医院都想谁？”她数落着：“想姥姥、妈妈、小弟弟，就是不想爸爸。”阿姨奇怪地问她：“怎么不想爸爸？”她说：“爸爸打我屁屁。”回来以后，阿姨开玩笑似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

接着，我先生问我：“是这样说的吗？”



父爱如山

我肯定地答复说：“是，一点不错。”

他说：“看来，孩子可打不得。孩子要对大人记仇啊！”

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碰过孩子一个指头。有一次，金煜在乡下带党校一百多个孩子同农民的孩子打群架，成了打群架的“孩子王”。在我们一起谈话的时候，金煜开始也不认错，说：“谁让他们说我们是‘黑帮崽子’？还往我身上甩墨水。”后来，经过反复劝说，他才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所以，跟小孩子谈话，说服教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经常会有顶顶撞撞、孩子不听大人劝导的情况。我先生不仅不动手打孩子，反而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说服教育。

一个家庭要有一个和谐的气氛，当大人和孩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大人一定要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微调”也好，“大调”也好，总之都要严于律己，切不可家长自居，为所欲为，而是要有一个平等、民主的心态。否则，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真正谈心、交朋友，只能把孩子吓得远远的，而心里并不服输。孩子有时甚至产生逆反心态，故意同大人顶着干。孩子们平时很爱黏着我先生，愿意和他探讨问题，愿意和他谈一些孩子间的事。他也像对待小朋友一样，欢欢乐乐地对待他们。所以，我们家的气氛总是很好。有人说，这是由于我的性格温和，对孩子不着急、不上火，能耐心说服孩子。其实，我先生和孩子谈话也经常是这样的。

我先生很平等地和孩子相处、交朋友，这对于孩子做人有很大好处。他不是用“霸气”来对待孩子，而是有极大的包容度，用爱来感染孩子。俄国有一位女教育家，名叫沙巴耶娃。她在自己主编的《教育史》当中，曾经引用别林斯基的一句话：“与其把注意放在消灭儿童的缺陷方面，不如把注意放在用生气蓬勃的爱来感染他们方面。有了爱，缺陷就不会存在。只有消灭恶的而不补充善的是没有结果的。”



不把坏心情带回家

北京的金秋季节是很可爱的。特别是六十年代，空气污染少，天高云淡、阳光明媚，令人心旷神怡。但是，那突如其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搞得全国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那时，我的心每天都是阴沉沉的，好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没有一点欢乐。因为我先生当时任中央党校的团委书记，是校内第一批被打成“黑帮”中的一个。

那个时候，我们幸福的家庭面临着崩溃的危机。我先生整天闷闷不乐，忧郁沉思，处于极度的苦闷和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当中。我深深理解他内心的痛苦，但是，同样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难以找到安慰他的话。同时，我们又竭力向孩子隐瞒，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父母所经历的灾难，怕影响孩子们的情绪。

但是，有一天，孩子们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来，脸上还有些苍白，不知道是因为过度紧张，还是跑得太快了。

我问：“出了什么事？”

他们抢着告诉我：“我们上大礼堂了”，“看了不少大字报”，“都是写的金春明”，“都是爸爸的大字报”。大一点的孩子还抢着说：“大字报上说爸爸是‘黑帮’，是‘三反分子’，是‘反革命’……”

我听到以后，心想这瞒不住孩子了。其实，礼堂里揭发批判金春明的几十张大字报已经贴几天了，只是按当时的规定贴在室内指定地点，屋外还没



父爱如山

有。我们没有告诉孩子，孩子以为是刚刚贴出来的。

我问：“你们怎么知道贴了爸爸的大字报？”

他们说：“是小朋友告诉我们的，我们四个人一起跑去看了。”

当时，老大只有十岁，老二七岁，大字报几乎能够看懂了。李生弟弟当时三岁多，虽然不认识字，但爸爸的名字是知道的，也能懂得一点。

我心想：怎么消除孩子这种紧张情绪呢？当时，跟他们说了几句，说：“大字报写你爸爸那些坏话不是真的。爸爸从小参加革命，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你们放心，慢慢就不贴了。”

孩子们听了这样的解释，虽然情绪稍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事后，我跟我先生仔细商量了一次。

我问：“孩子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

我先生说：“得好好想想办法。”

后来，我先生提出：“我有空给他们讲讲家史，还有我的历史。”

我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了解你，知道大字报那些话都是狂言。我也把知道的事情对孩子说出来。”

从这以后，我家又有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过去不愿意讲也没有时间讲的，关于家庭的历史。我先生讲道：“爷爷在山东非常穷，给地主当长工，闹灾荒，没有办法才逃荒到东北，受过很多苦。”有的时候，他给孩子讲自己十五岁参加革命的经历。为了让孩子能听懂，印象深刻，他还讲得很具体、很生动。为了使孩子不过分紧张，又能够理解大字报上的话是在冤枉爸爸，虽然他心中十分痛苦，但还是给孩子讲些很“快活”的故事。

比如，有一次，他说道：“爸爸参加革命时，比姐姐现在大些，那个时候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人民解放军大部队，解放一个又一个城镇。我参加了吉林省学生工作团，还当了器乐小组的组长，专门拉小提琴，别人唱歌，我伴奏。



“有一次，在1947年夏季攻势期间，大部队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去慰问演出。老百姓看到我身上背着一个提琴盒，就问：‘你这是什么枪啊？怎么和别人背的枪不一样？’我笑了笑说：‘这不是枪，这是小提琴。’

“老百姓一听是琴，问：‘是管唱歌的吗？’我告诉他们：‘是管给唱歌人伴奏的，它自己不唱歌。’老百姓感觉这种琴很独特，过去从来没看到过，所以越发有兴趣，又问：‘什么叫伴奏？’”我先生还向孩子学老百姓问话的样子，歪着头。

他告诉孩子：“为了让老乡们懂得什么叫伴奏，我叫来工作团的一位女团员，让她唱了一支歌，我来拉小提琴。之后，告诉老乡，这就叫伴奏。当时，那个问话的老乡非常高兴，一看又唱歌又伴奏，就喊来很多人，一下子不少人把我们围了起来，鼓掌欢迎。老乡喊：‘多唱几个，多伴奏几个。’我一连让那位团员演唱了几支歌，一直用小提琴伴奏。”

爸爸这样一讲，孩子的紧张情绪立刻松弛了，问：“爸爸，那不是在打仗期间吗？你们工作团还唱歌？”

我先生说：“那是做宣传，动员更多的人参军和上前线抬担架。不像在咱们大礼堂演出，也不像你们平常唱歌拉琴玩。”而且，他很郑重地补充了一句说：“爸爸参加革命，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鬼，能干多少事呢？组织分配的就是干这个。部队到哪我们就到哪，那是在战火里钻来钻去，也有生命危险。我们是随部队行动的战地工作团，发动群众，斗争汉奸，慰劳部队，大家非常热情。岁数不大，但是都很执着，是一群‘小革命’。”

孩子们听了满屋大声喊着说：“怪不得，妈妈说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小革命’，大字报净瞎写。”

为了不使孩子们的心情更加沉重，我也常常给孩子们讲，你们爸爸自幼是怎样努力学习、怎样参加革命的，不是什么“黑帮”，是戴着红帽徽长大的。

由于我们在家不厌其烦地给孩子讲，孩子们的心里慢慢地有底了，也



父爱如山

就平静了许多。

不过，我的大女儿当时十多岁，更懂事些，又在上小学，受大环境的影响也多一些。有些事情她听了相信，有些将信将疑。所以，她的性格从天真活泼慢慢变得抑郁起来，不太爱说话，显得心事重重。有一次，她说要找我单独谈谈。她说她们班有一个同学，爸爸是‘黑帮’，妈妈不是，她要改姓，姓妈妈的姓，叫某某某。说到这，她又问我：“妈妈，我也改姓，行不行？”

我吃惊地问她：“你想姓什么、叫什么？”

她说：“我想跟妈妈姓李，叫李永红。”

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你不跟‘黑帮’爸爸姓，跟‘黑帮’妈妈姓，这也没有什么光荣啊？”

孩子像无路可走似的，一下子把内心的苦楚都迸发出来，当着我的面哭了。

我说：“不要提出改名改姓，那太伤爸爸的心。”

于是，她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比如：什么叫“黑帮”？什么叫“走资派”？什么叫“保皇派”？为什么把爸爸的“小革命”叫成“反革命”？她还说：“这些话，爸爸的大字报上全都有。”

我对她做了解释以后，把事情跟她爸爸说了。

她爸爸告诉我：“看来，女儿的心情很沉重，她比几个小弟弟懂事，所以感到的压力也大。我们在外边有什么不愉快的心情千万不能带回家。”

我的先生还反复叮嘱：“咱们在家得表现的和平时一样，高高兴兴的，该乐还得乐，不能让孩子们从我们身上接受不好的情绪。”从这以后，我和我先生特别注意我们二人在家时的情绪和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现在看到有些爸爸，在外面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到了家里就向孩子撒气；有的对老婆有意见或感情不好，也向孩子撒气；还有的家里人多，上上下下关系不和或经济拮据，也向孩子撒气，把孩子变成了自己的出气筒。这种



父爱如山

缺少理性的爸爸带给孩子的不是幸福和欢乐，而是痛苦。这种在外受了强者的侮辱不敢声张，而回到家里把气撒向更弱者，曾被大文豪鲁迅讥之为“民族的劣根性”。他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再苦也要笑着说

上面已经谈到贴大字报一事，我先生和我比孩子知道得早。事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是一位好朋友在上班路上看到我们，对我们说：“你们二位赶快去看看，礼堂里全是老金的大字报。”

我们一听，急忙往礼堂跑，见到前厅里挂满了我先生的大字报。看到那什么“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黑帮”之类的词句，当时我脑袋“轰”的一下，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我先生的脸也突然变得煞白。

我估计他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种“五雷轰顶”的感觉。大字报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一些没有根据的、抽象的口号与不实之词。他当时没有跟我多说，走出礼堂时，看周围没人，对我说了一句：“完全是历史的颠倒。”

接着，他每天去到礼堂抄大字报，准备答复。他抄不过来，我帮助他一起抄。在大字报之外，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而且也不让本人解释，更不能反驳。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一张“勒令”：每天必须按时到办公室反省、检讨，接受批斗……

那一段时间，我先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大概在一周之内，人就瘦了一圈，眼眶也都黑了。后来，他实在受不住这种政治上的突然打击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精神压力，就不想活了。这件事他没向我说，也没向我吐露一点点。有一次我给他洗衬衫时，发现他衬衣兜里揣了很多安眠药片。我知道，



他是从来不吃安眠药的，睡不着觉也不吃。当时，我很紧张，就找他去问，还好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

我问：“你兜里放这么多安眠药片干什么？”

他说：“那是姥姥走吃剩的。我都把它收集到一起了。现在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他们也不听我讲理啊！”说到这里，他流泪了，我也流泪了。他还补充说：“我有时想，运动最后打成‘反革命’，像1957年那样打成‘右派’，你和孩子都跟我一起受委屈。不仅影响你，还影响孩子，特别是会影响孩子的前途。”他流着眼泪说道：“有时候想把安眠药一口吞下去，一走了之。”

我当时听他这一讲，分外紧张，对他说：“咱们在结婚的时候，你不是说‘生不同时，死同穴’吗？你要是一走，扔下我和四个孩子，怎么活？我当然要和你‘死同穴’，一起走，那么，扔下四个孤儿怎么办？”

听到这里，他非常难过，我们抱头痛哭。我当时真想让他立刻回答我“不走这条路”。可是，我先生是一个很内向、很沉稳，事事都经过深思熟虑的人，他要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让他立刻改变主意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把安眠药片全都扔到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冲掉了。

这以后我每天提心吊胆，他出去我都跟着。后来，我又多次劝他，经过几天的沉默后，他对我说：“为了孩子，再痛苦我也得活下去。”这是一个父亲多么沉重的承诺啊！开始不想活是出自一种爱心，怕“反革命”的罪名影响孩子的前程；现在要活下去，也是放心不下四个孩子，希望他们能很好地成长。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好像是用锋利的刀铭刻在石碑上一样，成了永远不能忘却的痛苦。因为这件事有可能让一个幸福之家发生悲剧。由于对孩子的深深的爱，他没有走上绝路，而是在痛苦的内心挣扎中，闯过了人生的这个大难关。

后来事情逐渐好转，我先生的心情也比以前轻松了。



父爱如山

这个时候孩子们还感觉不到党校的变化。为了让孩子们摆脱紧张情绪，我们每周都要给孩子开一个家庭晚会，爸爸拉小提琴，妈妈唱歌。每当这个时候，排排坐的小听众总是热烈鼓掌，家里被笑声缭绕着。

爸爸的小提琴，铭刻着童年随军宣传的故事，又记载着文革里“苦中作乐”的辛酸。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这一切逐渐了解，更加尊重爸爸，也更加珍爱这把小提琴。后来，姐姐金萤抱着这件珍品学习，成了北京101中学校乐队的队员；弟弟金侠，不仅从小学习好，还特别喜欢音乐，学提琴十分用心，并留下了难能可贵的照片。



金侠特别喜欢这把和爸爸一起经历了
战火考验的小提琴

康斯坦丁诺夫等主编的《教育史》中，曾引用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的话：“人的爱应该是大自然里的一种最高级的爱，而且在父母对子女的爱中，不应该具有父母的自尊、利己和虚荣的打算。父母应该首先把儿童当作一个未来的人去爱，因此父母对子女的爱的基础不应该是

对自己的爱，而是对真理和对人类的爱。”当时我先生没有一味想自己，自己的自尊、自己的虚荣：昨天的“小革命”成了今天的“反革命”；昨天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党校的团委书记，今天成了“黑帮”；昨天是受人尊敬的朋友，今天却成了大家的“敌人”。他没有一味地为自己的自尊和虚荣作打算，否则他就不会也不可能去承受那种史无前例的，也是有生以来所没有经历过的沉重的压力，为了孩子坚强地活下去。所以，我先生对孩子的爱，是处处为孩子的未来打算的，是“大自然里的一种最高级的爱”。



暖水瓶爸爸

我的一位女友曾说：“你们老金对事情好像都比较淡漠，话也少，似乎也不大喜欢孩子。”

我急忙解释：“你看错了，他非常喜欢孩子。只不过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有人又搂又抱又亲，激情满怀，甚至做东西给孩子吃，这种情况他很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暖水瓶’，这倒是说出了我先生对孩子爱的真谛。”

“暖水瓶”这句话，最早是在 1957 年，我从我先生的嘴里听到的。

我有一次说：“你这个人好像对人总是不冷不热的。”

他说：“你可不知道，我对你有多热，只不过是不会表示。外面冷，里面热，我是一个十足的‘暖水瓶’。”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形容生动形象，确实像他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别人对他和几个孩子的关系以至感情提出问题，我都是这样解答。

我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后，他们写的报道常常用“淡泊而儒雅”来形容他。这可能是我先生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一个优点。

“淡泊”一词来自中国古代大政治家、思想家诸葛亮的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正是我先生一生学术事业的高峰期。他亲笔写下“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压在写字台的大玻璃板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可以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八个字伴随着他走过了一生在事业上、在家庭上的辉煌时期。



父爱如山

我先生对什么事情，给人感觉都不是那么热情奔放、满腔热忱。在对亲情的问题上，他也很不善于表露。我对他是充分理解的。我想，这可能和他的家庭环境影响有关系。他出生在一个兄弟姐妹七个（自己排行第六），而又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他的爸爸从学徒、店员苦熬成为经理，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商人，替别人经营森林采木业。爸爸没有更多的时间回来照顾孩子，就是有满腔的亲情，也无从表述。他爸爸的原则：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有大的学问，竭力为孩子创造条件。在外面苦了自己，一心为了孩子，但是在孩子面前表露不多，给孩子的印象就是沉默寡言、不爱说笑。他对孩子的亲情埋在内心深处。他对孩子的妈妈说：“我赚了钱，咱们不买房子，也不买地，就是供孩子念书。”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家有良田千亩，不如一艺在身。”

所以，他把大女儿送到沈阳读外国人办的小河沿盛京医科大学读书。八年后，大女儿成为当地汉族第一位女大学生。大儿子也是盛京医科大学毕业。大女儿毕业以后，二女儿和三女儿又相继从医科学校毕业。爸爸去世后，三个姐姐在家乡合开了一家名为“坤孺医院”的私人小诊所，用赚来的钱供几个弟弟念书。为此，三个姐姐都是年龄比较大了才结婚。爸爸对孩子的爱，明显地表现在替孩子未来着想的根本问题上。这可能也形成了金家的一种传统和家风。

妈妈一个人带着七个孩子，而且孩子都生得靠近。这七个孩子让妈妈劳累不堪，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因为没有保姆帮忙，也没有亲戚朋友从旁照顾。妈妈不仅要承担全部家务，还要特别照顾一个身患肺结核的二女儿，忙得没有闲暇时间去和每个子女搂搂抱抱，没有时间表示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母爱。

我总觉得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点在于他的家庭。我在先生的父母身上，确实看不到对亲情形式上的外在表露。所以，先生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内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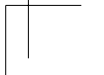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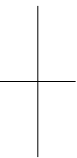


的，实质上更为深沉而理智的性格。这种性格肯定会给孩子以熏陶。

人性格的形成和他的经历自然也是分不开的。我先生的童年生活在人间地狱的日本殖民地——伪满洲国，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欢乐的童年。他上初一时日本投降，但祖国一光复就面临着激烈的国内战争。他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反奸清算、清算奴化教育、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等。十五岁入团，十八岁入党，十五岁离家参加工作团上前线，二十岁就登上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的讲台，给年岁比自己大、资格比自己老的学员讲课。所以，他只好整天板起面孔，不苟言笑，装成一副小大人的模样。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冷面孔。这大概就是时也、命也吧！

我先生同我说，他小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痛快地玩过，以致现在竟然连一个童年具体生动的经历也想不起来。然而，我先生在冷漠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特别喜欢我家的这几个小宝贝，而且不论他们有什么合理的要求，他都尽可能地去满足他们。但是，他表露出来的给人的感觉好像很淡漠。

我的母亲最初来到我家，开始和他接触时，也曾问过我：“春明究竟是不是喜欢孩子？”显然，老人家很怀疑。我做了解释，老人又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和我先生相处，也得出结论：“春明确实是一个‘暖水瓶’式的好人，是一个懂得疼孩子、爱孩子的好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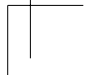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强烈的责任心

现今的父母教育子女，就是缔造我国未来的历史，因而也是缔造世界的历史。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细微处见精神

中国有一句古语“于细微处见精神”。举家过日子经常会遇到一些小事，而人们常常忽略小事。其实，从小事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精神，比如爱或憎，理解或不理解，体贴或不体贴等。

“狼爸”对他秀外慧中的好妻子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称其为“我们家的‘国宝’”。如此关爱妻子，这是他的一个优点。但是，他对子女的关心，却不太够。

“狼爸”的女儿老四萧冰有一段回忆：“广州有时候确实是太热了。我记得有一次到了三十八度，爸爸还不让我们开空调……所以我们三个那次夏天，就一直在爸爸妈妈的房间前面来回走动，因为每次经过他们房门的时候，都会从门缝里吹出一丝清凉，实在是太凉爽了……我记得从小到大，大概每年在家里开空调的次数，也就两三次吧。”

我们的子女，从爸爸那里学会既关爱妻子，又关爱孩子。在我先生和我居住在三亚时，我接到了来自北国白雪皑皑、经受“倒春寒”袭击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我那可爱的小孙女卓安娜的外公、外婆的电话。互相问候之后，他们谈到前不久（2005年初）金侠与王阳回大庆探亲的情形，说女儿和女婿的学识和成就让家人与亲朋好友感到骄傲。他们还特别谈到金侠，说他在大庆医学院所作的关于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报告引起了轰动。孩子的外公还说：“金侠这个年轻人，和有些年轻人不一样。他工作好、学问好，对家人也



父爱如山

好。我们在美国探亲期间，金侠夜里怕我们二老劳累，又怕我女儿休息不好，总是主动起来哄孩子，抱着孩子走走拍拍，哄她睡觉。”



夜里起来哄孩子的金侠自拍了与小女儿的纪念照

“工作好、学问好，对家人也好”，这些话使我想起在金侠小的时候他们的好爸爸。

金侠和金延能坐稳的时候，家人就常推他们二人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我们从沈阳搬往北京前，金煜本来有一个小木车。当时的婴儿车都是木制或竹制的，不能折叠。由于搬家不便，我们送给了别人。

来到北京，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急需一辆婴儿车。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一位姓杜的阿姨，就把她家久已不用，但保存得很好的竹制婴儿车送给了我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不像现在有那么多花样繁多的婴儿车，有这样一辆竹车不仅解决了实际困难，也省了钱去买。

这样小竹车就成了孪生兄弟外出的工具。夏天常常是姥姥白天推他们出去，晚上下班我也经常推他们出去玩。那个时候，晚上我要做家务还要备课，忙得很，夜里要给两个孩子喂奶、换尿布，所以经常头痛。中午睡上一小觉，才能稍微缓解。

我先生为了照顾我，中午常常推孩子出去玩。小孪生出生的第二年，我先生已经调到校机关党委工作，被分配到南院办公室整理材料。他每天开夜车，上午可以休息一下。所以，中午我给孩子喂完奶，他就把两个小宝贝推到中央党校小卖部前有阴凉的地方，并经常在那里手推小车来回摇，嘴里哼着摇篮曲，把两个孩子哄睡了才回来。我有时候不忍心，想中午自己带孩子。因为我先生夜里加班工作，下半夜才回家，睡得并不踏实。而且当时又是夏



天，中午需要补觉。但他总是坚持在中午自己来做这件事情。他说：“你夜里照顾孩子得起好几次床，中午这只是一小会儿，就算是我尽父亲的责任吧。看着两个孩子一天一天成长，也是享受天伦之乐。”所以，当时中央党校的老人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爸爸总是中午在小卖部门前手推小车，哄孩子睡觉。

一些过往的行人，特别是远离儿女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很喜欢这对双胞胎。他们有时候就弯下腰来，看着两个孩子左右端详，说：“这是一对双胞胎吧？”我先生总是欣慰地笑一笑。还有的老人走过说：“你福气多好，他妈妈一下就给你生了两个儿子。”这时候，我先生也显得很骄傲。每当我吃完饭洗完碗去看他时，他都很愉快地在和小孩边悠边玩。我让他进来休息，他总是不肯，说：“这是咱们的分工，我的责任。”由于他对我们母子的精心照顾，我终于能够稍微休息一下。不然，上班、上大课、搞辅导、深夜备课，我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我的先生总是在默默地尽自己的家庭责任，毫不声张，却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当然，这种强烈的责任心是出自他对孩子和我深切的爱。假如没有这种基础，只顾自己休息，自己玩乐，满足自己的一切，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的先生和那样的爸爸，是迥然不同的。



不做“甩手掌柜”

家庭要想和睦美满，爸爸就不能做“甩手掌柜”的，一定要自觉地、努力地帮助妻子料理家务。遇事不推诿，家务抢着干，积极帮助妻子分忧，一起负担家务，这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狼爸”在家里自觉承担的“神圣”职责主要是教育孩子。他很得意地称颂爱人和他配合得好：“我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工作，都会给孩子布置任务，随时监控孩子的行踪，而妻子则是我最大的督导师。每当我出差的时候，妻子便会随时电话联系汇报家里的一切状况，并依照我的指示对孩子进行教育。”“狼爸”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是好的，但监控孩子的行踪，就做得过分了。尊重孩子的权利和自由，也是爸爸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妻子，家务事是很多，很琐碎的。有些事看起来很小，但又是不得不做的。其实，帮妻子做家事，不求多，做一点，也是一种爱心。

1963年，我生了双胞胎，亲自喂奶，上班后还一心搞好工作。那一年，我被评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级学习雷锋积极分子。这样一来，我更忙得家里家外团团转。特别是给两个孩子洗尿布的事，负担相当重。那时候没有今天的“婴儿尿布”或者“尿不湿”。当时的尿布是用大人的旧衣裤剪成的。因为布是按人定量供应的，所以旧衣服也不多。这样尿布必须反复洗用。当时也没有洗衣机，两个孩子成堆的尿布只有用手洗。我先生胃肠过敏，不能洗尿布，一见孩子的尿尿就呕吐。我母亲得了黄疸型肝炎后，来帮我照顾孩子。



老人家痊愈后，还没得到充分休息，就来到我家。所以，我生怕母亲的肝病复发，尽量让她少干活。由于生病，她不能做饭，我先生当时也不会做饭，所以，我既喂孩子，给大人做饭，又洗尿布。当时，工资少，开支紧张，没有条件请保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我好像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下了班就是干活。在坐月子期间，我就开始用冷水洗尿布。

虽然，我干活总是高高兴兴的，从不抱怨。特别是照顾自己的小孪生儿子，更是虽苦犹甘。可是，我母亲和我先生特别心疼我，总是跟我抢活。我先生因为自己不能洗尿布，就想了一个办法帮我烤尿布。因为双胞胎是大年三十生的，正值寒冬。两个孩子所用的尿布一天换好几次，晴天晒不干，碰上阴雨天更没辙，只有用火烤。我先生从建筑工地上捡了些旧铁丝，自己做了一个烤尿布的大铁笼子，扣在蜂窝煤炉子上，尿布放在上面烤。当时，没有电烤设备，就生了两个蜂窝煤的小炉子，专门用来烤尿布。烤尿布活很简单，但要有耐心。火大了会烤糊，尿布就不能用了；烤不干小孩要遭罪，所以做这件事必须十分认真，不断地翻尿布，使之均匀烤干，还要管好火。

有一次，我发现他站在炉边烤尿布，就说：“你搬个凳子坐下来，这有多累。”

他开玩笑说：“不累，这是我在自觉地给自己‘罚站’，谁让我不会洗尿布呢！”实际上是怕坐着容易打盹，把尿布烤糊了。

事情虽小，但人们常常能从“细微处见精神”。我从这里看到他对我和孩子责任心。

到大儿子有了孩子的时候，虽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还没有“尿不湿”。我先生提醒儿子，要学会洗尿布，还问：“你胃肠过敏不？”

儿子告诉他：“你大孙子的尿布我全包了，包洗、包换，做得非常像样。”我先生哈哈大笑。

父传子，子肖父，他们都有关爱家人和孩子的责任心。这是一个好爸爸所不可或缺的。



百善孝为先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应该代代相传。在家教中，父母必须率身垂范，做出榜样。这是一个好爸爸不可缺少的素质。

“狼爸”是比较讲孝道的，这是他很可贵的优点。他妻子在《所以，北大兄妹》的前言中，有一段动人的描述：“爱妻爱儿的男人首先是一个孝顺的人。他不仅老公做得好，作为儿子，他做得更好。我婆婆最爱提的一件事就说明他的孝行。婆婆爱吃广州老西关人最爱吃的鲜虾云吞面。老公参加工作后，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买了云吞面。”

我家孩子的姥姥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平时有小病，不吭不响，吃一点药就过去了。她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但有一天，她突然叫肚子痛，而且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就是这种情况，她还是不肯去医院。后来，我找来了住在同楼的校医付大夫。她看后说：“马上去医院，是阑尾炎。”

我们全家慌了手脚。付大夫在要车，我和我先生在安排。我本想去医院，女儿陪同母亲看病会更好些，但是把两个孪生扔给我先生，他也照顾不了。于是，我先生自告奋勇，说：“我送妈妈上医院。”这样，妈妈就在他的陪同下到了海淀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当即决定住院开刀。

开刀后，我去医院看护妈妈。家里不得不克服经济困难，临时找了一个姓焦的阿姨。这个人住在大有庄，老实厚道。她说：“你和孩子爸爸一起去看姥姥吧，放心，我能照顾好他们，我生过两个孩子了。”



当我和我的先生一同来到医院妈妈的病床前，她眼睛瞪得挺大，惊讶地说：“你们都来了，孩子扔给谁了？”

我当时笑了笑，说：“邻居帮忙请了一个阿姨，人很好，她说一个人照顾没有问题。”我又说：“妈妈，你住医院还惦记两个孩子。”

她说：“我不仅惦记两个，那四个都惦记。”

我先生为了让我妈放心，安慰说：“妈妈，请您放心，我们能够把孩子照顾好。有振霞和我，还有一个阿姨，您就安心养病吧。”

这样，在我妈住院期间，我来回跑，一方面在医院照顾妈妈，洗头、洗脚、吃药；另一方面也跑回来看孩子。因为焦阿姨是新来的，很多情况不熟悉，需要告诉她怎样做。我不在时，我先生也处处指导她。平时我搞家务，他不吱声，但是都看在眼里，心里有数。所以，我一到家，看到他非常负责地在指挥阿姨做这做那，也就放心了许多。

到妈妈快出院的时候，住院的医疗费难住了我们。当时，我们有公费医疗，妈妈没有。家里原有的一点积蓄，生小孪生又花个精光，每月的工资都要一分一角精打细算。而做一次手术需要不少钱，怎么办？从住院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是从来不向别人借债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收到一笔稿酬。

我先生在沈阳工作时就经常给报刊写点东西，1959年反右倾时差点因此而惹祸，就不敢再写了。到中央党校后，他们的党史教研室主任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给天津市的《历史教学》杂志写一篇文稿，即《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斗争》，这也是他给中央党校秀才班学员讲课的课题。他讲课后大家反映很好，主任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让他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这个时候，我先生就不分昼夜地赶文章。说老实话，一方面是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有点稿费，贴补一些家用。恰恰在最急需的时刻，我们收到寄来的一百多元稿费。当时物价低，收入低，



父爱如山

中央党校的教员能够收到一百多元的稿费，算是高收入了，比一个十六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还高一点。妈妈出院结算将近一百元，这样家里的大难题就解决了。

我先生对我妈非常好，他是一个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他经常对我说：“妈妈对咱们帮助太大了，有条件时一定让她老人家在咱们这里好好享享福。”有时还说：“妈妈老的时候，咱们来养，不用舅舅养。老人一直和媳妇有婆媳关系问题，不愉快。”有的时候，他还非常认真地对我说：“咱们有报答妈妈的那一天。几个孩子一长大，我们的家就不会这样拮据了。”

后来，不幸的是，我妈妈没有等到我们孝敬她，就与世长辞了。她去世那年不过六十八岁。我们十分悲痛。

后来，我先生还经常谈到，特别是当几个孩子相继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又攻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后，我先生谈得就更多了：“妈妈要能看看现在这些外孙、外孙女，该有多高兴啊！该到她享福的时候，老人没有享受到。我们做儿女的，总觉得有点愧疚。”他亲自陪我把母亲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移葬到一个山上。

我先生的家庭责任心，不仅表现在对我、对孩子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老人的责任感也是十分强烈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他都照顾得很好。每每提起妈妈，他和我都感到很遗憾当时没有现在的物质条件。每当我思念妈妈的时候，我先生总是安慰我说：“我们把妈妈作为一种永不忘怀的记忆，铭刻在心里吧！”

对老人的这种责任感、尊重与孝心，影响了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四个博士儿女，对于自己的父亲、母亲也都是这样，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爱人的父亲和母亲。我先生和我给予孩子的这种精神财富，是无价的。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著名的木盆故事。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写了一篇小品《爷爷与孙子》。里面说爷爷老态龙钟，口水鼻涕不停流，儿媳嫌他



父爱如山

脏，不让他同桌吃饭。有一次，爷爷把饭碗打碎了，儿媳破口大骂：“老不死的，以后给你一只木盆算了！”几天以后，她的儿子用斧头去砍木头，父母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我在做木盆。等你们老了，给你们用它吃饭，免得打碎瓷碗。”这个故事告诉人们，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他们虐待老人，到了老年儿子也会虐待他们。一个有责任心的爸爸，应该给孩子做出好的榜样。



自己的孩子自己带

孩子都不是铁打的，受到病菌的侵袭是难免的，特别是儿童年幼免疫力差的时期。作为一个疼爱孩子的好爸爸，随时都要想到增强孩子的免疫力。如果孩子生病，就应该热诚地、耐心地配合医生的治疗。

“狼爸”主张对孩子“狠狠地打”。他说：“我的打，绝对不是很多家长那种轻描淡写地意思一下，而是‘真材实料’地打，一定是狠狠地打。我们家的仿古大花瓶里，常年都放着藤条和鸡毛掸子，那是打孩子必不可少的工具。”读了这段话，我不禁愕然：难道他就没有想到，孩子在受到皮肉之苦的同时，心灵也会受到重伤，进而郁闷成疾吗？很奇怪，他在全书中从来没有涉及孩子的病痛问题。

我家孩子的爸爸，对孩子的健康非常关心，对患有疾病的孩子，都会忘我地去照顾。

1964年，学校先后两次派我出去，一次是在北京近郊的通县，另外一次是在党校附近的“东北旺人民公社”。

当时，教研室秘书找我谈话，我说：“家庭有困难，我去不了——小双胞胎刚一岁多，还有另外两个孩子，妈妈黄疸型肝炎刚痊愈就来到我家看孩子，没多久又得了阑尾炎，才出院不久。”

这位秘书却说：“你走了不是还有老金吗？”

我说：“老金是个男同志，他能挺起这么大的家吗？有些家务事他做不来。”



我的这位领导很生硬地说：“这不是教研室定的，是校领导定的。已经定了，没有办法改变。”我当时心里愤愤不平，又问了一句：“还有很多人没有下去嘛，为什么第一批一定派到我的头上？”他可能是没有预计到和我谈话这么困难，因为我这个人向来是服从组织的，一般是有什么任务来了，领导说一不二。他一看和我来硬的不行，又来软的，给我戴起“高帽”来。

他说：“去通县工作团的女团长特意挑选的你。她是政策研究室主任，校长夫人是她的好朋友。这次从全校挑选并且经过反复研究，挑到了你的头上。她是物色秘书，认为你能行，又埋头苦干，可以胜任这件事情。所以，你的名字是从校领导那里定的。”

我当时说：“请你反映反映，把我放在下批。”不知道是因为他没往上反映我的意见，还是领导不近情理，我的名字出现在了第一批去的名单里。我不得不挥泪和家人告别，而且反复叮嘱那位焦阿姨，希望她帮助姥姥把孩子照顾好。

这四个孩子、一个病老太太之家，虽然有一个阿姨帮忙，但我先生仍然十分辛苦。他当时已被调到中央党校党委办公室做秘书科长，每天要坚持按时上班，不像在教研室时还可以在家里备课。再加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常常有临时性的任务，要随叫随到。当然，他还要负担家务事。我走以后，他的担子更重了。更让人难过的是，孩子相继生病。先是老大金萤得了黄疸型肝炎，后来老四又得了败血症。

有一天，小萤拉肚子、发高烧，校医院的医生说好像不只是肠炎，让我先生带去日坛传染病医院继续检查。到那里检查后，我先生大吃一惊，原来是黄疸型急性肝炎。

后来，他告诉我：“当时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一方面，担心八岁的女儿得了这种传染病，是不是能够彻底治愈，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另一方面，又担



父爱如山

心女儿得这种病，会不会传染给三个小弟弟。如果传染上的话，那家里就更不可开交了。”

最近我们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说：“开始小萤有病，我还不告诉你，因为那时候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保证后方，支援第一线’。”他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当时是第一线，我们后方得保证你们，让你们在那里安心工作。小萤生病，后来住进了传染病医院，医生说比较重，我才不得不告诉你。”

我先生当时是想把家里的事都一个人扛起来，所以每周都到传染病医院看望小萤一次。当时没有什么“的士”，即便有也打不起。从中央党校到颐和园，本来就得走二十多分钟。上了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终点站，又得转27路公交车。坐到终点站下车还得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日坛医院。这样一来，只是花在路上的时间，往返就得三个多小时，所以我先生那时候常常筋疲力尽。

我先生在车上是睡不着觉的。然而，当时累得太厉害了，上了车一坐在座位上，他就睡。有时候没有座位，站在那里，手扶着横梁，脸往胳膊上一靠，也能睡着。有一次，27路已经到终点站，人都下车了，他竟然不知道。售票员在那里高喊：“到终点站了，赶快醒醒，下车吧！”这个时候他才猛然醒来，急忙下车。

就是在这种筋疲力尽的情况下，他每周还不忘去探望女儿。因为肝炎需要补充糖分，所以他总是提着一些糖果去。医院的传染病区隔离很严密，大人探望儿童，只能隔着玻璃看，不能有任何接触，带去的東西由护士转交。

他后来告诉我说：“看到孩子时，她隔着玻璃在流泪，我心如刀绞；有的时候，看她微笑地在里面向我招手，就会获得很大的安慰，心想一定是病情有好转。”不管是什么情形，我先生每个礼拜都提早把给孩子带去的糖果准备好，最少带二斤小孩爱吃的什锦糖块，还有其他的食品，风雨无阻地去看我们的宝贝女儿。



“双亲至爱，是人生不可少的甘露。”当时尽管我不在家，但我先生替我带去了母爱。他把双亲的爱一起给予女儿，让孩子可以比较愉快地生活。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女儿很快就痊愈了，急性肝炎并没有转为慢性肝炎。万幸的是，三个小弟弟也没有被感染。

回想当时，我先生说：“那是‘文革’前咱们家最困难的阶段。家人一个一个地病倒。我心想孩子有病，无论如何得治好。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你在家的时候，咱们俩一起撑，日子好过多了；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觉得困难特别多。但是，我不撑又让谁来撑呢？总不能把事情都推给身体虚弱的老母亲吧！”

我现在看到有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她们的孩子也常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是学习方面的，有的是生活方面的。可是，一有问题，他们就往老人那里送。家有保姆，夫妻两个再共同撑一下，日子可以过得去。可是，偏偏要把孩子送到六七十岁的父母面前，自己却去打牌、旅游、玩耍。我希望年轻父母们遇到事情，能够像我先生这样自己挺一挺、撑一撑，让已经为你们花了一生心血的老人安享晚年。



撑起家庭的重担

筑楼、建房必须有顶梁柱，构筑一个圆满的家庭，父亲这个顶梁柱是不可缺少的。家要靠父亲来支撑。只有父亲用双肩将家撑起来，才能让阳光照亮整个家。所以，作为一个合格的爸爸，无论家里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有勇于担当、无悔奉献的精神。

“狼爸”虽然对孩子打得狠，但在困难面前能够把家撑起来，还是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在遇到困难时，为孩子、为家做了许多事情，令人钦佩。书上说：“1998年，一场政治经济的博弈，广东国际信托公司突然宣布破产，这对于一个人独自撑起一个家的我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这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一家人唯有举债度日。卖房、卖车、辞退保姆，全家人从原来宽敞的大房子，换到了只有不到一百平方米的小屋……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还是把孩子们的学习放在第一位，即使举债，最好的学校依然要上。”

“各家都有难唱的曲”，然而曲牌不一。只要有把家撑起来的胸怀，就是一个有担当的父亲，应该赞美。

中国有一句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女儿肝炎刚出院不久，儿子老四又住进儿童医院。他是孪生兄弟中的小弟弟，生下来就体弱，还住过一段保温箱。由于我一直没有间断地给他哺乳，样子是长胖了，但是抵抗力还是比较差。后来姥姥有病，我不在家的那段时间，老四是由焦阿姨照顾的。



她不熟悉孩子的生活习惯，虽然人很善良，一心想把孩子照顾好，可是由于穿着不适宜，老四有一阵子感冒了。于是焦阿姨就给他吃小孩的感冒药。到校医室去看，医生开始也说是感冒。后来没想到扁桃体化脓，高烧不退，得去儿童医院检查。

儿童医院的医生说孩子是败血症，我先生吓了一跳，脱口而出：“白血症就是血癌啊，很难治愈吗？”他急忙问医生，医生耐心地告诉他是失败的败，叫“败血症”，和“白血症”完全是两回事。这时候，我先生才稍微放心点。但是，紧接着医生又说：“‘败血症’治疗时间也要很长。因为病毒从扁桃体化脓开始，已经周身循环，需要给孩子换血，这得有个过程。”

老四住院。但抱进去以后，就再不让阿姨和爸爸接触，也像姐姐那样给隔离起来了，只能隔着玻璃门看着孩子。老四被陌生的小护士抱进隔离区时，号啕大哭，拼命喊：“爸爸！爸爸！焦阿姨！焦阿姨！”焦阿姨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中年妇女，见到孩子这样，她急忙把身转过去，流泪了。爸爸心里也十分难受，主要是对孩子的命运未卜，经验也少，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孩得“败血症”。老四在里面叫焦阿姨，焦阿姨哭得不能再转回头来看老四。

这件事情好像给了孩子很大的刺激。出院后，孩子变得不爱说话，爱噘嘴，很内向，很多年后才逐渐变回来。

后来，爸爸和阿姨多次上医院探望，老四在玻璃门里面，只是比画着张开手让爸爸抱，根本不理站在旁边的焦阿姨。原来他和焦阿姨是很好的。焦阿姨带他期间，有时候偶尔回家住一夜，由我陪他睡的时候，他也总是把焦阿姨的枕头抱得紧紧的，才能入睡。为什么有了这种变化？事后，爸爸分析说：“可能孩子以为把他送到医院，焦阿姨就不再要他，已经会记‘小仇’了。”后来，爸爸和焦阿姨去看他，每次回来，焦阿姨都伤心地说：“老四人不大，可是会对我‘记仇’了，因为我抱着把他送到医院，他就不理我了。”



父爱如山

这些细微的事情是事后我回来探病的时候，焦阿姨对我说的。我先生也饱含深情地对我说了很多。

不巧的是，老四快出院前，焦阿姨的家里出事了：两个上学的孩子，双双被人打伤。据说是因为吵嘴，哥哥去帮妹妹，结果两个人同时被打。焦阿姨为了陪着自己受伤的孩子住院，不得不辞去我家的的工作。这时候不太好找保姆，整个家务都压在我母亲和我先生的身上了。当时的北京和现在的不一样，没有外地打工者，出来做保姆的人很少。所以找一个保姆很困难，不仅月工资高，还很难找到。

老四出院以后，出现一种反常现象。他本来说话比较早，一岁多住院，很多话都会说了；但出院以后，什么话都不会说了，连姥姥、爸爸都不会叫。白天，他能和孪生小哥哥在一起玩玩，但也不是很高兴；一到晚上，特别是深夜，就哭闹得全家不得休息。老四哭起来，谁抱也不行，又推又叫，好像根本不认识家里人似的。这时候，我母亲和我先生都非常苦恼，两个人轮流在地上抱着走。

后来，我先生去问医生：“这种反常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家里人都很着急。”

医生回答说：“不必着急，有的孩子是这样的。金延刚住医院的时候，天天夜里哭闹，不睡觉，吵得别的孩子也不能休息。我们经过商量，决定每天给他吃半片安眠药。后来不行，又换成一片。”

我先生听后，觉得这医生的处置不够合适，怎么能这样治疗，给一岁多的小孩吃安眠药，而且用那么大的剂量。但是，当时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对医院提出意见。

可是医生却很轻松地说：“不会说话没关系，慢慢会说的。夜里哭闹，可能是因为在医院里每当他哭闹的时候，就给他灌安眠药，需要两个医生给他灌，大概留下了惊吓的毛病吧，慢慢也会恢复的。”

我先生把他听到的情况回来告诉妈妈。妈妈说：“这医生怎么这样狠，夜



里给孩子灌安眠药！”我先生当时心里也十分难过，然而还不得不一再告诫自己，要安慰老人。

他经常说：“过一段就好了。”这既是安慰老人，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虽然从心底里对医生的这种做法是不赞成的。事实上，医生这种做法，给孩子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我先生怕累着母亲，所以晚上起来抱孩子满地走的时间特别多。我回来看到这种情况，问了问家人事情的经过，一边晚上抱着孩子，让我母亲和我的先生休息，一边流着眼泪说“我是妈妈”。但是，孩子还是像恢复不了记忆一样，哭叫着推我，抱起来也非常累，因为他总往一边挣。休息日过后，我总忘不了孩子夜里的哭闹，也忘不了我妈妈和我先生夜里的辛劳。

这种辛劳不仅是身体上的疲劳，而且更担心对孩子的发展不利。一个会说话的孩子，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一个认识家人的孩子，变成不认识家人的孩子。什么时候能恢复好呢？我先生和我妈妈的心里，所承受的焦虑是相当大的。我也为此而经常流泪。

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孩子才逐渐好转，恢复正常。老四有病这段时间，把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先生搞得更加疲惫了。但是，他强烈的责任心支撑着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挺得住。现在回忆起来，我先生还说：“当时是真困难啊！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但是，心里一直想着一定要把孩子带好。”

经过操劳、忧愁，我先生那个时候变得非常瘦弱，而且开始掉头发，较早地变成了一个秃顶。后来我回来了，又经过一段时间，有人说他长胖了。我先生说：“不是我长胖了，是振霞不在的时候，家务活太多，压在我身上，我变瘦了。”由于妈妈和我先生这样不辞辛苦地照顾家庭，所以，孩子的病陆续都好了。我回到家里，家中又充满了笑声，人人都感到非常



父爱如山

幸福。

过去，我们通常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现在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各国的领导层都比较注意各自国家的家庭安宁。每个人也都在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庭。我先生的这个信念是相当强烈的，这就是一定要对自己的幸福家庭负起责任。



教子养伤不忘读书

人这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春秋，不知要经历多少日日夜夜，不知道要走过多少沟沟坎坎。路是很不平坦的，“一生平安”“一帆风顺”“万事如意”，都是善良之人的向往，是一种不可能完美实现的美好祝福。作为一个智者的父亲，对降临在孩子们头上的“天灾人祸”，不仅要教给他们怎样预防，而且要在不幸临头时，遇险不惊、遇难不惧，硬着骨头扛过去，这是一个好爸爸应有的傲骨与风格。

我家老四金延很小就得了一次败血病，没想到上初中时又遇到车祸骨折了。

那天我们刚下班，除金延外，孩子们也都一一从学校回来。正在期盼时，家中拥进一群孩子，搀扶着金延进来。没等金延开口，孩子们就急急忙忙地说起来，你一句我一句：

“我们是五道口附近工厂学工的 67 中的学生，金延的同学。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群人靠路右侧骑车，一个农村妇女抱着孩子，从停着的汽车前跑过来，正好跑到金延的自行车前。如果金延继续往前骑，她抱着孩子后退，已开动的汽车必然要撞倒她们母子。可是，金延如果猛刹车，我们后边一辆辆跟着他的车就会相撞。旁边还有很多行驶很不规范的汽车，肯定会出危险。后来金延急中生智，猛一歪车，自己掉到路旁很深的沟里，保住了她们母子，也保住了我们大家，但自己却摔成重伤，自行车也摔坏了。我们是扶他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父爱如山

他们还说：“金延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都很感动！”

带儿子金延去医院拍片后，医生告诉我们，孩子“小腿胫腓骨骨折，很严重”。然后，金延打了几乎和腿一样长的石膏绷带。他不得不在家养病，但他还坚持学习。67中学的老师、班主任都来看他，说了很多表扬的话。学校决定让老师给他补课。

老四摔坏腿以后，住在武汉的姨妈给我发来了紧急电报，说：“母亲病危。”我当时矛盾的心都快撕裂了，一边是躺在床上急需照顾的儿子；一边是含辛茹苦、生我养我的老母亲。反复商量之后，我决定去照看老母亲，同时叮嘱我先生照顾好儿子。然后，我立刻只身奔赴武汉，看望重病的母亲。

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先生一个人照顾老四，一个读高中的大儿子和读初中的老三。这时候，他已经从党委办公室调回党史教研室，承担了胡耀邦校长交给的研究任务。这是当时还有很大政治风险的新课题，他作为研究小组的组长，工作很忙。大女儿这时已上大学住校，管不了家里的事。

我先生下班回到家里，每天要做三顿饭、打扫卫生，还有一个艰难的任务就是给老四擦澡。老四打的是长长的石膏，不能洗澡，我先生就每天给孩子从上往下擦澡。把一个受伤的孩子扶到卫生间，已经是相当累了，还要从上到下地给儿子一遍遍地擦洗。有的时候把儿子送到床上，他已经满身是汗了。

当时，我先生还身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除了热情接待上门给小儿子补课的老师，还在家给孩子当老师，指导老四如何看课外书。那时候，一个活泼好动的初中生被迫躺在床上，很寂寞，我先生就找出一些党史书籍给他看，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还有小说《红旗谱》等。我先生发挥他这个党史教员的特长，跟孩子一起讨论党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和重大事件，给他讲历史实事和英雄故事。读书不仅使孩子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一个人独处的孤寂，还增加了知识，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



老四当时看得最多的是《星火燎原》。书中包括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所有主要战役和战斗。著者都是参加战斗的亲历者，而且不少是作战的主要指挥员，包括很多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生动、真实、感人的描述，让孩子们爱不释手，不仅自己看，还借给同学看。这套书现在还在我家保存着。现在看到这套书烂脊、翻角、破损的样子，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孩子当年认真阅读的姿态。

我先生和老四经常交谈怎样读书，使孩子举一反三，这对于孩子提高课外阅读能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法国十八世纪有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很提倡这种父子读书的交流。他曾经回忆不满十岁时，他的父亲是怎样引导他读书的。在他所写的《英雄传》里曾经谈道：“由于这种有趣的阅读，以及父亲和我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便养成我那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我头脑中不断为罗马和雅典伟人的思想所盘踞。我仿佛在和他们为伍一般……”

“狼爸”教孩子读书，抓得很紧，这是好的。但他的方式不是互相交流、耐心引导，而是强迫孩子看书、背书。这实在是一种冷酷的摧残。



尽一切可能让孩子读书

我家的四个孩子上学，虽未举债，但开支也是相当拮据的。

姐姐经过三年下乡之后，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了大学，三个弟弟也都相继考上了大学。同时有四个孩子上大学，又没有助学金，家里收入有限，经济上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大儿子金煜对家里非常关心，心很细，特别理解家里的困难。

有一次，他问我：“妈妈，我要考上研究生，能不能供？”

我的回答是：“我们‘拼裤子当袄’（这是一句东北方言，意思是尽其所有的一切）也要去供你们。”



我们的四个孩子同时读大学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先生。他毫不迟疑地对我说：“你告诉每个孩子，能学尽量学。我们就是不吃不穿，也要供他们去上学、去念书。”他还特别给我讲了我公公的故事，还有他家的几个兄弟和姐姐们求学的故事。

我先生的父亲是山东省昌邑县人，家里非常穷，念不起书。他十四岁那年，当地发生大灾荒。为了不一起待在家里饿死，爷爷决定带着长子去“闯关东”。奶奶留老家带小儿子死守。



一路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吉林省落脚。爷爷先当商店的小学徒，经过多年终于熬成经理，自己也有了一点钱。按当时的潮流，有钱就要买房置地。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供孩子们读书。金家的七个兄弟姐妹，女孩三个，男孩四个。每个人都读了很多书，毕业的学校档次都比较高。我先生说：“那个时候，父母也是克勤克俭，甚至从牙缝里挤出点钱去供孩子上学。”

我先生的大姐看家里太困难，医科大学毕业后开始在丹东找到工作，立刻把二弟接到丹东，她来供弟弟念书。关于我先生讲的这个故事，我听过几次。“文革”结束后，孩子们的大姑有几次来我家，给我讲得更具体了。

她说：“咱们家由于爹的主张，兄弟姐妹这一辈都成了读书人。那时候供孩子念书全是自费，不像解放后有很多公立学校。家里先后供这么多学生，爸爸能省则省，千方百计筹资。妈妈也非常懂得勤俭持家。”

大姐还给我讲述把二弟接到丹东的过程，说：“弟弟刚来的时候，非常瘦，什么也都没吃过。冬天看到糖葫芦，想尝一尝。”大姐还说：“就是这点钱，我还犹豫了几次，才给弟弟买了一串糖葫芦。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给他省学费，能让他把书念下来。”

大姐的叙述使我想到了金家的传统：有些东西可以吃最廉价的，穿也尽可能地省，但是书不能不念。可能也就是这种家庭的影响，再加上我的家庭影响，让我和我的先生都有强烈的求学愿望，希望我们的孩子上进、多学，永远不离开知识的海洋。

我父亲一辈子是教书先生，但英年早逝，在我出生后十个多月他就走了。我二十六岁的母亲，守寡一辈子，整天在耳边提示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有出息，给妈妈争气。”所以，从小我脑子里有一个牢牢的念头，就是“要好好学习，只能超过别人，不能落后”。

可能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力量，而又有着相同方向的合力，让我们对待孩子读书的态度出奇地一致。我告诉孩子：“‘拼裤子当袄’，也要供你们学习。”



父爱如山

他让我转告孩子的话是：“不吃不喝，也得供孩子念书。”这话正是出于我先生强烈的责任意识。

我有时候想，父母必须时时注意给孩子以力量，你的一句话就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有的孩子不就是接受了父母这样的观念吗？有的家长说：“上了初中，能写会算就行了，出来帮着爸妈做点小买卖。”这种语言信号到了孩子的头脑里，他的反馈必然是：“我的学习到中学毕业截止。”有的家长说：“我没读多少书，不也能挣大钱、日子过得很舒服吗？”这是值得很多父母思考和吸取的负面经验。

当然除了舍得花钱供孩子读书之外，只要有可能，为人父亲也应想到成为孩子学习文化的好老师，不能只依赖学校里的老师。要教先得学，这需要父亲热爱学习，有一定知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孩子的爸爸就被当“黑帮”揪出来，挨批斗、靠边站。不久我也因为“站错队”而受到冲击。这使我和我先生在对这场政治风暴很不理解的基础上，又痛感前途十分渺茫。我们认为，当了“黑帮”“三反分子”，继续在党校当教员，怕是没有指望了。孩子们大概也要一起跟着受罪，因为“前有车，后有辙”。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我先生和我多次商量，准备承受像1957年“右派”一样的不公平待遇。有时我说：“我们俩人还年轻，只是三十岁左右，到农村不可怕。反正是种地、种菜，六口之家总能糊口。”可是，我先生想得更长远。

他说：“饿倒是饿不死，穿得比较破旧，缝缝补补也能过得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我们可以在农村种一辈子地，但孩子不能不受教育。工资取消了，没有钱供孩子上学怎么办？”

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的中央党校的“五七干校”，过起漫长的农耕生活，一待就是四五年。真是前途未卜，唯一聊以自慰



的是还有工资，孩子还能上学。

有些天，我们常常为此而忧愁。最后，我们俩商量出一个主意：“如果命运真是这样捉弄我们，那么我们就自己给孩子当老师。没工资，孩子没钱上学，我们就在家教孩子念书，反正孩子得受教育，不能当‘睁眼瞎’，不能没文化。”

过去也有不少这样的先例。世界上著名的德国学者卡尔威特就是在父亲的教育下，九岁时已经熟练地掌握六国语言，并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尤其擅长数学。他在九岁考中莱比锡大学，未满十四岁获得了哲学博士，十六岁又获得法学博士，后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这就是父亲亲自教子念书而培养出的人才。卡尔威特的父亲是十八世纪普鲁士乡村的一个普通牧师，他能把孩子教育成才，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我先生说：“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我给孩子做语文和历史老师，你给孩子做数理和政治老师，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我先生和我经常在一起盘算未来，不仅增强了我们活下去的勇气，也充实了我们生活的信心，特别是对未来培养孩子的信念。我们心中寄托了一线光明。“文革”后我们果真被送到乡下，过上当年“右派”的生活。即便如此，我们也会积极地培养下一代，争取做到“绝路逢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许多事情放开了。把领取稿费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和“名利思想”的错误观点被否定了。这个时候，我先生和我拼命地写文章、写书。这样做，是为了“拨乱反正”，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历史一个公道。我先生是学党史的，我是学哲学的，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积极参加这种“拨乱反正”，有着一一种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义不容辞的强烈责任感。但老实说，我们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当时供养四个大学生念书，仅靠当时有限的比较微薄的工资，实在太困难。从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孩子是否能供下来，还是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两人写文章、写书、讲课，用我们所得的报酬可以给孩子做学费了。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慰藉。



父爱如山



写文章和书稿给孩子赚读书费

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先生的身体出了问题。

那个时候，他在全各地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课题。虽然大多是没有报酬的义务讲演，但他激情满怀，不停奔忙。他的讲稿被随便印发，到处传送，面积之广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人们纷纷来电话和书信，

告诉我先生，看到了他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稿，希望他能写得更多。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客观需要。再加上家庭的需要，我先生在那些年不停地写，不分昼夜地写。

有一年，他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还出版了个人第一本专著《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得了一场大病，肺部出现肿瘤，并且开刀割掉了一叶肺，同时拿掉一条肋骨。

同志们深切地关怀说：“老金纯粹是累的。”我们从来也没反驳过。因为每次他外出讲课回来，都说感到疲倦。后来，他在写文章时有意地放慢了速度，但还是疲倦。到校卫生院去检查，也找不出什么大毛病。一次集体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了他肺部有阴影。最终查明，肺部有三个隐藏的肿瘤。

就这样，我先生虽然病了，但他十分欣慰自己尽了一份理论工作者的天职，也尽了一份做父亲的责任，保证了四个孩子上大学的基本生活需要。

我先生的病，让我痛苦、不安、揪心，然而毕竟是“有国才有家”。改革开放，挽救了祖国，也救了我们的这个家，保证了孩子们的发展前程。解放思想，不仅使全国出现大转变，也解决了家里的大难题。工资加稿酬使我们有能力供四个孩子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



热心关爱第三代

作为一个好父亲，不仅要关爱自己的子女，还需要关怀自己子女的子女的成长。对孩子不过于宠爱或者溺爱，也不过于苛刻或者无理严惩。

“狼爸”想到了他的第三代，即儿子萧尧将来有孩子时。这比不去想要好，但是他想到的教育方式，还是一个“打”，像对待萧尧兄妹那样。他说：“我相信，如若有天尧儿做了父亲，必定也会采取和我一样的教育方式。”可是，萧尧却认为，“我不止一次想过要向父亲证明他教育方法的失误之处，因为照常理来说，按照现代社会教育的模式，他的教育方式绝对是错误的，是不健康的，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

我先生和我，对于“狼爸”的教育方式，是绝对不认同的，也是坚决反对的。

在我调到海南省委党校任副校长之后，由于女儿、女婿出国，我把他们的女儿李涓带到海南。在那里，我边当副校长边照顾她上幼儿园和小学，一共有五年的时间。

后来，社会治安发生一些严重问题，我担心孩子的安全，在第六年，小涓读小学三年级时，又转学回到北京。

此后，虽然有一位保姆照顾小涓的起居和上学，但是我先生的负担也加重了许多。当时，我先生的教学任务很重。他是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领头人，又是一个国家课题项目的负责人。研究这种“史无前例”的



父爱如山

“大革命”的工作，也是史无前例的，需要大量占有资料，搞调查研究，又需要把握住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的根本理念，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研究本来是很花脑筋的一件事情，他教学任务又非常多，既有校内的教学，又有外单位、外地的邀请，还在全国带了第一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博士生。一个博士生导师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带学生，对于他这位六十多岁的人来说，已经是相当困难了，可是他还要照顾外孙女。

由于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我先生对这个小外孙女的照顾，是非常热心的。每次小学开家长会，他都会到场，没有一次缺席过。有些年轻的父母，不去开会，老师有意见。老师和别的家长说：“每次开家长会总能看到坐在前排小桌上的老教授。他这位博士生导师，代表涓涓的父母，在那里总是很坦然地听小学老师对家长的训话。”一般的老人，如果不是具备这样强烈的家庭责任心，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有一次，我从海南回来，他还和我开玩笑：“去开小涓家长会的，就我这么一个秃头老爷爷，别人都是年轻父母。”

我问他：“你很忙，为什么一定去参加，阿姨不行吗？”

他坚定地说：“必须参加，因为在会上能了解到孩子的情况。有时候，会后老师还把个别家长留下，我也被老师留下过，单独谈孩子的问题。这样我们教育孩子就有针对性了。”

我先生特别注意有针对性地教育孩子。他常常对我讲：“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我们的第三代小涓，他也是这样十分严肃和认真的。每天晚上他给她看作业，看后还代替家长签名。阿姨的文化程度比较低，辅导小涓有些困难。这时候，小涓总是跑来找姥爷。我先生没有一次把她赶走过，也没有一次表现出不耐烦。

由于我仍在兼任中央党校教授，时不时回来，有的时候还看到他和小涓在讨论问题。有的问题他说了，小涓不明白，反问姥爷。他总是耐心地一一



解答。

看到这种情况，我感觉他对小涓的辅导很像对那些大博士的辅导，没有一丝的怠慢和应付，处处都非常认真。他做学问的严谨、他对孩子的教诲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这三者融会到一起，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的。

我先生备课、讲课、带博士生，还要时不时参加各种会议，任务繁重，时间总觉得不够用。但是，小涓每次放学后，有时候还叙述在学校学了什么和听到了什么新闻。孩子讲话不懂得控制时间，而我先生却从来没有不耐烦。他总是笑咪咪地倾听小涓没完没了的陈述。

有一次我也在场，小涓向姥爷说起了今天的课程是计算机发明史。于是，她就给姥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现在的计算机那么小，手提电脑成了笔记本，我们老师说开始的时候，一个计算机有几个房子大。后来，里面的构件改进了，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再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电脑外壳逐渐缩小，里面日益精密，才变成现在的手提笔记本式的计算机。”我先生耐心地听完后，说了一句：“将来还要小。”

当然，这些话是十多年以前说的了。但是，他能耐心地将孩子的话听完，而且听到的不是新知识，是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打断孩子，一定要认真地倾听呢？答案是为了最后告诉孩子的话。他常常说：“上课好好听讲，学科学不容易，这里的学问可大了。”

一般的父母，能承担起第二代的教育责任已经不简单了，而我们还要承担第三代的教育责任。我们的家教一丝不苟，这也是家庭责任心强的一个突出表现吧！



建立稳定的大后方

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努力才能承担的历史重任。给孩子缔造一个稳定的后方和欢乐的港湾，是父亲最为重要的责任。

现在儿童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在家教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误区就是有人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或者虽然承认家庭教育的存在，却又把责任完全推给孩子的母亲，以为“男主外，女主内”，父亲是管外的，能赚钱养家就可以了。

“狼爸”说“打”是他“家教最精彩的部分”。在《所以，北大兄妹》一书中，毫不隐讳地声称，他下了班，吃完饭就叫来四个孩子背书，背不会就打。最小的孩子犯了错误，几个大的一起挨打，名曰大的没有管好小的。萧尧在《读〈傅雷家书〉有感》一文中说：“做错事了，不听话了，便抄起鸡毛掸子，一人犯错四人齐打。”这种家教所带来的，是哭声、叫声。然而若是哭，“狼爸”还要加倍地打。这样，家里怎么能够祥和与安宁，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欢乐的港湾?!

其实，“父亲应该是家庭的主心骨，即在家庭中能起到保持家庭稳定、欢乐，让家庭有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父亲应该是好榜样，凡是要求孩子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孩子不做的，自己一定不能做；父亲应该是家庭的卫士，既是家庭稳定的卫士，又是幼小子女成长的卫士。父亲要保护家人及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一点是责无旁贷的。”上面的这三个“应该”，是我先生在接待



记者采访或讲家教课时，经常谈到的几个理念。

关于爸爸要成为孩子成长的守卫者，或者是成为一个家庭祥和的守护神，海南省《南国都市报》的记者李靖，对我和我的先生采访了六个小时，写了一篇长篇报道。

当时，我先生讲：“做一个好爸爸不可缺少的态度是，懂得父亲在家教中应尽的责任，特别是尽到守护和睦家庭的责任。和睦的家庭气氛是进行良好家教的前提。建立起一个孩子成长的‘稳定的后方，欢乐的港湾’是孩子成才绝对需要的。”

我们的老同学说：“你们是在深厚爱情的基础上组织的家庭，搭起了一个‘好班子’。”我先生和我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的老同学，在深厚爱情基础上建立起家庭，夫妻恩爱几十年。我们建立起的这个“稳定的后方”，是孩子的安全堡垒，能让孩子快乐、舒适地生活。

有人认为，两口子打架是两口子的事。其实，子女也很遭罪。历来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单亲子女由于成长环境不好，教育成才的概率比和睦家庭中孩子成才的概率要小得多。这是很多学者研究的共同结论。做父亲的为了孩子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就要担当起保卫家庭的责任。丈夫应是夫妻爱情、家庭和谐完整的保卫者，是子女身心健康的保卫者。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称职的父母。而我先生作为称职的父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

有位听我课的家长反映，某省的一位大学的教师告诉家长说：“你们做家长的职责，就是在孩子学龄前阶段管好他们，上学后就不用管了。”我听到这种说法当即摇了摇头。我认为，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和教育应该是伴随终生的。

大道无言。一个家庭中父母“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不能做的事，家长一定不要做，我先生终身遵循这一原则。他不抽烟、不喝酒，高兴了不过是同孩子们或者孩子的叔叔打打桥牌、下下棋



父爱如山

而已。

我家读书气氛浓厚，这是因为我先生和我在家里的空余时间都在看书报，并经常介绍一些书报给孩子们看。所以，四个孩子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我先生说：“父母要求孩子埋头读书，就要自己做好榜样。否则，爸爸很少摸书本，一看书就头痛，也就丧失了要求孩子读书的权利，这很难说服孩子。”日前看到一篇傅月庵写的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无论在台湾、大陆，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我家小孩喜欢阅读？’我的答案千篇一律：‘当父母的爱阅读，小孩就容易阅读；爸爸妈妈爱打麻将，小孩很快能上桌代打。这叫耳濡目染，一点不难。’”看来，身教胜于言教，应该是普遍的共识。

几十年里，我们除了照料、教育四个孩子，操持家务，还需要努力地工作。上面曾谈到，在四个孩子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拼命为报刊写文章，靠稿费供孩子上学。过度劳累使我头痛很严重，我先生也累出一场大病。父母勤勉自律、积极进取的身影深深烙印在每个孩子的头脑中，成为他们仿效的楷模。

上面列举的事实，说明家教不只是母亲的责任，父母双方都要负起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的责任应该更大些。不仅是作为母亲的我这样认为，我先生也是欣然认同，并极力提倡的。

遗憾的是，我们也不能不提到，现在有些父亲的做法。他们认为，赚了钱拿学费送孩子进学校就没有他们的事了，对孩子的学习不闻不问。他们以为给孩子吃饱穿暖，让孩子身体健康，就是尽到了父亲的责任。更有连这些基本要求也做不到的父亲，有了一点钱只顾自己尽情享乐。还有些父亲，每日下班后忙于打麻将、喝茶、泡“小秘”。一天能消磨上几个小时，却说没时间管教孩子。殊不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是终身的教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影子，父母在为人处世上给予孩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父亲在家里绝对不能把责任全推给母亲一个人。因为父亲的学习精神，父亲的操行品德、一言一行都在强烈地影响着孩子们。十八世纪法国的大哲学家霍尔巴赫，曾经谈道：“一个邪恶的父亲只能造就堕落的儿女；一个腐败的社会所能提供的榜样只适于腐化心灵和精神。”（《社会体系》，《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 645 页）一个父亲如果只顾在外面赚钱养家，给孩子交学费，而不管自己的品德如何，做人做得很坏，那么你所投入的教育经费，培养出来的子女很可能会像你一样的。

其实，父亲能够主动地负起对孩子的教育责任，这不仅是负起了家教的责任，而且是负起了社会的责任。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深刻地说：“现今的父母教育子女，就是缔造我国未来的历史，因而也是缔造世界的历史。”（《父母必读》，第 2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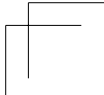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耐心好“家教”

“自然”很聪明地使得做父母的人无不爱护自己的子女，但是那种自然的爱一旦离开了理智的严密监视，就极易流于溺爱。他们爱护自己的子女，这个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他们常常连子女的过失也都放纵不管。

——英国哲学家洛克





养成学习的好习惯

循序渐进，是孩子成绩好的基本规律。教材，是老师们和教育专家苦心编撰的结果。每个教案，也都是老师日夜精心思考、书写的结晶。课堂学习和作业内容是不可中断的。这种连续性好比一条锁链，中间一个地方脱扣，就难以成为一整条锁链。所以客观上要求学生准时上课，按时完成作业。家教严格的父母，对此绝不会忽略。

“狼爸”很重视孩子上课和写作业，但有时方式很粗暴。女儿萧君的家庭音乐作业没有完成，他竟用藤条暴打一顿。他说：“在我打完之后，萧君的小腿上已经全是鲜红的血印。”“鲜红的血印”当然会给孩子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记。但不知“狼爸”想过没有，这会给孩子幼小而天真的心灵留下何种印记？可是，“狼爸”却认为“此番萧尧、萧君两兄妹同时考上北大的壮举，与我的‘打式’教育是分不开的”。看来，萧先生似乎没有想过，这种打的背后给孩子留下了多少阴影！

我家孩子的父亲，是怎样对待孩子缺课和完不成作业的呢？

七十年代初在“五七”干校的一天，从早晨起，天就阴沉沉地滴起雨点，不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河南的夏天一直非常热，有这样一个雨天，大人孩子都感到很欣慰。我们这些来接受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接受老天爷的厚爱，不用去下地劳动了，各自在屋里看书。

大约9点多钟，我先生出去方便，发现老三、老四竟没有上学。他们7



父爱如山

点 30 分离开家，9 点还没离开干校大院，两个人穿着雨披，冒着大雨，相互往身上踢水。

我先生一看，就急了，喊：“怎么不去上学？不要动。”他转回身来，进屋拿自行车，并告诉我老三、老四的情况。

我打着雨伞出去一看，两个人规规矩矩地站在水坑的边沿上，孩子的脸特别紧张和严肃。

我问：“你们怎么站得这样直，一动不动？”

老四说：“爸爸生气了，说我们不去上学、上课，让我们在这儿不许动。”

我一听，忍不住扑哧笑了。接着说：“爸爸几时罚过你们的站？他让你们不动，是取自行车送你们上学。你们已经耽误很多时间了，走到那里第二节课也快下了。”这时，两个孩子脸绷得不那么紧了，轻松许多。

爸爸把车推来了，一前一后，驮着他们，骑着自行车走了。我送到路口，还目送了一程，看到农村这种晴天一路灰、雨天满街泥的“水泥”路，真有点担心他们会摔着。

果然不出所料，隔了一段时间，三个人满身泥泞地回来了。换好衣服，看到爸爸妈妈虽然不高兴，但没有打，也没有多批评他们一句，孩子笑着向我学说事情的经过。他们觉得很好玩，高兴地诉说着，我也高兴地听。据他们说，爸爸在驮他们上学的路上，因为雨下得大，路上满是泥水，自行车很难骑，骑到离学校还有一半路时，自行车倒了，三个人都摔得满身泥。

当时过路的人很少，对面走来两个人嬉笑着，一个指着我们说：“你看，三个泥猴！”

爸爸生气地说：“有人在大雨中还看别人的笑话。”

到学校后，老师见三个人的样子，先是对我先生说：“你们对孩子学习要求这么严格，我们很感动。”后来，这位女老师又说：“孩子身上湿成这样，没办法坐下来上课了。你看，他们现在都在打哆嗦。”



两个孩子可能是因为雨大、湿透了，也可能是因为第一次逃学有点怕，所以哆嗦不止。老师让回去，看爸爸不表态，接着又说：“这样吧，今天不算旷课、逃学，就算他们请假了。”这时候，爸爸才同意把孩子领回家，而且为孩子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假条，交给了老师。

这件事对孩子教育很大，他们一生都刻骨铭心。《南国都市报》进行越洋电话采访时，金煜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家，并且也已是孩子的爸爸，还向记者专门谈到这件事。

记者在报道中是这样写的：“金延语调轻松幽默地说：‘记得在河南干校时，我和小哥金侠逃学，爸爸那次很生气，亲自骑自行车送我俩回学校，自行车前面驮一个，后面驮一个，路上很泥泞，结果我们三人都摔倒了。满身泥巴没法上课了，爸爸找到老师给我俩请假，又用自行车把我们驮回来。那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旷过课。’”

记者还写道：“金延说：‘我家非常温暖，家中空气亲切、平和，挺像个家的样子，父母似乎一辈子也没在家中大喊大叫的时候。’”

我先生回来没有打骂孩子，然而他的行动是严厉的，让孩子以后“再也没有旷过课”。所以，为人父者需要想方设法对于孩子进行教育。言教也好，身教也好，要教给孩子怎样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正如鲁迅所说，“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2卷，第15页）



像萤火虫一样照亮别人

家教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目标教育，特别要教育孩子懂得学习的大目标和小目标，这样学习才有动力。

“狼爸”也让孩子树立学习目标，但是张口闭口总是一个“北大”。上了北大，他的狂喜，给人的感觉好像学习的目标就此到顶了。这未免太局限了。萧尧高中文科读得好，所以“狼爸”说：“作为一名文科生，有这样优异的成绩，我自然把目标定在了中国文科大学里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从兄妹俩上高中开始，我便时刻把这个目标挂在嘴边，鞭策着儿女们。”别人夸奖他的孩子，并让他“好好说说你是用什么魔法教出来的”，他说：“他们全都是打出来的！是硬生生打出来的！”

我先生给孩子树立的大目标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近期目标可以有多种，比如学习期间的目标是“一定要好好学每天的功课”。

小孩子毕竟好奇、贪玩，而且自我控制能力差，特别是大儿子金煜。一次早饭后去上学，他一路打蛤蟆，到达“五七干校”距离不远的农村小学时已近中午，快放学了。知道了这个情况后，我先生邀我一起同金煜谈话。

我们反反复复地讲：“学生的天职是学习。”

爸爸还针对“文革”时期广为流传的“读书无用论”，特别强调：“以后国家还是要搞建设的，要建设就得有文化，就得有科学知识。你们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知识，念好书，将来会有大的用处。”



所以，在三十年后记者采访时，我大儿子对记者说：“父母在关键的时候对我们的管教不放松。那时在河南农村，我上学路上一路打蛤蟆，等到学校已经快放学了，父母教育我牢记‘读书是学生的天职’，以后对上学再不敢怠慢。”（《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

我们的家教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给孩子进行目标教育。考虑到讲大目标，他们都小，不好接受。所以，我们就从很小的小事说起，提出每一步的具体目标。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讲什么问题，都是希望他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先生还特别针对老二淘气，讲过“千万不能成为社会的渣子、累赘、罪犯”。

我们还给他们讲给金莹姐姐起名的故事。

爸爸特别问几个儿子：“你们知道姐姐的名字，‘莹’字为什么下面放一个‘虫’，而不放女孩名通用的‘玉’字的‘莹’？”

几个孩子同声说：“不知道。”我先生和我你一句，我一句，像讲故事一样讲为大女儿起名字的事。

我先生说：“我们并没有为你姐姐编织豪华的前景和耀眼的光环，让她成为晶莹的宝石，而只是希望你姐姐成为一个小小的萤火虫，能在夜里发一些微光，照亮别人。”

当听到几个儿子笑着说“我们也能当萤火虫”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

我先生和我还经常找一些介绍英雄和科学家的书籍给他们看，让他们当英雄，向科学家学习。这一切在孩子的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看了这些书后，孩子们头脑里就树立起各种各样的英雄、科学家以及其他的优秀的历史人物，将其作为个人的人生楷模。



爸爸告诉金煜：“一定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爱如山

从金煜逃学以后，我先生多次反反复复地对他说“念书会有用的”，而且很严肃地讲：“你念好书，对社会起好的作用；念不好书，你会成为社会的渣子、累赘、罪犯。”这种沉重的语言，对孩子来说，不啻敲起了一声警钟。我先生爱孩子，但从来不溺爱孩子。正如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爱不够，子女就会感到痛苦，但是过分的溺爱虽然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却会使子女遭到毁灭。”（《名人家教集锦》，第 398 页）



和孩子谈话有诀窍

上课听讲时注意力集中，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孩子好奇心强，容易被各种诱惑所影响，也容易转移各种兴趣爱好。

我们的大女儿金萤，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迷上了画画。无论上什么课，她都在下面画自己喜欢的画。班主任找上家门来说：“金萤在课堂上不守纪律，总搞小动作。”我先生和我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师，并客气地询问：“她上课都搞什么小动作？”

老师回答说：“她有时候画少数民族的少女。最近一个时期，迷恋上了仕女图。她把小人书上的仕女，一个一个地描画下来。”老师还谈到金萤这样做的影响：“这不仅影响了金萤自己的学习，还影响了周围的小朋友。坐在她周围的，听会儿课，头就扭到金萤那边，看她的画。因为她画得很漂亮，小女孩都喜欢，有吸引力。下课的时候，一帮女孩围上去看，也影响孩子们到户外运动。”

老师不止一次地来家谈到金萤的这种情况，有一次还说：“课堂讲的内容，问她什么，她都能答上来。作业做得好，考试也考得好。我们考虑她精力有余，准备给她跳级，特别来征求一下家长的意见。”

我们说：“请老师让我们考虑考虑。”送走了老师以后，我先生反复和我商量该怎么办。

在《所以，北大兄妹》一书中，“狼爸”说：“当年，正是我的母亲，一下



父爱如山

下用‘棍棒’打出了广东省文科高考第八名的才子、曾是广东省最年轻副科长的我”，“正因为如此，我才秉承了母亲的‘棍棒’哲学，一点点地把四个孩子打成了优秀少年，也一点点地把萧尧、萧君打成了北大兄妹。”他还说：“我常对儿女们津津乐道的，便是母亲的打文化。拿不到满分，打，差一分打十下；被老师家访，打，家访一分钟打一下……”

金萤老师来家访问多次，最少的一次三十多分钟，合起来几个小时，那么，金萤该挨几百下打了！可是，我们一次也没有打过她、骂过她。我先生多次来找我商量如何解决她的问题，和颜悦色地同她谈话。

记得，孩子爸爸来找我说：“小萤不能跳级，学习需要循序渐进，才能把基础打牢。”

我也说：“我们这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小神童、小天才，金萤也不过是有些兴趣转移，我们把她拉回来就是了。”



金萤十多岁描画的少数民族少女

过了几天，我们一起去找老师，表明了我们不赞成跳级的态度。老师也没有勉强，只是说：“请你们做做工作，让她上课别再画画。我多次说她，她都不听。”

遵守课堂纪律，说起来不是很大的事，但对于以上小学为主业的孩子，也不能算是小事。我先生和我都比较看重这个问题。因为不仅纪律观念和守纪习惯需要从小养成，而且良好的学习习惯也只能日久为功。小学生的知识来源主要是老师的授课，不听课或者不集中精力听老师的课，不仅孩子的学习基础打不牢，还会影响到班集体。

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先生和我一起找金萤谈话。然而，这次谈话很不顺利。正像她在接待《南国都市报》的记者电话采访中所说的，有



时候跟她谈话，她又哭又闹，因为她的自尊心特别强。

我们说：“你上课不注意听讲，影响自己学习，又影响小朋友。为什么总要画画？”

她说：“我画画怎么着？老师总提问我，我对答如流啊！她总抽查我的作业，我也都给她做上了。考试我也给她考得很好啊！”

她爸爸听到这话以后，立刻说：“小萤，你在给谁学习？怎么一口一个她啊？你是在给老师学习吗？你是在给自己长见识，增加学问，怎么是这种学习态度呢？”

金萤还很不服气，说：“我在班上学习很好，她不说。你们怎么知道的？还不是老师来告状了！”

第一次谈话，我们说了很多要守纪律的话，开始她顶撞，后来沉默不语。最后，不欢而散。

我们又等待她两天，看她会不会主动来找我们谈上课不再画画的事。可是，她每天放学后，照样地说呀笑呀，好像课堂上根本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我给老师打了电话，问：“金萤这两天上课还画不画画？”

老师说：“照样画。你们谈话了吗？”

我说：“谈了。”

老师很直率地说了四个字：“没起作用。”

我对我先生讲了金萤这两天的表现。我先生说：“还得谈话，课堂学习中精力特别重要。”

我也说：“全神贯注地听课，这才能练好小孩的‘基本功’。”

可是，当我们又找金萤谈话的时候，她态度很不好，找了很多话来对付我们。

我开始问：“金萤，为什么谈话以后，你还在画画？这一次可不是老师来告状了，是我打电话问的。”



父爱如山

她竟然能用这两天想出来的一条小歪理来理直气壮地对付我们，说：“不让我画画是不可能。我是属猴的，上课手总得动，不画画也得干别的。”

我先生来得快，针锋相对地说：“属猴的为什么就可以不守纪律？你别忘了，爸爸也是属猴的。可是我小的时候上课，特别守纪律，全神贯注地听讲，从来不像你这样。”小萤觉得自己理亏了，又不说话了，嘴里好像在嘟囔什么。

我说：“小萤，你能不能大一点声说，妈妈和爸爸看看你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就听你的。”

她很不高兴地说：“人家学习好，你们不表扬，抓住一个画画问题就没完。”

后来，我们俩人耐心地给她讲了上课集中精力听课的好处，而且告诉她：“上美术课，你可以尽情地画，回家写完作业也可以画，但是上其他的课程不能画。”她表示同意了。

可是，过了几天，刚放学，她就来找我们“算账”了，说：“我们那个年级有好几个同学学得好，跳级了。听说我们班的老师也想让我跳级，你们不同意。”

我先生和我一起耐心地解释，给她讲了学习要循序渐进的道理，也讲了要打好基础的重要性。

我先生谈道：“我们家的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天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我也特别强调：“小同学夸你是‘才女’，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真是什么‘才女’而自满自足。如果真是这样，才高八斗，也不过是个狂徒。”经过这几次认真耐心的谈话后，金萤在课堂上不再画了。老师也没有再找我们提过意见。这里需要顺便交代一下，那几位跳级的孩子，后来的学习实践并不顺利。

从我们同小萤几次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先生提出的问题“言简意赅”。在第一次谈话当中，他问小萤：“你是给谁学习的？”这恰好抓住了孩子对老



师的不满情绪，第二次谈话中又抓住了“属猴的为什么就可以不守纪律”，让小莹无话可说。在这同时，我们又给她讲了很多正面的道理，比如对问题应该怎么看。我先生向孩子提问题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一点咄咄逼人的样子，还是笑呵呵的。

这里有一个谈话的艺术问题。

我在各地讲课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你们是怎样进行‘小屋谈话’的？”我对他们谈了自己的经验：和孩子谈话不能随随便便说几句，就认为可以解决问题了。谈话谈好了，对孩子确实有教育意义，实际上是一种智慧的交锋，也是一种个人修养的较量。往深里讲，家长需要运用好自己的智商和情商。智商，是说你所讲的道理要说得过孩子的歪理，给他“拨乱反正”；情商，是说你始终保持一个好的情绪，不发火、不恼怒，用耐心、苦心去说服孩子。这也反映了我们教育孩子的特有风格。谈话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斗智”的过程，但不是“斗勇”，不能搞得剑拔弩张、情绪激烈，甚至让孩子出现对立情绪、逆反心理，那样，谈话实际上就失败了。

我先生的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家教上，他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的。一位他亲自带的博士生曾经讲：“金老师有很多风格——严谨、平和、明快、达观。”

其中讲到“平和”，这对于教育孩子特别重要。这里有一个心态与个人修养的问题。

这位博士还说：“和金老师在一起，绝对感受不到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而觉得他是在对你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他总是把理讲得很充分，而且从不偏激。激情可以出诗人，但激情绝对出不了历史学家。历史学家需要的是理性，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辩证思维。有了这种理性、冷静的头脑和辩证思维，说出的话、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平和的。”

我先生对女儿爱得很深，但该对孩子进行教育时绝不迁就、姑息。他和



父爱如山

小萤的谈话就是非常理性的，对孩子的错误一点都不让步。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洛克，曾经讲道：“‘自然’很聪明地使得做父母的人无不爱护自己的子女，但是那种自然的爱一旦离开了理智的严密监视，就极容易流于溺爱。他们爱护自己的子女，这个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他们常常连子女的过失也都放纵不管。”（《教育漫话》中译本，第 25 页）



不怕别人问

学问，要学习得好，就不要怕别人问，自己也要多想些问题，去问别人。

我家的老四金延，从小就爱读书，他的兴趣很宽泛，不仅喜欢历史故事书，而且喜欢自然科学书。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自然科学通俗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的多卷本，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所以其中的很多情节，他都能给小朋友讲出来。

大概在他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问他自然科学上的问题，而且一个接一个地问，给他“将军”，让他照着《十万个为什么》上面讲的回答。我和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当时都在场。

金延这个人历来非常老实，好像没有感到小朋友是在向他“将军”，他们平时的关系也很好。他就一一地回答。两个人谈的时间很长。那一天，外面在下雨，我们没有劳动，我和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坐在他们旁边看书。

这个小朋友问道：“你给我讲讲，电灯泡里的钨丝是怎么装进去的？”

老四回答不上来。小朋友说：“你不是看完了《十万个为什么》，怎么回答不上来了？”

老实的老四，憋得脸通红。这时候，小朋友的妈妈说话了：“你别为难老四，你自己不好好看书，还考人家。老四，不给他讲了，叫他自己看书去。”这位妈妈也是我们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教员，我们一起工作多年，也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几句话给老四救了驾。



父爱如山

当星期六我用自行车带老四回到校本部的家里时，对我先生谈到这件事。我是为了表扬他，说：“手里没有《十万个为什么》，很多问题还给小朋友回答得很流畅。”

可是，老四却对爸爸说：“不行，爸爸，我给问住了。”老四说这话时，还表现出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好像是在说：“我应该答出来，但是没有答出来。”

我先生看透了孩子的心思，立刻说：“老四，不要怕别人问，人家问你问题越多越好。答不上来再找书嘛，你这不又增加了知识！”

我当时为了给老四解围，特别提出：“爸爸给说一下，钨丝是怎么装进灯泡的？我也不知道，所以，那天我也没有说上来。”

于是，我先生就讲了灯泡的制作，钨丝装进去的过程。我一听，也长了见识。

老四特别高兴，说：“等我回去就告诉小朋友。”

爸爸说：“老四，人家给你提问题，你一答不上就脸红吗？”

老四这个孩子很坦诚，立刻回答：“是的。谁问我问题，我答不上来，不好意思。”

爸爸说：“没关系，学而后知不足。知不足就是进步，再学嘛！”

爸爸鼓励儿子不断学习，不要怕回答别人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不仅是在教育儿子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去探索知识，而且也反映了他本人对待学问和一切问题的态度。他带的一位博士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金老师特别达观，别人对他的文章一旦提出了问题，我们转达给金老师，他总是非常耐心，一一听取，然后作出分析，而且指出哪些有道理，需要进一步思考、完善，哪些地方自己的论点正确，需要坚持。”他还说：“在金老师身上，没有丝毫‘文人相轻的陋习’和‘固执己见’的风气，只有对科学和对真理的尊重。”



家有藏书胜黄金

中央电视台到我家采访并做节目的时候，对我家的地下室小书库特别感兴趣。他们带着闪光灯和摄像机亲自到里面观看，并摄录拍成电视片。我先生打开了我们地下室的门，对电视台的同志说：“我家有三件宝：第一是孩子，第二是书，第三就是我们老两口。”

孩子们都读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哈尔滨的娘家探亲，我哥哥对来看我的亲戚说：“你们别看我妹妹穿得不行，好像没钱，其实她的钱最多，她家的四个孩子都是用钱堆起来的。谁家的钱能够堆那么高？”大家都被说笑了。

一进我家的地下室，映入眼帘的是我先生和我精心设计的铺有地毯的小图书室。为了防潮，我们铺了两层绿色化纤地毯。里面有书桌，还有红色的软椅。屋子的周围全是书柜，一共有十个书柜。我先生对这里的书都做了精心的整理。

一般的家庭都把过去的旧桌椅板凳、新房用不着的东西放到里面，作为储藏室或者小仓库。

搬家时，我和我的先生商量，对他说：“咱们的旧东西是不是都送人？反正新房装修时，已经都做了衣柜，我们再配少许的家具，屋子搞得清清爽爽的，旧的家具一律不留，把地下室腾出来做书库。”

我先生一生克勤克俭，舍不得扔掉任何一点东西。开始商量的时候，他没有表态。我知道他是舍不得丢掉过去用过的一些东西。他特别喜欢自己那



父爱如山

个大大的办公桌。可是，由于体积过大，桌子搬不进新房。但是说要送人或丢弃，他还认为很可惜，多天没有表态。

但是，他爱书，也希望给这些书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在我们新居的楼上，特别为他做了“通天”的一面墙的大书架，可能放下的书比我们家的藏书要少得多，绝大多部分书放不进去。

我看得出他的矛盾心情，既想把他心爱的书摆在地下室，又怕过去的家具和其他的需要储藏室保管的东西没处放。我静静地等着。

最后，他在矛盾中作了决定，说：“我同意把地下室变为小图书室。旧的东西按照你说的办法处理。”



家有藏书胜千金

这样，我们就精心地收拾起地下室来。开始，搬运工是把书一捆一捆地放在地下室。为了书在书柜里排列有序，我先生整理了几个月。他高兴地向记者述说：“这第一个柜子是‘一战’的书，就是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书；第二个柜子是‘二战’的书；第三个柜子是抗战的书；第四个柜子是解放



战争的书；第五个柜子是建国后的书籍；其他的是哲学类、科学类的书籍；最后的部分还有各种知识类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后党史有关书籍，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籍，放在楼上书房里边。”他还补充说：“哲学书籍多，因为李教授 1991 年去海南省委党校任副校长，主管教学，把哲学的书大部分带到海南去了。那里还有四个书柜的哲学书。”

在他给记者的介绍中，能看得出来，他对我们的小地下图书室是充满着乐趣的。这和他一生爱书，喜欢读书有直接关系。他把每一本书都当作宝贝来珍藏着。

我先生对书的喜爱，也都耳濡目染地一并传给了孩子。他们如今也都是十分爱书的。

比如二儿金侠前几年回国讲学时，就专门买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飞越太平洋运到在美国的新家。不过，有了现代化的电脑和网络，随时都可以从全国甚至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图书馆调来文献资料查阅，所以他们就不用着自己的家庭空间里专门留下一个图书室了。

我家的图书室，很多书都是专业需要的，有些是比较难买到的。这些书，我们要作为自家的传家宝尽量保留下去。



玩中乐、乐中学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带孩子尽情地玩，也是爸爸必须学会的技能。在家里玩可以，出游更好。一方面，让孩子的大脑得到休息，以保证有充足的精力投入学习；另一方面，在带孩子出游时，爸爸能够注意到孩子们对事物的观察力，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样，能够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激励他们进一步自觉学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狼爸”只愿意孩子读书，不愿意孩子玩。他说：“孩子的天性是玩乐，如果父母引导不好，孩子最终只会沉溺玩乐、玩物丧志。在孩子的字典里，电视、游戏、娱乐项目、零食等字眼早已被我一概删除。”他也不愿意孩子出游。书上说：“我并没有阻碍孩子们游山玩水。相反，我还常常带着他们去各地旅行，有照片为证！萧尧对这一点从来不认同：‘连高中毕业旅行都不情愿答应我去！春游从小到大就去过两次！’”

我先生和我星期日特别愿意带孩子出去玩，爬山、游泳、郊游、逛公园。我们也经常对孩子讲：“休息不好，也学习不好。周末好好休息，下一周学习才能精力充沛。”所以，我们要求孩子在玩时，不要想书本上的东西，要尽情地玩，开心地玩。

但是我发现，孩子在玩中、乐中，也能够学习到东西，会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而这是坐在家里，从书本上学不到的。

有一次，我们全家六口去爬北京青龙桥镇旁的小山。山下是西山和温泉



两条公路进城的交会路口。现在的山上，有很多墓地、墓碑。当时没有这些，整座山只有绿树，很清爽。

但是，孩子们第一次上山就发现了那里有一个碉堡，老三喊：“爸妈，快看，那儿有个碉堡。”当我们走到碉堡跟前时，看那上面，什么也没有写，没有被当作历史遗迹。

我先生问孩子们：“你们说这个碉堡是干什么的？”四个孩子谁也回答不上来。

于是，我先生详细给他们讲述了北京解放的经过。他告诉孩子：“解放军进北京，国民党守城的将领是傅作义将军。经过谈判，他率军起义，北京和平解放。解放军是怎么进来的呢？有一路就是通过青龙桥，再经过现在中央党校的位置，解放了北京西部。当时这里还没有中央党校。部队又经过北大、清华等地，才慢慢地到了西直门，形成城内外的对峙。所以，这里是从西北部进北京的必经路口、交通要地。”

孩子听了以后很高兴，说：“啊！这个碉堡是当年国民党为了抵抗解放军进城而特别修建的。”

我先生说：“不错，你们脑子挺快。”

由实物引起联想，回来后，大一点的孩子们就要求爸爸给找有关北京解放的书看。我先生是学党史的，这当然难不倒他。孩子看了有关的书后，对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特别是北京的和平解放，有了粗浅的了解。加上又有山上碉堡的印象，他们对历史似乎有了一点真情实感，觉得很满足、很高兴。

还有一次，我先生带三个儿子骑自行车去郊游。因为只有一辆自行车，载不了三个孩子，只好采取老鼠搬家的办法，把孩子驮到了离党校二十多里路的温泉疗养院，爬上附近的一座小山。

孩子们又在山上发现了一个没有看到过的东西。金煜跑得快，跑累了蹲



父爱如山

在那里喊：“快来看，这里山上有一块石碑，不知是干什么的。”

我先生仔细观察碑文后说：“这是‘滦州举义纪念碑’。”

于是，他给孩子们简单地讲了辛亥革命中的故事：

1911年10月10日，由国民党领导的武昌新军发动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和清军展开了激战。清政府从奉天（现在名沈阳）调第二十镇（相当于师）入关，到了冀东的滦州，名为举行秋操，实为调集兵力保卫皇廷。但这支军队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在10月29日，联合一起举行秋操（秋季军事演习）的四个协（旅）的协统（旅长）联名打电报，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召开国会，起草宪法，实际上支持了起义的武汉新军。这就是“滦州举义”。同一天，山西省的新军将领阎锡山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这就从东西两方面给了清政府严重的打击。虽然这支滦州举义的军队后来被分化了，统制张绍曾也被迫离开了这支军队，但这件事本身对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是有功劳的。所以，民国后建立了纪念碑。

在讲完这段故事之后，我先生又说：“这段历史在过去沉埋了多年，我过去没来过这里，也根本不知道这里还有这样一块纪念碑。”

孩子反应很敏捷，说：“爸爸，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呀？”

我先生回答说：“我是学历史的嘛！”

孩子问：“那妈妈呢？”

我先生立刻说：“妈妈是学哲学、教哲学的。妈妈知道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几个孩子喊着说：“爸爸说得对。”

这两次郊游让我明白父亲要在玩的过程中，注意不失时机地多教给孩子一些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获得知识是很活泼的，印象深刻，而且自然而然地会启发孩子的求知欲。这将终生受益。

前一段，我外出讲课，请来我东北的表妹做助手。她回忆起三十多年前



来我家的情况说：“上一次来姐姐家时，是老四（金延）带我游颐和园，一路给我讲解，讲得最多的是颐和园长廊中的彩绘。”她还说：“我们一路走，老四一路讲，又一路仰头看，脖子都疼了，可是，特别有意思。老四讲到，有的画的是《三国演义》里的事情，有的是《西游记》里的故事，还有的是《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我当时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够知道那么多东西？’我问他：‘老四，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孩子回答：‘我们经常来看，爸爸常常讲，我们回去还看书，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都记住了。’”

表妹这样一讲，我也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因为老四记忆好、会讲，我们的亲戚从东北来，多半让他陪同去游颐和园。

中央党校与颐和园只有一路之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园门票很低，我们经常带孩子们去游园。孩子们不但对建筑有兴趣，对长廊中各种彩绘的内容也特



老四金延（右）留学回来还很喜欢同爸爸（左）一起游颐和园

别感兴趣。看到孩子不停地问，做爸爸的不厌其烦地讲。当时我想：“这有多累！”真没有想到，爸爸的讲述在孩子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孩子们对古代文学名著的学习兴趣和欲望。孩子们不但当时记下了爸爸讲述的内容，而且回家又主动找书看，使知识更广泛更充实。

其实，孩子们的知识就是在课堂、家教、参观、郊游、日常交谈、看书等多方面的交汇中，逐渐丰富和积累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们对古代文化学习结出的硕果，显示出爸爸的自然诱导之功，如春雨润物生根发芽，远远胜于强制灌输。



什么才是真正的偶像

中华民族古往今来涌现出无数英雄儿女。在家教中，应该把他们看作“各路的神仙”。如果家长不以这些活生生的英雄事迹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去引导孩子，一味地去背诵古文，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狼爸”的家教内容中，多是《三字经》《声律启蒙》等。重视传承中国古代文化是对的，但却见不到让孩子学习英雄的内容。他忽视了培养孩子优秀品质、升华人格的教育。

我家孩子是在学习英雄的教育中长大的，我先生对此尤为重视。

在中央党校河南“五七干校”的时候，爸爸被抽调到一个公社的生产队当驻队干部，很长一段时间没在家。这个时候，大儿金煜多次问我关于韦拔群的事。

有时，他问我：“妈妈，韦拔群怎么那么勇敢？”“‘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大屠杀，共产党都转入地下了，他怎么敢于公开斗争？”有时他又问：“韦拔群参加了百色起义，是怎么回事……”

我是学哲学的，对党史不熟悉，对韦拔群更不熟悉。我知道孩子是从《星火燎原》一书里，知道了有个叫韦拔群的革命英雄。由于书中写的是广西百色起义，不是专门写韦拔群的，因而金煜深感书中写的内容太少，不满足。虽然我知道得也不多，但我不能打击孩子学习英雄的积极性。于是，我告诉金煜：“等爸爸回来，我让他找一本有关韦拔群的书给你看。”



“五七干校”非常简陋，每家的居住面积很小。一间教室隔成六间，每间住一家，大概只有十多平方米。放下一家六口人的床，房中几乎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下干校带了一小部分书，都装在纸箱塞进木板床底下，找起来很困难。下干校前，军代表告诉我们只带《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就够了，不要再带其他书。所以，我们下干校前忍痛处理了许多书。有些实在舍不得的关于党史和哲学的专业书，我们都是偷偷带下来的，平时也不敢翻它。

可是，我先生回来之后，我告诉他：“金煜想知道更多的关于韦拔群的故事。”我先生不顾一切地从床底下把纸箱拉出来，一箱一箱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他说：“咱们有一本专门讲韦拔群的小册子。”翻来翻去，他终于找到了，是由谢扶民编写的《韦拔群》，工人出版社1959年版。书不厚，只有八十多页，但不同于其他文章和回忆录，只是联系谈到韦拔群，这本书是专门谈韦拔群的，属于个人传记类，讲得比较完整。那个年代的个人传记比较少，只有著名的革命先烈才能获得这样的殊荣。而韦拔群既是革命先烈，又是少数民族壮族的革命领袖。书中谈到了韦拔群的少年，也谈到了韦拔群的成长，还谈到韦拔群参加革命和在百色起义中的作用。这本书由韦拔群的战友、上级张云逸大将亲自做序。

金煜拿到爸爸找的书，立即抓紧时间赶快看完，还同爸爸讨论。金煜的特点是好问。平时不管什么问题，都愿意问爸爸，有时还同爸爸争辩，越辩越明。由于爸爸年岁大，知识渊博，金煜常常“败下阵来”。所以，金煜从小到大，在爸爸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金煜（右）爱问爸爸（左）问题，
俩人还常常争论和深入探讨

这一次，金煜看了爸爸找到的关于韦拔群的书，特别高兴，把这本小册子看了好几遍，非常满意。他好像又发



父爱如山

现了一个英雄，而且还要向这位英雄学习。他经常和小朋友说“韦拔群真了不起，别人都转入地下了，他还敢于在地上斗争”，“韦拔群的群众关系特别好，大家都喜欢他，叫他拔哥”等。

生动形象的英雄成为孩子的榜样，对孩子一生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我联想到当前在青少年中有一个普遍现象——“追星”。看来，人的头脑中是需要有自己崇拜的人物的，特别是青少年。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崇拜对象，而在于这个被崇拜的对象是谁。“星”当然是可以作为一个崇拜的偶像去追的，问题是向这个“星”追什么。父母的职责不是去禁止孩子追星，而是帮助孩子选择合适的星。



舍得让孩子吃苦

没有哪家父母不爱孩子、心疼孩子的。但把孩子“捆绑”在家庭四壁中，怕孩子外出遇风险，限制孩子的行动，却是家教的禁忌。

“狼爸”禁锢孩子，对孩子进行苛刻的“社交控制”：不让孩子接触社会，怕“受到错误思想的‘毒害’”；不经他的考核，不让孩子与同学有深度交往，怕受到不良影响；不让孩子参加校集体旅游，怕“不安全”；不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怕影响学习；不让孩子打篮球，怕不懂珍惜时间……

我家孩子的父亲则相反，他爱孩子，心疼孩子，却主张孩子到社会的大熔炉里锻炼，经风雨，见世面。

当年大女儿高中毕业后，被送到北京西北郊北安河公社插队劳动，很苦，甚至当农村教师，夜里独守校园，特别危险。他不像有的人走后门把孩子调回来，而鼓励孩子独立锻炼，不怕经风险。

我们的大女儿金萤在高中毕业后，按当时的规定到北京西北郊北安河公社插队劳动。后来，那里的一所中学缺少一位化学教师和一位物理教师。没有老师上课，社里决定就地取材，征求下乡知青的意见，请他们报名支援。当时在那里的知青人数不少，但没有一个愿意报名。其中原因有很多：高中毕业教初三，有水平问题；中学是在乡村的边上，校舍破旧，邻居很少，人们感到不够安全；还有的怕当了中学教师，就会妨碍抽调回城……

金萤经过思考，服从了组织安排，也没有和父母商量，自己去担当了这



父爱如山

个教职。我们知道她已到中学上了班，一个人担任两门课程。她高中毕业去教初三，也知道困难，但她更怕在农村干几年活，把已经学到的知识忘记了。当教员既可以温习、巩固已有知识，还可在教学中吸取新知识。我先生和我虽然有些担心她的这个决定，但并没有反对。我们相信困难是可以锻炼人的。

她明白自己知识不够，常常趁没课的时间，骑自行车到海淀区的教师进修班去听课，再骑自行车回到中学，往返七十八里路。她爸爸和我看到孩子这么劳累，很心疼。

有一次，我对我先生说：“算了，能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不要跑来进行修了。再说，每次学完天都黑了，自己骑自行车回去走那么远的路，很危险。”

可是，我先生却坚定地说：“还是要她锻炼，多学一点是一点，到海淀进修，一方面是为了教好现在的学生，另一方面也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会学得更多、更扎实。我估计早晚会恢复高考，因为中国发展需要大学生。孩子总需要读书，高中毕业生再读书，就是考大学。”

我觉得他看得很远，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忍痛让女儿来回经常跑，补习课程。这样一来，金萤教得很好。她同时负责的两门课，学生都很满意，最后还受到了学校的表扬，被评为优秀教师。

我去过金萤教书的中学。晚上看到老师和学生都回家了，院子里只有金萤的小屋才有灯光。我很担心她，每次过去都要和她一起住。她一面安慰我说“妈妈不要怕”，一面用一个大门杠把门顶上。学校没有什么像样的墙，很多地方已经倒塌了，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大门很破，关不严，也没办法上插销。所以，女儿只有把自己的小屋顶上门杠。有一次我是冬天去的，屋子很冷，外面寒风呼啸着，好像还有什么林子里野兽的吼叫声。一个大人在那里住都会很害怕，何况一个二十岁的姑娘。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矛盾，到



底怎么才能让她回到城里来呢？

三位弟弟骑自行车去看姐姐，回来说：“爸爸妈妈想想办法吧，姐姐教书的大院子只有姐姐一个人住，太危险。”

我心里很矛盾，但又觉得应该让孩子自力更生，在农村很好地锻炼。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先生以后，他坚决支持。

后来，孩子爸爸和我又找几个儿子谈：“爸爸妈妈不是对姐姐不关心，让姐姐在农村好好锻炼几年，苦一点，累一点，哪怕经受一点风险，对姐姐有好处。以后经受到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风浪、再大的沟沟坎坎，姐姐都能够有勇气撑过去。”

当时是 1975 年冬，离粉碎“四人帮”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爸爸说，孩子们会考大学，我还将信将疑。没想到 1977 年秋恢复了高考，我们全家当然十分高兴。金萤又有了考取大学的机会。女儿有些信心不足，我们一再鼓励，结果她不仅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而且以高分考取了她所喜欢的医科大学。



两耳需闻窗外事

父母要给孩子讲国家大事。如果文化水平允许，要讲国事、天下事，这样孩子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放眼世界，热爱祖国。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瑰宝。“狼爸”教孩子掌握中国文化，让孩子“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摇着头就能诵出《声律启蒙》”，这是值得赞赏的。然而，他把自己父亲教育自己的那套理论要求自己的孩子，摒弃了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东西。孩子生活在现代，不应该忽视中国现代文化，更不应忽视中国目前的国情。因为孩子毕竟要在现实的中国做人、学习、做事情。

我先生是讲国情的能手。

有人在读了我的《我家走出四博士》之后，写了很漂亮的书评，不仅内容好，语言也很幽默。他曾引用了歌星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中的一句话：“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还是中国心。”写书评的朋友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四个博士儿女。他对我家的子女和所有留学的海外赤子的深切理解，我由衷地感谢。

我们的儿女们都特别关心祖国的建设、关心祖国的科学发展、关心祖国的现在和未来。除了在经常的电话交谈中交流信息外，每当我们出国探亲时，他们总是要问祖国发生的各种事情。当然，在国外也能够听到一些，从媒体上也看到一些，但是，国外报刊文章的宣传有他们各自的立场，维护他们的利益，有些还对新中国有很深的偏见。儿女们总想鉴别真伪，他们对那些污



辱中国的言论感到义愤。

我先生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天天读报、看新闻，否则就感到一天的生活中缺少了紧要的东西。这也可能是出自职业的需要和爱好。他是学党史的，对我们祖国和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要做历史的研究。因为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之历史。所以，这方面的事情，他知道得相当多。孩子问到的许多问题，他几乎是对答如流。有些孩子不了解的情况，他也能充分地介绍情况，和孩子一起讨论，交流看法。所以，我的儿女们都认为爸爸是讲国情的专家和老师。

我先生给子女讲国情，不是为了单纯地传播知识，而是让他们了解国内需要什么，他们在外国能给祖国贡献什么。所以，每次谈完国情，话题都要转到国内的需要。他的知识面比较宽，对几个孩子的专业也比较感兴趣。所以，听到孩子们谈自己的专业，他很入神，也为他们参谋，怎么样把高科技产业化，并把这些成果引进国内。我的几个孩子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都非常关心祖国，努力地引进技术和资金、项目，这和爸爸的引导和提示有很大的关系。

我先生研究历史，不是根据那时候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而是根据他所阅读的大量文件和档案馆的资料，并结合各方面的文章、回忆录，努力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判断。他给孩子们谈国情，也都是有根有据的，孩子们很信服。他认为：“用别国的学费、技术、设备培养出来的中国学子，应该把他所学到的知识引进到祖国。”我先生身上的这种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同志的气质，似乎何时何地都不会发生变化。这种气质好像深深地渗透在他的血液里。



关心国情的第二代与第三代



与孩子分享成就

父亲的成就无论多少，哪怕是一次成功，也应该与孩子交流，让孩子知晓，并与爸爸共享快乐。这不是要求爸爸向孩子吹牛，以赢得孩子的虚幻印象，而是让孩子懂得眼前这个真实的爸爸，让他们发自肺腑地赞美和尊重父亲，并默默地在心中种下良种，学习、模仿、生根开花。

1995 年我们第一次去美国探亲时，大儿子金煜正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学校坐落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很漂亮的城市——波士顿。这个城市不仅风景优美，而且是一个大学城，其中包括著名的哈佛大学。我们在哈佛大学有两位教授朋友，都是过去开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是我先生所熟悉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文革历史的美国专家罗德里克·麦科法夸尔教授；另一位是我所熟悉的、对中国现代哲学感兴趣的、世界著名的毛泽东思想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这位施拉姆先生对毛泽东思想也非常感兴趣。每到中国来，他常常到中央党校。校领导在接待时，又常常把我先生请到现场。

这两位老朋友知道我们的大儿子在美国留学，而且和他们住在一个城市。通电话时，他们知道我和先生已经到了波士顿，都非常高兴，请我们到哈佛大学参观，又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做客。

这一次到波士顿，更令人兴奋的是，当时的哈佛大学政治教授、费正清研究所的负责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麦科法夸尔，邀请我先生到哈佛大学费



正清中心讲课，时间是一个多小时，到会有三十多人。课上可以提问，形式很活泼，题目是“‘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述评”。

我先生根据他搜集到的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各种不同看法，概括为“十说”，即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



施拉姆教授（左二）和夫人（右一）

宴请金教授（右二）和作者（左一）

争总爆发说、封建复辟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左倾”思想恶性发展说。我先生作了简要的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大概因为很少有人掌握这样多的材料，作这样生动全面的分析，大家的反响很好。

这次讲学是由儿子金煜陪同爸爸到哈佛大学的。在麦科法夸尔家里和施拉姆家里做客，全是由金煜翻译。这次讲座由一位在哈佛进修的搞社会科学的中国学者做翻译。儿子不做翻译，仔仔细细地听了爸爸从头到尾的演讲，也仔细观察了听众的表情和大家的反应。他回到家里对我说：“爸爸讲得真好，把他们都给震住了。”儿子的眼神里写满了骄傲。

通读《所以，北大兄妹》一书，我们认为“狼爸”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是，他不会很好地利用自己身上的资源，总是凶神恶煞地训斥孩子或打骂孩子，强迫他们好好学习。孩子留下的日记、作文，看不到对爸爸学业成就的赞美，而多是一个“怕”字。

2000年的春天，美国的伯克利大学召开了由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被邀请到会，我先生和我也荣幸地接到了邀请。讨论会要求我先生准备的题目是“‘文革’的起源”，



父爱如山

我的题目是“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斗争和‘文革’的发动”。我们按要求写好发言稿后，事先用传真将文稿传到美国，由会议组织者排印，供与会者参阅。我们如期到会，并参加了会议的整个过程。

我和先生的发言博得了会议的一致好评。主席表示：“报告很精彩。”美国出版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还特别刊登了文章，报道了我们的发言内容。

这一次的学术讨论会很隆重。大儿子金煜去看我们，说我们住宿的宾馆是五星级的，饮食的档次当然也很高。但是，这一周的学术讨论会，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和国际上的专家、学者交流了对“文革”起源的看法。我先生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权威，在会上的报告，显得很有分量。因为他否定了国际上多年来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于最高领导层权力斗争的片面看法。

孩子看到了《世界日报》的报道，颇为二老骄傲。

我对他们说：“我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讲党史不是内行，这一次也就‘文革’的起因在国际上发表看法，研究起历史来了，这都是爸爸指导的结果。”

孩子开玩笑说：“妈妈，你不要忘记，你是教哲学的教授，是搞意识形态问题的专家。别说爸爸指导，只说帮助就可以了。谁都说你们二老是‘比翼双飞’的一对专家。”

孩子的这些话是发自肺腑的，反映了对我们的赞扬和尊重。我们为他们而骄傲，他们也为我们而骄傲。我和孩子又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博学而又对某个问题有专门研究的爸爸而骄傲。

这次会议和哈佛讲学使我体会到，父母和子女之间在生活上的互相关照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小时候，父母主要是对子女生活上的关怀和学习上的关心帮助；而在子女长大成人之后，亲子之间最好能有事业



父爱如山

上的关怀与交流。我们的四个孩子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我们搞社会科学，隔行如隔山，业务上难以深刻了解。但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互相了解、激励、支持，却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加深感情上的理解和联系，让特有的人文关怀和刻骨铭心的亲情，升华到更高的层次。



时间都用来读书了

知识就是力量，它给予人自觉培养优秀人格的力量；它给予人科学思考问题的力量；它给予人善待他人与帮助他人的力量；它给予人们天天向上的力量。所以，父亲必须自己遵守时间、爱读书，为孩子做出榜样。

在《所以，北大兄妹》一书中，我们看到“狼爸”在工作中很勤奋，足智多谋，可是下班后的业余时间里，一般是往沙发上一坐，将四个孩子叫来，要么听他没完没了的训话，要么就是背书。我们看不到一个手捧书本自己看书，给孩子们默默做出珍惜时间、爱读书榜样的爸爸。

我家孩子的爸爸不一样。“父母教我们养成爱读书的习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看书，但他们在看。潜移默化中，我们也逐渐发现看书蛮有意思。这让



金侠看书极为投入

我终身受益，我越来越感觉我在逐渐向父母的生活习惯靠拢，总是有事没事地拿本书来看。现在我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已经会模仿，大人做什么她就模仿什么，我感到父母的‘身教’作用很重要。”这是我家老三金侠在越洋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的话。

老二金煜也在越洋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父母在关键的时候对我们的管教不放松，要我牢记‘读书是学生的天职’。”



越洋电话采访的记者，是这样谈到我大女儿金莹的话：“我的博士后早就读完了，现在从事科研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还要上夜校学习。”

我家读书气氛浓厚，这是因为我们在家的空余时间都在看书，并经常介绍一些书给孩子们看，所以四个孩子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我先生对记者说：“父母要求孩子埋头读书，就要做好榜样，否则很难说服孩子。一定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孩子们严格要求自己，珍惜时间，多学习。”

长期形成的良好的家庭氛围，是激励每个孩子不断进步的动力。我家中形成的一种氛围就是对知识的渴求。父母、子女不断完善自己，有一种顽强拼搏奋斗、你追我赶的精神。

我们常说自己家人是“书痴”。这是讲每个人读起书来如醉如痴，爱书、迷恋书。孩子们的这种习惯，应该说是我先生和我共同带出来的。我读起书来，别人说“刻苦钻研”“拼命三郎”。但比起我先生，我还是有自己的弱点，我从小像许许多多女孩子一样，比较注意争分数，考第一。但是，课内读书拔尖，不能代表课外知识的渊博。我先生总说我是科班出身，学习是按部就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而他参加革命早，所以，跳过高中阶段，大学也没有读完。可是，他的长处是拼命读书，读各类的书，兴趣比我广泛。我的读课外书的习惯，是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跟他谈恋爱期间养成的。那时候，他看一本，我看一本，比着看，所以我这个“书痴”是我先生带出来的。我家一辈又一辈小“书痴”也主要是我先生的影响。



说是“书痴”，但我家没有一个书呆子，而有着良好的爱读书的习惯。这种习惯是成功

第三代猛猛读书，边读边笑，
也如醉如痴



父爱如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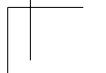
的前提。孩子的年龄越小，好习惯就越容易培养。这种自幼养成的好习惯，正如古语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养成的习惯，同天性差不多，是可以贯彻终身的，对孩子们长大以后带来的好处，有时甚至令父母都难以想象。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爱读书，又会读书，成为一个会思考的读书人。



第四章 “修身齐家”的顶梁柱

青年时期流的每一滴汗水，顶得上成年时期许多紧张的劳动。劳动是最伟大的美，让孩子们认识这个美，是教育的奥秘之一。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知子莫若父

家庭民主是社会民主的细胞和缩影。有民主才能有相互理解、尊重、关爱、支持与欢乐。所以在家庭，父亲不能当“沙皇”，发“圣旨”，独断专行，否则容易造成孩子独立人格的扭曲，影响创造活力的发挥。

面对“狼爸”的霸道，他的孩子曾提出要讲民主。他却说：“民主民主，什么是民主？你是民，我是主，这就是民主……在我的家庭里，我就是皇帝。”

我十分吃惊。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发明的词语”“皇帝”，怎么会在今天自称为“天下最好的爸爸”的口中不加掩饰地脱口而出！从行为上，“狼爸”虽没有像皇帝那样下令“打二十大板”，或者抛签问“斩”，但他的花样也够暴戾。当亲朋孩子寄放到他家而不听话时，“狼爸”竟用了“捆绑式方法来教育”。书上说：“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孩子，从小就是个小霸王，从来不服管，到了我家中同样是翻天覆地地闹”。对于这个孩子“最严厉的一次是困在我家阳台八小时，我给他松绑的时候，一裤子的尿”，以后“孩子的坏毛病竟然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在“狼爸”得意地述说自己的“成功”时，我们却为他的暴力感到羞愧！

我的先生一直认为家庭对孩子成才非常重要。所以，我每次讲课都有一个课题，叫作“稳定的后方，欢乐的港湾”。这是我先生和我经过多次议论，钩织出来的形象结论。

一个战士到前方打仗，他需要有好的后方保证给养和枪炮子弹。没有一



父爱如山

个稳定的后方，通常就不会有战场上的胜利。大海航行时，船员们在远航中，可能历尽风险。他们想的是完成任务后，可以尽快上岸和家人团聚，或者与朋友相会。所以，一个远航的船员，总是期盼着停靠在一个欢乐的港湾，早一点回到温暖的家。我先生常说：“我们的这个家，就好像是全家人（包括第二代、第三代和我们自己）所需要的那种港湾与后方。”而在我家这个欢乐的港湾、稳定的后方之中的主心骨，就是我先生。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和欢乐，他付出了很多。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还想到为了这个家庭的欢乐和幸福，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活下去。

我家的许多大主意都是由我先生最后定夺的，很多事情也是由他最后拍板。他充分发扬家庭民主，自己的意见不强加于人，也能听进每个人的想法。但是，他的主意比较正。

老三考大学的时候，家里经过了多次研究，不止一次地召开家庭会议。我家的家庭会议开得很随意，凑到一起就商量一件事情，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我也跟孩子一起出主意。我先生听取了各种意见后，采纳雅言，有条有理地给大家分析，拿定主意，合理性地拍板决定。

在孩子考大学前，老三金侠考虑家庭经济困难，所以想过报考上海军医大学。他跟我们商量，说军医大学属于部队编制，学习与生活费用都由部队承担，毕业以后也可以当军医。他还有一个志愿就是协和医科大学。金侠说：“我想学医，当然希望上最好的医学院校。协和医大八年制，再理想不过了，但比起上海军医大学，经济上的花费要大多了。”

我们家几次开会研究，孩子心情矛盾，我们也十分矛盾。之所以比较矛盾，不只是出于经济问题的考虑，而是爸爸对金侠的学习成绩没有太大的信心。在考上重点高中时，金侠成绩比弟弟金延好。但在报考大学的一年半前，有一段时间因为物理偏科，成绩下滑。协和医大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本硕连读的八年制医科大学，每年只从全国招生三十人，考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



当时也很犹豫，万一孩子考不上顶尖大学，有可能只能上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学校了。因为每个学校录取自己理想的考生，都是按第一志愿优先录取。

最后怎么办？这成了我家的难题。最后，我先生说：“多征求一点意见吧。”他自己去人大附中征求了班主任老师的意见，又让我打电话征求在沈阳的二伯父、伯母的意见，因为他们都是医科大学毕业的，而且是沈阳中国医大附属医院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家里没有电话，我就跑到楼下二层的公用电话台，拨通了兄嫂的电话。他们两个人讲了很多，说：“考大学是孩子人生关键的一步，一定要选好学校。如果能考上协和医大，就毫不犹豫地让他报考。”

我单独跟儿子谈了谈，老三说：“如果要我自己挑选，我还是喜欢学医。学医就要找最好的医学院校，全国就只有协和医大了。从心里来讲，我是愿意上这个学校的，就怕家里经济上有困难。哥哥姐姐都在念大学，我们俩也一起上大学，以后费用不够，中间辍学怎么办？”

我说：“既然决定考，又有把握考上，妈妈和爸爸会想尽一切办法，不会让你辍学的。”

他说：“那我就报协和医科大学。”

我比较了解孩子的心情，又把孩子的态度跟我先生说了说。这个时候，我先生拍板了，说：“好，我们就尊重孩子的意见，让他报考协和医科大学。”

老三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也满足了自己的心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协和医科大学。有了这一步，才有他后来的到伦敦大学继续进修硕士课程，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直到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所以，关键时刻需要拿主意的时候，我家都是先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最后由我先生定夺的。

我先生在作决定时，不是靠主观臆想，而是充分地了解了孩子的意愿和各方面的情况。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知子莫若父”，外国也是这样。意大利有个著名的科学家叫伽利略。他的父亲开店铺维持生计，生活也比较清苦。



父爱如山

他是生活在科学和教育被视作“神学奴仆”的时代，许多学校附设在修道院。伽利略也在这里学习过，并曾想把一生献给宗教。但他父亲断定这是不符合伽利略性格的选择。后来，儿子和父亲一起商量，不去在神学上取得成就，而要在科学上献身。后来父亲决定，让他到比萨大学求学。结果，他成了中世纪科学上的明星。

由于我先生和我都努力摆正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同心同德建设我们的欢乐港湾，让我们的孩子都爱上这个家。在接待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的家很温暖，很亲切，也很平和。”

我们的家之所以像孩子们所说的“温暖”“亲切”“平和”，是因为我先生和我一生都在用心血缔造这个家庭。我们希望“家庭应像古代歌词中所说的那样，对孩子来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早期教育和天才》中译本，第186页）。

家庭不是孤立的，正如苏联的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天然的细胞，人类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实现，人类胜利的力量在这里滋长，儿童在这里生活着，成长着，这是人生主要的快乐。”（《父母必读》中译本，第48页）



家里的第一“小提琴”

一个群体需要有权威。要演奏出统一和谐的乐曲，没有指挥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第一小提琴作为乐队的领奏者，也是不会成功的。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反对说：“难道妈妈就不重要，就不能成为家庭的权威？”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在强调女权、尊重妇女地位的今天，甚至“夫人总是对的”颇为流行的年代。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是否不合时宜？不过这并非是我守旧封建，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发自内心的一句诤言。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和家庭的组合状况而言，就男女的性别体质特征而言，以至社会的普遍心理而言，恐怕在今日之中国，还是由爸爸作为家庭的权威比较适宜。

这种爸爸的权威怎样才能够获得？

我从我先生的身上体会到，这种权威既要靠爸爸自身长期的自我修养与学习，更离不开作为母亲的有意识的培养、维护父亲在子女心目中的权威。

一个有权威的父亲，包括我先生在品德、为人、教养等方面，一直为家人所折服。他在孩子面前确实发挥了第一“小提琴手”的作用。这完全是靠他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率身垂范，让家人在内心深处折服自己。一个自己行为不端、言行不一的爸爸，是很难让孩子和妻子从内心折服的。所以，爸爸自己的言行和实际表现，是维持在家中权威的客观基础。

当然，权威不是权力，不是高高在上的压力，更不是暴力。靠打骂是不



父爱如山

行的。这里需要的是平等相待和民主协商。在家里，我家孩子的爸爸，能够做到与人为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家中一些事情，经常是通过开“家庭会”来讨论解决或做出决定的。

一个为人之夫、为人之父者，要真正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我的先生在我们家里总是显得很平等、很民主。能够做到这一点，和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从小参加革命，在战地工作团里经受过战火的考验。他虽然没有经过科班的学习，然而却靠刻苦自学、不断积累，成了一名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这种“非科班”的出身激励着他，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奋起直追，下决心努力做得比别人强。所以，他做学问一直是刻苦勤奋的，逐渐积累了各方面丰富的知识。因此，他从来没有骄傲自大的心态，相反地，有很好的修养，做学问很入门，在专业领域里成绩斐然。这一切，在家里不仅我佩服，我的孩子们也都很佩服。

另外，我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家里的第一“小提琴”，稳坐权威的宝座，这和我们夫妻感情好也有很大的关系。他遇事征求我的意见，我是他发扬民主的对象。我也在家中很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虽然人们都称我为“女强人”，现在也流行“女主内，男主外”的说法，但是，我在家中从不觊觎权威的宝座。相反，我总是竭力把孩子爸爸推上权威宝座的地位。所以，我从来不在家里和丈夫吵吵闹闹，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揭爸爸的短处。有什么问题，我们俩都是单独商量。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我们都是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正像我先生在接受记者时所说的：“我们俩人有不同意见，交换意见有时到深夜。但是这一辈子，我们相互没有红过脸。这一切都是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联的伟大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过：“在一个合理的家庭集体里面，如果父母的威权没有被任何人为的威权所代替，就不会觉得有必要使用丑恶和不道德的惩戒手段。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往往是有条有理的，也有必要的尊



敬和服从。”（《父母必读》，第 260 页）

这位教育家的理念，在我家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先生从不用那种丑恶的惩戒手段去树立权威。

“狼爸”是靠什么手段去树立和维持“权威”的呢？“狼爸”在书上说：“父亲就要有做父亲的威信，孩子不对，就要打，打，他们才能记住。如果作为一个父亲对于孩子而言都没有威信了，又如何指望孩子对其他长辈存在敬畏和尊敬之心？”又说：“严父必备三条守则：监督、训斥、惩罚。布置任务，定时监督；完成不好，加以训斥；训斥之后，棍棒伺候。”难道这些还不是“丑恶的和不道德的惩戒手段”吗？！



适当开开小灶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爱好、不同的愿望、不同的需求，尤其多子女的家庭，为父母者需要特别注意，绝不能一表扬全表扬，一照顾全照顾，一批评全批评，一惩罚全惩罚。打都打，骂都骂，那是一种可恶的“连坐法”。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要求孩子什么都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看待，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思维，完全背离了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因材施教。

“狼爸”惩罚起孩子，有时火冒三丈，完全没有理性可言。他竟然说：“我打孩子是有规矩的。”他一共列举了七条规矩，其中第五条是“一个孩子犯了错误，其他的孩子都必须在旁边站成一排，一起听从教诲，同时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挨打，以儆效尤”。他还说有时“一人犯错，四人齐打”。这是一种可恶的“连坐法”。

我家一直非常尊重孩子们的个性，从来不允许，当然也没有发生过他这种“齐打”“齐骂”的情况。我们对不同孩子的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大儿子金煜在读大学二年级时的假期，有天晚上三兄弟一起在我的办公室里收听“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两个上高中的弟弟一边听，一边兴高采烈地谈论。金煜在听的时候，却显得很木讷，该笑的地方不笑，该说的地方不说，好像没有听懂。我当时很奇怪。三兄弟一起听广播，难道读大二的哥哥，英文水平还不如读高二的弟弟吗？



为了弄清金煜不同于弟弟们的特殊表现，听完以后，我让几个孩子留下，问他们“美国之音”里讲的是什麼故事。

老三、老四抢着向我叙说那里面的故事内容和情节，说得很多。这个时候，金煜在旁边沉默不语，偶尔插上几句。

我问金煜：“弟弟翻译得对吗？”

金煜脸涨得通红，老实地说：“妈妈，很多地方我听不懂。”他很难过地对我说，“糟了，我的英语掉队了，不如两个小弟弟。”

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两个弟弟：“金煜英语掉队可怎么解决呢？”弟弟金侠、金延也很焦急。后来，我们决定和爸爸商量一下，看看是否应该开个家庭会，讨论怎样解决金煜的英语掉队问题。

回到家，我把听收音机的过程和想法告诉了我先生，而且提议：“你主持一个家庭会议吧，咱们就讨论这一个问题。”

我先生当时虽然很忙，但为了帮助孩子学习好，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晚上，我们就开了这个不寻常的家庭会。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想办法。我先生没有抱怨哥哥英语学习没有赶上弟弟，也没有责备弟弟平时为什么不帮助哥哥。他心平气和地让大家帮助分析金煜英语学习的主要障碍。大家都认为主要是他在地读大学，缺乏学习外语的环境，听得机会少，所以听力较差。金煜也说他自己背的单词很多，看书不成问题，主要是听力不行。于是大家一起出主意。两个小弟弟也都插嘴，一个说“给金煜买一个短波收音机”，一个说“还得买个小录音机，收到短波收音机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然后再不断放、听”。姐姐说：“要是收音机和录音机在一起就好了。”他们还让金煜每天把英语教学节目一次不漏地录下来，反复地放着听，说这样能提高听说能力。

讨论的结果大概是给金煜“开小灶”，不论是买收音机还是录音机，弟弟和姐姐都不会有意见。其实这种常用的小电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但



父爱如山

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种小电器主要是进口货，价钱比较贵。和我们的工资收入相比，那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其他三个孩子对这类物品也都需要。家里的经济状况孩子们都是知道的，同时供四个孩子上大学，单靠父母的工资已经十分紧张。虽然有一些稿费和讲课费之类的收入，但给四个孩子同时都买还做不到。究竟能不能单给一个孩子买？孩子们最后都看着爸爸。这时候，爸爸拍板了，说：“家里缩减开支，无论如何也得给金煜买上这两件小东西。”

那时我们二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一百八十多元，稿酬等其他的收入有一点，但不多。然而，我们还是精打细算挤出一百多元，给金煜买了这两样小电器。到金煜假期结束准备回山东海洋学院时，我们又给他打气：“相信经过半年的努力，你的英语不会再像现在这个样子。”

果然不出所料，半年后金煜的听力有了飞速的进步。一年以后他再回来时，三个人一起听“美国之音”中的故事时，我们发现他和小弟弟对英语广播的反应已经旗鼓相当了。



教孩子恋爱

任何孩子的一生，都会遇到恋爱问题，处理好的，可歌可泣、美满幸福；处理不好的，苦闷、抑郁、吵闹、不幸，甚至走上“自杀”、他杀的不归之路。所以，对孩子进行正确恋爱观的教育，是每个父母义不容辞的天职。

“狼爸”在《所以，北大兄妹》一书中，对孩子的恋爱观的教育，虽然谈得不多，但也谈到自己的某些看法。他规定孩子上大学前不许谈恋爱。有一次发现儿子与女同学联系时，他不顾孩子一再解释是在“讨论学习问题”，而严厉地叫他立刻“断绝来往”。他竟然说：“爸爸早就说过，不允许你们在读大学之前谈恋爱！”“你要是继续和这个同学来往，我就去学校找她。我不仅要找她，还要找她的家长，我要在他的家门口随地大小便！我看他还敢不敢让他的千金与一个有如此粗俗父亲的儿子来往！”读到这里，我很吃惊，这位读书很多的萧三郎，怎么能用这种粗俗的方式禁止孩子早恋，而不去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恋爱观的教育！

对父母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省心的、简单的、威胁式的恋爱观教育，不需要启蒙，不需要谈经验，不需要讲道理，接下来就是让孩子懵懵懂懂地自己去摸索。

我们的主张和我家的做法是不同的，我们一般介绍经验、谈道理，父母麻烦些、辛苦些，但孩子将获得一生的幸福。

我先生历来很正派，但是他希望在孩子面前不要把爱情搞得很神秘。女



父爱如山

儿读初中的时候，他就谈过，要对孩子进行爱情的启蒙教育。他说：“像有些父母那样，越是把爱情搞得很神秘，越是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心，最后盲目地去追求，反而不好。”所以，在几个孩子都不是特别大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就曾经问过：“我们同学的爸爸妈妈在一起总爱吵架，我到同学家常常看到这种情形。你们怎么不吵架？你们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

在回答孩子的问题时，我先生总是很得意地讲起我们的爱情故事。正如他所说，要给孩子早一些做爱情启蒙，免得在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会朦朦胧胧上当。所以，他讲得总是很细，一会儿讲我们的恋爱经过，一会儿又背诵爱情的诗歌。他常常背诵苏联诗人的诗给孩子们听：

爱情不是月光底下的散步，
也不是花园椅子上的叹息，
什么都是可能的，
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雪。
爱情是一首美好的歌，
但是，
歌是不容易唱好的。

我先生还给孩子们背诵《诗经》里面的古诗，又做了解释。比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他还给孩子们解释，说：“‘关关雎鸠’，是说关关叫的斑鸠；据说这种叫雎鸠的鸟，情意专一。这里比喻男女爱情的忠贞。‘在河之洲’，是讲在河里



小岛来停留；‘窈窕淑女’，是讲苗条善良的小姑娘；‘君子好逑’，是讲正是人家的好配偶。”

做了解释之后，他告诉儿子：“你们以后选对象，可不能只注意“窈窕”，不能只注意长得漂亮、长得窈窕。诗里讲的‘淑女’，还有‘这个小姑娘心地善良，是个好姑娘’的意思。看人，最主要看她的心，不要只看外表，那样你们会上当的。”

我先生知识面很宽，他不仅喜欢历史，还喜欢文学，喜欢古诗古诗词。他常常给我和孩子们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中，特别是这样两句话：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希望我们长长久久，既做天上的“比翼鸟”，又做地上的“连理枝”。后来，他又给孩子们讲：“谈恋爱可不是好玩的，要考虑长远。一旦相爱了，就要互相负责，而且要相互帮助，比翼双飞。”

这些诗歌和爸爸的讲解，在孩子身上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家老三和三儿媳恋爱之初，就在日记中写道：“爱情是终身的义务。”他抨击了那种朝三暮四，寻找各种借口来玩弄爱情的年轻人。听我女儿说，有一次，她们医院的年轻人集会上，互相背诗。我女儿还和她们对了《长恨歌》里的这句诗。可见，爸爸给孩子们影响是很深远的。

这种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是爸爸的言教，更重要的是他的身教。在写书的过程中，我翻阅了过去的老相簿和照片，看到了我们初恋时他赠送我的照片，后面写着“霞：永远爱你，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我把这个半世纪前的照片和他的亲笔字拿给他看。他笑了笑，问：“我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吧？”我立刻回答：“忠实实现，一丝不苟。”对我的回答，他显得十分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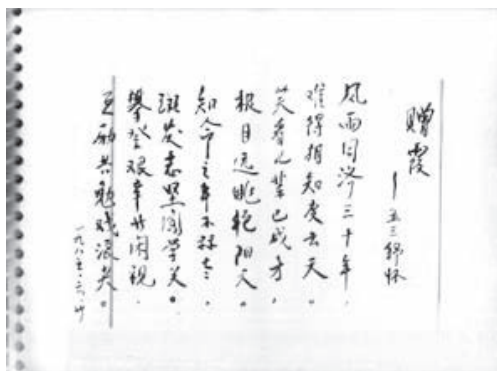
父爱如山

我在翻相簿时又有一个可喜的发现，就是八十年代他写给我的一首诗，距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记得，当时我将它精心地贴在一个相簿的扉页上。但相簿太多，又多次搬家，本以为遗失了。真没想到，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竟无意中将它带到了天涯海角。诗是这样写的：

赠 霞

——五三抒怀

风雨同济三十年，
难得相知度云天。
笑看儿辈已成才，
极目远眺艳阳天。
知命之年不算老，
斑发志坚闯学关。
攀登艰辛等闲视，
互励共勉戏浪尖。



这首诗写了我们三十年的爱情生活，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写了五十年。今年是我们的五十年金婚。我们这半个世纪，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但我们彼此相知相爱，巧“度云天”；在治学“闯学关”上，我们相互激励，相互支持，“志坚”不移；业务上，我们“艰辛”“攀登”，“互励共勉”，嬉戏“浪尖”；生活上虽然拮据、清苦多子女，再大的困难，我们“等闲视之”。我们获得的是子女成才，二人事业有成。这对我们这一生的爱情来说，无疑是“极目远眺艳阳天”。

我和我先生的爱情生活，有相当一部分，孩子们是亲身经历了的，也是他们观光过的“风景线”，印在脑中，刻在心上，相信他们也都能缔造自己一



生幸福的婚姻生活。

我先生和我的婚姻生活也可以算是“个人的隐私”吧！我这样赤诚地将其披露于社会，还有一个更为广大的想法，这就是希望天下的情侣、伉俪，都能够珍视自己来之不易的爱情，让它远离虚情、远离色迷、远离物欲……我希望天下情侣的爱都能成为高尚的、纯真的、永恒的爱，像天涯海角的红三角梅花一样，不怕风雨、雷电、酷暑、干旱，永远红红火火地绚丽绽放。



变化再多，也要计划

父母要教育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其中之一就是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有很细密的计划。计划按时间长短可划分为长计划和短安排，比如年度计划，学期计划，月计划和周计划，甚至每日的计划。

“狼爸”有家规，规定孩子要做学习计划。然而，他没有耐心地引导孩子自觉地做计划和坚持计划，而是按照他的意志来做。他说：“上了小学后，我便要求孩子们开始自己安排时间。所谓‘安排时间’，是要按照我的格式，制作一份完整详细的时间表，时间表必须经过我审核通过后才有效。孩子们必须按照时间表上的时间和内容来执行。”2009年，“狼爸”送萧尧、萧君去上海进行长达四个月的高考前的补习时，他说：“在出发前，我要求兄妹俩都给自己制订了一份详细严谨的学习时间表。学习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夜里凌晨1点，中间只有短暂的两顿饭作为休息时间。”“狼爸”也承认“这是一份极其残酷的时间表”。但经过他的审核通过后，兄妹照此执行。计划虽然执行了，但孩子压力很大，身心都受到摧残。

我先生也教孩子做学习计划，并督促检查。但孩子完不成计划，他也不打不骂，而是给孩子做示范，并加以引导。在工作上，我先生根据学校给他的教学任务和社会活动，按其时间前后和重要性排列出顺序。

有人也常常写计划，但是和我先生不一样。他们写了计划以后，几天就忘了，或者丢在一边不去管它。所以，有时候造成了学习和工作上的忙乱。



我先生总是显得按部就班，很有条理。这不仅和他写计划有关系，而且和他严格地执行计划有很大关系。

他每设定计划时反复思考，写出计划后就不轻易改动，要求自己一一严格执行，而且他的日历本上也记着他执行计划的情况。当然，他的日历本所记的范围很宽，不仅是执行计划的情况，还有家里经历的重要事情。

有时候，有些事情忘记了，我还要去问他。他总能用日历本很准确地回答我。在日历上写下执行计划的情况，是对自己的一种严格检查。有时候他一天规定读书的页数没有完成，就好像自己出现了失误，心里很不舒坦，总是想方设法来弥补。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央党校的大礼堂看电影，散场后本来应该一起回家。当时，我们家住在现在国际关系学院这里。路虽然不是很远，但当时坑坑洼洼，慢走也得走半个小时左右。看完电影后，他说：“我今天不回家了，你一个人回去吧。计划看的书没看完，我回到办公室补一补。”

当时，每个教员有一个小办公室，里面有书架，还有一张床。所以我很明白，他要熬夜看完书，当然就要在那里过夜了。我当时没有说别的，只说：“好吧，你去看书吧。”可是，我往家走的时候，黑黑的夜路，看不少人成双成对地往回走，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一方面，觉得我先生能够严格地执行自己的读书计划是好事；另一方面，也觉得他做得有点过分，哪有天黑乎乎的，看完电影不回家，又不送爱人，让她自己独自回去的？真是不知道照顾人，不懂人情事理。于是，我有些生气，当时就流了眼泪，边走边抹眼泪，好在天黑，路上谁也看不清谁。我就这样一人独自走回了家。当时，大儿金煜两岁多，在幼儿园全托，家里没有其他人了。所以，我只好独守空房。我当时想：“我对这位‘书生’先生可怎么办呢？”不过，我的理解还是多于抱怨，慢慢地也就平静了。

第二天晚上他回到家，我第一句就问他：“你今天的读书计划完成了吗？”这句话本来有点儿挑衅的味道，可是我先生像没听出来似的，高高兴兴地回



父爱如山

答我：“今天可完成了。”我看他这种老实厚道的样子，就什么也不说了，两个人又高高兴兴地欢度良宵。

我先生的学习和工作严格的计划性，影响了我们的孩子。我曾经在国际长途电话里问几个孩子：“妈妈在写书，写你们的过去，能不能参看一下你们的日记？”

在电话里，他们有的回答说“我们支持妈妈写书”，有的说“日记尽管看，我们没什么向妈妈保密的”，还有的说“只希望把我们的话和我们所引用的名人的话区分开来，否则，会把我们拔高”。

我在孩子们的日记中看到，不论女儿还是儿子，他们都有学习和工作计划，特别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学习计划非常周详，既有课内学习计划，也有阅读课外书的计划。

孩子们的这种计划性，一直保留到他们走上工作岗位。

记得 1995 年到美国去探亲，我看到大女儿的门上有个小钉子，钉子上总是挂着一张纸，写着本周计划。每天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计划中写得清清楚楚。“备注”里写的是执行情况。一周执行完了，她又贴上新一周的计划。所以，我在她家所居住的几个月，每天都能看到门上的小钉挂着计划。

好习惯是不太容易养成的。有条不紊地执行计划，能够大大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这种好习惯，有人是自己摸索的，有人是受家庭影响的。我和孩子们的计划性，都是从我先生那里学来的。

其实，孩子的很多好习惯是从父母的身上学来的。正像我们伟大的革命家恽代英在他的日记当中所写的：“儿女之善恶，纯由父母之所陶铸，儿童不是之处，皆因归责于父母。”（《恽代英日记》，第 43 页）当然，说“纯由”“皆因归责”，有点绝对，因为学校、社会、同学、朋友等，也都会对孩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父母身上好的或者不好的习惯都会影响着孩子，而且影响颇大，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要使孩子改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父母首先要做好表率。



不用“铁腕”治孩子

在家教中，我们一贯主张父亲应友善地对待孩子，不应以铁腕治孩子，不该给孩子的心灵制造创伤。

这点和“狼爸”根本不同。因为“狼爸”常常用“铁腕”来治孩子，冷语伤害，刺激、挖苦、贬斥、辱骂、抽打，无所不用其极。一般人所想的“铁腕”可能是指严格的管理，严厉的态度，甚至是暴力手段。我这里所说的“铁腕”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借用的，主要是指对孩子不应有的、易引起孩子心灵创伤的言论和举止。

我想对照我先生的实际表现谈些看法。

他对孩子的爱护是真心的，要求是严格的，从来不溺爱孩子，也不答应孩子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他的态度是和缓的，方法是理智的，手段是平和的，包括不打不骂，不对孩子耍态度，不嘲笑、不讥讽，不刺激孩子，对孩子不驱不赶等。这诸多方面，我理解的就是不用“铁腕”治孩子。

我大女儿曾对记者谈了这样一段话：“我家的风格与其他人家不一样。传统的家庭类型是严父慈母。我家反过来了，妈妈很严格，爸爸反倒很随和。爸爸妈妈几乎没有打过我们，我家从没有大吵大叫现象……”（《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

在家里，我对孩子要求是比较严的，当然，也不是那种打骂的严，主要是对孩子要求高，要求学习好，做人也好。一旦发现了什么问题，立即进行



父爱如山

个别谈话。相比于我，我先生显得随和。他随和到什么地步？我想，主要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留有余地。孩子出现了问题，在别人家里，可能就是爸爸的一顿踢打。

金煜在电视台来采访时曾经说：“我在外面和人打架，到家前心想，爸爸妈妈对我一定是一顿揍，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主要是和我讲道理。”我先生这一点显得很突出。

有一次，金煜为了替小朋友鸣不平，同一个比他大的男孩打了一架。因为那个比他大的哥哥打了一个小弟弟（我家老三、老四的同学）。金煜学着电影里游击战士打人的办法，专往要害处打，结果打得这个大哥哥躺倒在地，口吐白沫。老三、老四回来报信，喊：“妈妈、爸爸不好了，金煜把一个大哥哥打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我听到老三、老四的话以后，立刻拿起小钱包，说：“我得带金煜去道歉，还得给人家孩子治病，花多少钱也得治好。”

遇到这种情况，“狼爸”可能见孩子一进屋，就是一顿踢打，我先生没有这样做。他看了看金煜，没有任何打骂的表示，相反却很支持我的做法。他说：“快去吧，你带着金煜去，看看怎么样。不行就上医院。”孩子在外面惹祸了，当爸爸的还能这样平静、理智，很不容易。当然，事后是要进行个别谈话的。

另外，他对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从来不要态度。有些父母也不一定是打骂，整天板个脸，或者是对孩子总要态度。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我有的时候对他开玩笑说：“你的性格修养得真好，好像就不会耍态度。”

他也对我开玩笑，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那上面不是讲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要对群众耍态度吗？”

我说：“你这个‘小革命’，真是很像样子。”

我先生对孩子从来不讥笑、不嘲讽。他的小提琴虽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但是也很不错，不仅在军队中演出过，也还曾在中央党校全校组织的晚会上，给一位独唱的女同志伴奏过。当大女儿和老三要学小提琴时，他以实际行动积



极支持孩子。当然，孩子一开始拉得肯定不好听，吱呀吱呀的，但他从来没有讥笑过，而是耐心地教。后来，我的大女儿成了 101 中学乐队的小提琴队手。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效果自然就会很差。2003 年 7 月 29 日，《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孩子心态的不正常，有些就是来自大人的讥讽。父亲对儿子说：“你总是出错，你好像根本就不会跳舞，像根棍子一样，没有节奏感。你的棒球打得太差了。”这些讥讽的话，都会深深地刻进孩子的心里，使孩子产生自卑感或排斥他人的心理。

“不刺激孩子”，也是我先生一个很大的特点。他非常注意和孩子谈话的场合，不在他人面前揭孩子的短，或者说一些不符合孩子实际情况的话。

记得有一次，他到 101 中学开家长会，回来对我说了个情况。他说：“在家长会上，老师表扬了金煜，并且让家长们谈谈孩子在家中的表现。我当时感谢了老师的表扬，但是又说我们对金煜



小时候爱打架的金煜这时成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右一）
金煜妻子（左一），妈妈（左二），
爸爸（左三），李涓（前中）

的成绩估计还不那么好，他是我家最笨的孩子等。散了会，老师把我留下了，很不高兴地说：‘金煜是我们班上学习拔尖的，爸爸不能张嘴就说孩子笨。’我接受了老师的批评。”

当我先生向我学说这些过程后，我说：“你这种看法有偏见，应该说这几个孩子都差不多。你当金煜面说过这种话没有？”

他说：“我怎么能对孩子说这种带刺激的话？”这倒是他的一贯表现，从来不用刺激的话，来对付孩子。他在会上那么讲，可能是有点谦虚的意思吧，但用词却不够适当，显得对孩子评价不公正。我对孩子的看法历来是：几个智力都差不多。从这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金煜笨。



父爱如山

有的大人整天在忙自己的事情，孩子一问问题，就不耐烦。还有的爸爸对孩子的进步没有信心，所以也用“铁腕”的办法，驱赶孩子，瞧不起孩子，不让他们说话，或对孩子说：“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走开，我不想见到你。”

（《参考消息》，2003年7月29日）我先生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不论他怎么忙，也不论是谁来问问题，他都放下手头的事情，耐心地听孩子提问，并一一作出解答。他不像上面那些爸爸，对孩子缺乏耐心。所以，孩子们感到我先生很随和。有些家庭的孩子离家出走或者心理扭曲，常常是不堪忍受父亲的“铁腕”教育。有的性格变得孤僻，成绩下降，流落街头，甚至出现青少年犯罪。

“狼爸”的大儿子萧尧不是也想过离家出走吗？在萧尧的自述中说：“在接受父亲的‘棍棒’惩罚时，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难道爸爸都不爱我们吗？为什么我们家庭的教育是这样的？我甚至想过离家出走。但是父亲‘百善孝为先’的长期教育与身上没有一分零花钱的管理制度，让我始终下不了离家出走的决心和勇气：没有钱，没有朋友，能走去哪儿？”

我想，一个好爸爸应该是很有理性的。我上面讲的几个方面，总结起来是一句话：不用“铁腕”治孩子。一个“跟着感觉走”或者是“感情用事”、很不理智的爸爸是做不到的。做一个好爸爸，必须讲爱、讲亲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很理智的爸爸。不然的话，就会像有的妈妈所抱怨的那样，“我家孩子的爸爸，爱孩子爱得很深。但是，有时候打孩子、和孩子耍起态度来，也特别厉害。他是爱归爱，打归打”。很明显，爱和打是不能这样截然分开的。这样做起码是方法不当。

“狼爸”也很爱孩子，但也是“爱归爱，打归打”，他说要打“一定是狠狠地打”。他还说“作业完成不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狠狠地抽打”。

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洛克曾经说：“假如管教到了极严酷的地步，也可以治好目前任性的毛病，但是接着来的常常是更恶劣更危险的心情颓丧的毛病。”



(《名人家教集锦》，第 395 页)

洛克的这段话讲得非常深刻、一针见血。如果用铁腕对付孩子，他可能今天不会在你面前出现不喜欢的毛病，但是他在未来会增添更多新的、危害性更大的毛病。那时候，作为父亲是非常狼狈的，拆了东墙补西墙，东墙倒了，又得去补东墙。这样，孩子身上会有各种各样恶劣的表现，爸爸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这种教育实际上是十分愚蠢的。聪明的爸爸应该是尽量尊重孩子，不伤害孩子们的自尊心，平等友好地对待他们。只有我们真正尊重了孩子，孩子才会真正懂得尊重年长者，听从父母的谆谆教诲。



给自己加压

一个人要想在学业上和事业上不断前进，压力是必不可少的。压力可以来自各个方面，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可能是推动自己永不停息、永远向前的不竭动力。培养孩子给自己施压，养成这样的习惯，对子女是终身有益的。

“狼爸”在孩子准备考大学的过程中，一再提示孩子“你不要给自己压力”。他说：“萧君在高考前夕压力巨大，每天都以泪洗面，不知所措，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是考不上北大怎么办呢’。”其实，萧君的这个压力不是自己给的，而是爸爸给的。因为“考上北大”是“狼爸”早已给她下的必须完成的指标。

“给自己压力”是件好事。学习与做事，不用别人下指令、驱赶，而是一种出于自己内心的自觉行为，难道还不好吗？

但是，这种压力不能过大，需要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掌握了这一条，即便是你身上所受百分之八十的压力，也是内在积极的动力，与萧君那种“每天都以泪洗面”的压力不同。实际上，这种过大的压力是来自爸爸。他忘记了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萧尧和萧君的学习一向不错……作为一名文科生，有这样优异的成绩，我自然把目标定在了中国文科大学里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从兄妹俩上高中开始，我便时刻把这个目标挂在嘴边，鞭策着儿女们”。按照“狼爸”的家规，如果考不上北大，谁能保证自己不受



到棍棒伺候?!

我家孩子的爸爸是支持孩子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

我家老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谈到关于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问题。记者是这样报道的：“金侠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的博士，世界著名防治艾滋病专家、‘鸡尾酒疗法’发明者何大一教授的得力助手。金侠的家在纽约州。金侠现在住在三百平方米的别墅，有两部私家车，生活条件蛮不错。但他不敢放松，每天非常繁忙，他说百分之八十的压力来自于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

老三在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到全世界一流的艾滋病研究机构洛克菲勒大学爱伦·戴蒙研究所去做博士后、研究员，后来又回到罗切斯特大学任教授，给博士生讲课。所以，一直在奋力拼搏着。照理说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已经站得比较稳了，职业和生活都有保障，事业也有一定的成就，应该让自己舒缓一些。但是，他还感到压力很大。更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自己身上的压力百分之八十是自己给予的。



金侠在首都医科大学指导实验



金侠在右安门医院讲课

金侠博士的自我估计是准确的，他确实不停地给自己增加压力。2005年圣诞节回国探亲，他一点也没有休息。作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右安门医院的客座教授，他去讲课，又去指导实验。作为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他又



父爱如山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从北京飞往上海医科大学，研究中美艾滋病合作项目。

这种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做法，是爸爸教会的。不只是老三，几个孩子们都是这样，他们仍在快车道上奔跑。从各自的事业来看，他们还在不断地付出心血和汗水，跑得越来越快了。有时候，我把他们现有的奔波形象地比作坐上了磁悬浮列车，迅猛地、高速度地奔跑着。这和我先生对他们自幼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孩子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反复对孩子们说：“不要总让别人管，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

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也是我先生身上的特点。我们在中央党校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从1961年到现在，在中央党校已经几十年了。他的教龄和我的教龄一样长，整整半个世纪五十年。有了多年专业研究和教学经验的积累，再来新的教学任务的时候，本来也可以简单地备课就可以应付过去，但我先生从来不这样，他对自己的讲稿有自己的要求。

每当他在给博士生上课，或者同博士生谈话的时候，特别是审阅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总在思考一个问题：该怎样给学生讲课呢？

连我们在散步的时候，他都自言自语地说：“明天给他们讲点什么呢？”

我说：“你对党史那么熟悉，对‘文化大革命’又有专门研究，有文章、有著作，还愁讲什么内容！”

他说：“总是得给学生一点新见解。”

所以，每当学生到我家来，哪怕只有一个人，我都看他从自己书房走入客厅，手里总拿着一张纸，写着大大小小的若干条提要。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强烈的责任感，不断给自己压力的精神，都时时刻刻感染着我和孩子们。



爸爸开刀不叫痛

1985年，我先生的肺部长了三个肿瘤，医生建议必须开刀。即便是良性肿瘤，也难保不会变为肺癌。在这种情况下，我先生开刀了，拿掉了一条肋骨和一叶肺。从送医院一直到陪同出院，我在他身边护理了一个多月。这种开胸的手术一般需要几个小时。早上推进手术室，中午方能推出来，可想而知他有多么痛苦。后来我问过他的感觉，他只回答了一句话：“好像死了一回。”

一般人做这种大手术，麻药过后都疼得直喊叫。当年，他五十三岁。我看到医院里，很多年龄和他相仿的人，有人还不如他的手术做得大，却“哎哟，哎哟”地直叫。有的大男人还直喊：“妈呀，妈呀，疼死我了。”可是，我先生却从来没叫过一声。

护士也说：“小金大夫（金萤）的爸爸做手术麻药过后，一般人都哼呀叫呀的，他却一声都不吭。”

我女儿也跟我说：“爸爸开刀不叫苦，不叫疼，这么大的手术，真难得。”

当时看他痛得很厉害，我很心疼，就对他说：“你痛得厉害，如果喊一喊、叫一叫能感到痛苦减轻，就叫一叫吧。反正是大手术，没有人笑话。”

他说：“叫就能不痛吗？不见得吧！那干吗搞得家人和同房病人不得安宁？自己忍一忍就是了。”还有一次，他说：“在这里叫很不好，影响医生和护士的工作。男子汉大丈夫，做个手术还那种表现！”



父爱如山

我在听到别人喊叫时，对他说：“你看别人不都在叫吗？如果能减轻痛苦，你就叫吧，别想得那么多了。”他不同意我的话，始终是不喊不叫。他想的总是别人，想的是家人的安宁，想的是不影响医生和护士的工作。



爸爸开刀不叫痛

那么，怎么解决疼痛呢？他给自己想了个办法，就是看书、听音乐。他让我把家里很有趣的书拿给他看，还让我把收音机拿给他。他戴上耳机自己听，不影响别人。所以，他躺在病床上，不是听音乐就是看书。他说：“听音乐能分散精力，不然的话只想

疼。看这些有趣味的书，更能转移注意力，分散对疼痛的感觉。”

当时的住院条件不怎么好，虽然我先生的级别已够司局级，中央党校还专门给医院开了请给予关照的介绍信，但当时友谊医院的设备比较差，高干病房正在装修。所以，他和几个病友同住一间房，三个人住一个房间。其中有一个身患胃癌的病人，他是《光明日报》的编辑，另一位是工人。

他们住院的时间比较长了，看到我先生刚开刀不久总是在看书，很关心，也很担心。

我进病房后，他们多次对我说：

“你劝劝你爱人，他总是不停地看书，这样会累坏的。开过刀，要静养，闭目养神。”

“千万不能在病床上还和自己过不去，不要总还想看书、教书的事……”

我先生听到这话后，笑了笑说：“这都是闲书，很有趣，看了能转移注意力，不会总觉得刀口有多么疼痛，不然会越想越疼的。”

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教书人就是这个样子，守着书不放，所以一再让我



劝先生少看书。而我却很理解自己的先生为什么要看书、听音乐。

那两位好心的同室病友还对我说：“我们劝你先生，要么不看书，闭眼睛休息；要么就和别人聊聊天，这也能减少疼痛。”

“你先生不爱和别人说话，一天也听不到他说几句话。”

我急忙解释：“他就是这么个性格，在家也是话很少。”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工人，我还补充强调了一句：“他是个教书人，但没有架子。他在家里也是这样，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和别人很少聊天。”

其实，这一次大手术带来的疼痛是很大的。他有一次对我说：“手术后麻药劲过去了，浑身都痛。躺在监护病床上，身上插着几条管子，胳膊上打着点滴，一点儿都不能动，真像上刑一样。”

切掉一叶肺后，他呼吸困难，走不动路，说话没劲，回家上三层楼，中间要停歇几次。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将近一年，但是，他经受住了，我很佩服。孩子们每次去看他，不论谁来，他也都是高高兴兴地问他们的学习情况。所以，孩子们都说：“爸爸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爸爸精神状态非常好”，“爸爸好像不懂得疼痛”。

听到孩子们的这些话后，我先生只是笑一笑，就过去了。孩子们对老爸坚强的性格充满了敬佩。父亲的这种性格时时影响着孩子。



走自己的路

让孩子独立走自己的路，是家教的正道。

“狼爸”让孩子在香港考大学、在大陆读高中，有自己的思考。在网上和电视台的节目中，有人提出香港考分和大陆要求不一致，录取分数上占便宜。还有人提出，“狼爸”的孩子是由家里联系去香港考取的，香港的录取分数低。

“狼爸”的回答是，凭着孩子在高中的学习成绩，在内地一样可以考上北大。我倒是很相信“狼爸”这种合理的解释。可是，有人还问：在广州读高中，临考前去上海突击复课，照理在内地报考不是更方便吗？

“狼爸”让孩子去香港考大学自有他的思路，我们不必做更多的猜测。但爸爸这种包办而非常规的绕道而行的做法，总不是让孩子自己独立走直路吧！

类似的事情我们也碰到过。前面曾经谈到，我大女儿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期间，她们那里农村中学的化学、物理老师病了，请了长假，没人授课。所以，她被从知青中抽调做代课教员。金萤教书的学校条件特别差。三个弟弟骑车子去看过，回来说：“那个破土墙一下就能迈过去，连一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姐姐继续在那里待下去，太危险了。爸爸、妈妈，给姐姐活动活动，让姐姐回来吧。”

孩子们说的“活动”，就是走走后门。客观地说，按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联系，把一个下乡的女儿转回城里，安排一个工作还是办得到的。孩子们看到别人家这么办了，觉得我家也可以。



爸爸听了以后，却对几个儿子说：“干吗要走后门？”

几个孩子有点生气，说：“爸爸你真是‘房顶开门，灶炕打井’！不能万事不求人。”

爸爸说：“我倒不是万事不求人，该求的我还是求。怎么能在房顶上开门，灶坑里打井呢？但是，办事情要有个原则。明知不该办的事，怎么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就去办呢？”

我们家里是很民主的，像这种对话，比如老子批评儿子，儿子反过来批评老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爸爸看着儿子有点生气，还笑着给他们解释。

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双方态度还可以，但是意见有点“顶牛”。爸爸和儿子的看法不一致。于是，我就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说：“我们不去走后门，那是旁门左道。让姐姐锻炼，苦一点不怕，要锻炼有一点风险也是难免的。你姐姐在这里锻炼出来了，以后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再大的沟沟坎坎都能过去。”

三个弟弟看爸爸妈妈都坚持不去走后门，所以都沉默了，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

我先生和我都是主张绝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违反原则的，特别是要给孩子树立一种理念：我们不能干那些不该干的事情。

谈到这里，我想先生当时的坚持是对的。我这几个儿子，从姐姐的问题上接受了很多教育。所以，他们也是什么事情都不靠爸爸妈妈，而是一切都靠自己，刻苦努力、奋力拼搏。他们都说：“姐姐是他们的好‘领头羊’。”

这位“好领头羊”赶上了好时光。我女儿经过一段时间教学实践的锻炼，课教得很好，自己的知识也得到了充实和提高。随后赶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恢复高考，她在第一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大学。

写到这里，我想起这可能也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革命传统留给我们的心理积淀。如果说在这件小事上处理得对，也不过是继承了古人的传统罢了。记得包丞相，人们都称他“黑脸包公”，他的遗著中记载着一首五言诗，



父爱如山

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唯一文学作品。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这里强调的“直道”也就是正道。只有“直道”才是立身、做事的根本，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每个孩子都应该会劳动

家教对孩子各方面的要求都应该比较严格。不仅是学习和做人方面，还要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能力。

“狼爸”在教育孩子从事家务劳动上，做得很好。他的孩子能够做一手好饭菜招待客人。然而，孩子做户外劳动却遭到他的辱骂、制止。大儿子在阳台上种菜和花草，“狼爸”却将其与学习对立起来。孩子辩解说没有影响学习，想研究植物，竟落得一个“顶嘴”的“罪名”，受到藤条的抽打，不得不铲除了自己辛苦种下的东西。看来，“狼爸”并不认为劳动是孩子们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和习惯。

我们则把孩子劳动观念的培养看作立人做事的基本功。我的先生很注意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他还会想出各种办法激励孩子去劳动。

我的大儿子，小的时候身体比较强壮。十多岁时，爸爸就对他说：“你不小了，得学着帮妈妈洗衣服了。我和你差不多年龄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衣服全靠自己洗。”

儿子听了这话后，就跑去找我，说：“妈妈，爸爸说让我帮助你洗衣服。”

我一听，笑了，心想：一个笨手笨脚的小子，怎么能帮我洗衣服？我说：“我都很少让姐姐帮忙，她患过急性肝炎，身体一直比较弱。妈妈身体好，不用你们帮忙。”

我的大儿子从小数学就比较好，他张嘴就来：“妈妈，你一次要洗三十六



父爱如山

件衣服啊！”

我说：“你是怎么算的？”

他说：“一家六口人，每人的棉裤、棉袄各两件，衬衣、衬裤各两件，裤衩、背心各两件，一共三十六件。”

我说：“我只管洗，还没查过件数。”

他坚持帮我洗，我看孩子那么心疼我，就让他拿小板凳坐在我身边，让他先看一看，学一学。

我还问他：“水可凉了，你受得了吗？”

他说：“我受得了！”

当时，我们在河南“五七干校”，家里没有自来水。干校的每一排平房前面，有十多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洗衣服只能在外边。天再冷也得这样做。四季洗衣服，大概冬天是最苦的了。当然，我从来没向我先生和孩子叫过苦，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地洗。

但是，我的劳累，我先生看在眼里。他心疼我。他管做饭，我管收拾屋子、洗衣服，搞卫生。

金煜当时坐在我身边不走，笑呵呵地一再问我：“妈妈，我可把小盆拿来了，你就告诉我怎么洗吧。”

后来，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洗不干净怎么办？先学洗领口和袖头，脏的地方各搓五十下。”

我本来是逗他玩的，他却真的动起手来，拿起一件小衣服就搓了起来，一边搓一边还念叨着：“一下，两下，三下……”不到五十下他不罢手，我被逗得哈哈大笑。

他本来就爱笑，所以跟我一起笑了起来，并且说：“妈妈你看，我多听你的话。”

他在越洋电话中对记者说过这样的话：“记得随父母在河南‘五七干校’



时，妈妈教我怎么洗衣服，告诉我把衣领、袖口分别揉搓五十次。我机械地照做，也就这样慢慢学会了洗衣服。”（《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

爸爸叫孩子养成劳动习惯，不只是这一件事。他在家让孩子到食堂打饭、帮助洗碗、扫地、收拾屋子，还给孩子们分了工。所以，我家的孩子很早就都学会了干活，而且都比较勤快。一旦哪个孩子平时完不成任务，爸爸就替我督促。长此以往，孩子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劳动习惯。脱离父母的照顾后，他们都能够自立，搞好自己的生活。从小教孩子干一些家务劳动，看似小事，但对孩子以后立家处事都十分有益。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曾经谈道：“游手好闲的习惯，是人生最不幸的灾祸。”（《教育史》，第171页）在我家，我先生是不允许任何孩子游手好闲的。他对孩子劳动的要求和教育，我非常赞同，我们俩人始终保持一致。这就在孩子身上培养了一种美德。

直到现在，儿子们虽然都成了自己所学专业的专家、高科技人才，但是到了家里，都努力帮助自己的妻子做事情，没有那种回家往沙发上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一切靠女人伺候的大男子主义的坏毛病。正像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青年时期流的每一滴汗水，顶得上成年时期许多紧张的劳动……劳动是最伟大的美，让孩子们认识这个美，是教育的奥秘之一。”（《文汇报》，1982年6月24日）



精打细算过日子

我们中华民族有勤俭持家，厉行节约、精打细算的可贵传统。

在精打细算方面，“狼爸”做得比较好。他特别注意让孩子学会节俭，所以他的孩子都很简朴。我们可以从书上和媒体中看到他四个孩子的穿着、打扮都很素雅。大儿子在上大学前穿爸爸“淘汰”后的衬衣，上大学穿的还是这些，但丝毫不减孩子的英俊。正如他爸爸所说，“萧尧几年来穿的始终是我‘淘汰’下来的旧T恤……”。

“狼爸”在这方面对孩子的训练是很严格的，这在今天流行奢靡之风的社会风尚中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否还有值得商量之处？比如：在广州的极热天气里，不准开空调；一次也不准孩子买“肯德基”“麦当劳”快餐，要买也只是一小袋薯条；不准买零食，少量也不行；未经允许不能打开冰箱拿东西吃，喝一瓶可乐也得请示……依我看，这似乎过于严苛了。稍微开放些，岂不更好！

我家的财务大权，一直在我先生手里。这是我心甘情愿交给他的，因为他会节俭、精打细算，在这方面比我强。我们小孩多，孩子不仅需要吃穿，还都得上学。我妈妈见我家经济困窘，感到揪心。

有一天，老人家很忧虑地对我说：“你哥哥嫂嫂挣钱和你们俩一样多，他们是三个孩子，钱总不够花。你们这点钱可怎么办呢？”

开始，我没有吱声，沉默了一会儿，想了想才说：“妈妈，您放心，春明会计划，日子过得去。”



有一天，侄女从哈尔滨来到我家。侄女来了，全家都很高兴。她是我母亲带大的，感情较深，无话不谈。当谈到支出拮据时，妈妈说：“兄嫂家里的办法是，每个月钱不够花时，就向人借一点，开了工资再还。有的时候是向公家借，有的时候是向私人借。反正孩子多，不够花，大家也理解。”

我妈妈没有说让我们也这样做。但是，我听出了她的意思，让我们参照兄嫂的做法，可以活泛一点，生活不搞得太紧。在哥哥家里，哥哥是一个甩手掌柜的，不爱管一些家庭琐事，只管当他的领导干部。钱够不够花，他不管；需不需要借钱，他也不管。所以，借钱都是女主人出面。

当我把哥哥嫂嫂家的情况，向我先生述说后，我先生说：“那样，不得月月欠债吗？”

我说：“是这样啊，月月欠，月月还。”

我先生说：“这样过日子可不行，不欠债为什么不能养活家？”他很尖锐地对我提出这个问题。

我回答说：“这可要看你的本事了。我主要怕家里花钱太紧张，你着急上火。”

他说：“我有计划，咱们家用不着向人借债。”

他还说：“从小父母就经常告诉我们要‘摸着兜兜花钱’，也就是量入为出。不主张借债，‘开了小口刹不住，就会越开越大’，‘一寸小口，斗大的风’。”他还很有把握地给我作了分析，每个月必须保证多少固定开支，留有多少机动钱以备不时之需，都计划得很好。听他讲过，我放心许多。

我们没有采取借债的生活方式，家里每个人都省吃俭用，加上我先生的巧妙安排，所以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向别人借过一分钱。他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家自力更生，自己解决问题。

有一次，他带着两个儿子去食堂吃早饭。早饭像平常一样，就是白面馒头、大米粥，还有三小碟咸菜。大儿子很能吃，吃了两个馒头后说：“爸爸，



父爱如山

我还想吃馒头。”

我先生说：“去买。”

等他买回来以后，看桌子上的咸菜已经吃光了，就对爸爸说：“再买点咸菜吧，就买一小碟。”他说话的口气是商量的。

我先生沉默了一会儿。每月的饭票都是发下工资就买的，多花了就要补餐券，影响整月开支计划是他不愿意做的，所以他说：“你那一个馒头，几口就吃进去了，还要什么咸菜？”

孩子看了看爸爸，也没有硬要。因为孩子们都理解，当时那种家庭状况是一分钱一分钱在节约的。三分钱的咸菜在爸爸的心里，可花可不花，就不花了。

现在来看，我先生似乎太抠了、太过分了。但是，当时对我们家来说，不这样做就没有办法过，就不得不向别人伸手借债或向至亲讨要。

那一次没有给金煜买咸菜，孩子硬是干吃了一个馒头。每谈起这件事情，我先生心里都好像很内疚，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我就多次听他说：“当时家里真是困难啊！金煜让我给买一小碟咸菜，只有三分钱，我都没有给他买。现在想起来，很不是滋味。但是，那种苦日子终于熬过来了。”

我家老四在接受《南国都市报》的记者电话采访时，也说道：“记得‘文革’末期，家里生活很困难，但知足常乐，全家吃上一碟油炸花生米就觉得很满足了。”（《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

我先生的克勤克俭，带出了好的家风。我们的四个博士儿女，现在在国外已经成为他们所属各行业的专家，收入都很不错了，但是他们从不乱花钱。用他们的话讲，“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这样说，孩子们也都自觉自愿地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有的朋友说，刻苦勤奋是金家的家风。然而，我觉得“克勤克俭，勤俭持家，清正廉明”也是金家的家风。这是由我先生带出来的好家风。



教孩子做人

父母对儿童的教育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大小、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千变万化总要有个核心，这就是对孩子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孩子真诚、正直，学好科学知识，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狼爸”很注意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有的孩子说一次谎，他就“拿着藤条狠狠地往她的小腿抽去”。然而，用这种教育方式，无疑很野蛮，而且不一定会有好的效果。用打来制止说谎也可能起反效果，孩子也有可能因怕挨打反而说谎，不如用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好。

真诚，也即诚实，是对孩子基本的要求。“我们都讲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真善美中‘真’是一切的基础，离开了‘真’，所谓‘善’和‘美’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蔡武《中国人不能缺精气神》，《参考消息》，2014年6月6日）

家教的出发点应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通读《所以，北大兄妹》一书，从头到尾看不到这样的教育理念。

2002年，中央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做《交流》节目时，主持人提出：“你家有四个博士，大家都想知道教育四个博士的绝招。”我先生和我都讲：“我们没有什么绝招。”当时，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了点滴经验。

会上的一位特邀嘉宾说：“不叫‘绝招’，就叫‘金招’吧。”他还概括说：“看来你们把孩子做人放在第一位。”



父爱如山

我说：“不错，做好人才能做好学问。”我们谈了一些教育经验之后，当主持人请观众发言时，有一位观众站起来，首先是赞扬了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接着提出：“你们要求孩子做好人的最主要内容是什么？”

我说了一句：“主要教育孩子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接着，我先生补充说：“我们要求孩子诚实、正直，学习科学知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下面掌声雷动。我先生用精练的话概括了我们对孩子做好人的要求，使别人感到切实可行。

关于这几个方面，我先生在进行教育时的要求是，原则问题不让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于真诚，我们一贯教育孩子不能说谎，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记得还是在老三、老四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居住的楼道里发生了一件事。接连好几天，大人总喊：“谁把我的自行车的气门芯拔掉了？”今天是这个车子上的没了，明天是那个车子上的没了，搞得大人很烦恼。车没丢，却不能骑，而且还要推车去修理，影响工作，但又不知道是谁干的。

有人在楼道骂了起来，说：“这是谁干的缺德事！”

我先生和我分析：“这可能是小孩子干的。”是哪个孩子干的，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干，我们不清楚，但我们都知道肯定不是我家的孩子干的。因为我家和邻居关系好，孩子们对楼上楼下的阿姨、叔叔都非常尊重，也很真挚、热诚，不可能去破坏他们的车子。

但是，事情接连发生，特别是有些同志车子的气门芯换了一个，又给拔了一个。

我觉得很奇怪，对我先生说：“既然是孩子们干的，孩子们之间可能知道。”

我先生说：“你向孩子们了解一下吧！”

我没有一一去问，觉得老三金侠特别机灵，爱观察事情，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所以，我就找他来问。



他当时告诉我：“不是我们干的。”

我想，不是我们家孩子干的，也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于是继续问他：“你能和妈妈说是谁干的吗？”

他说：“我知道是谁，但不能告诉你。不是我们干的就行了呗！”

他的话有顾虑，可能是怕说出来楼道的大人会骂那个孩子，或者让家长知道，孩子会挨揍。所以，我也没有进一步追问，只是说了一句：“你告诉那个孩子，以后再不能干这种事情。”我还把这话说得比较重，说：“你再告诉他，和哪个大人闹别扭，可以直接找叔叔阿姨谈，不能干这种不正当的事情。”

老三答应了。但是，他说了一句：“我可不能保证他以后不干。”

我说：“可以。”

后来，我把和老三谈话的经过，告诉了我的先生。他说：“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他告诉那个孩子，孩子不听，恐怕还得出事。”他建议：“把老三找来，咱们两人一起和他谈。”

我嘱咐了一句：“谈是可以，但是你别逼问他，他不愿意说。”

我先生说：“怎么能逼呢？不过是进行正面教育。”

后来，我在旁边坐着，看他跟金侠谈话。我先生笑呵呵地对他讲：“你本来是个诚实的孩子，爸爸也相信你永远都会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可是，诚实的孩子说话不能吞吞吐吐，说一半留一半。反映情况要如实，而且要帮助大人积极解决问题。”

老三很敏锐，马上对爸爸提出反问：“我没有吞吞吐吐的，也没有说谎。怎么提到诚不诚实的问题？”

我先生说：“你对妈妈反映的情况不完全，不是说你不诚实。既然要讲，就要把话讲透。不能藏着盖着的，这种说话的办法不好。”

于是，老三提出了一个条件：“我要是说了，你们得向我保证，不让他的爸爸妈妈打他，也不让楼道的叔叔阿姨骂他。”



父爱如山

我先生说：“能保证。”

爸爸妈妈在孩子心目中威信是相当高的，孩子不会虚晃一枪，于是，他告诉了我们某某孩子干的。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没有在楼道声张，更没有找那个孩子的父母，而是把孩子找来，直接谈了话。我先生告诉那个孩子：“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做错了事不隐瞒。你给叔叔和阿姨说一说，为什么经常到我们楼道拔气门芯？”

那个孩子看到我们俩的态度非常温和，高高兴兴地同他谈，他也嬉笑着告诉我们：“冬天外面特别冷，我们小朋友在你们楼道里玩，这个楼道有几个阿姨和叔叔，一见到我们就往外撵，有时还骂。我们生气，大家想报复都不敢动手，我就开始动手了。”他还自我解嘲地说：“反正是小事，自行车也还能骑，就让他们多换几次气门芯。”

我先生和我很耐心地对他说讲了道理，希望他不要总想着报复，多关心他人，而且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叔叔和阿姨撵他们出去。

我先生说：“这个楼道里的阿姨和叔叔都是教员，需要在家里备课，一吵闹备不了课。他们怎么给党校学员讲课啊？”

我还特别补充讲：“你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我相信会体谅叔叔阿姨的，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你也要放心，这件事我们不会和别人说，不和你爸爸妈妈说，也不和楼道里的人说，你悄悄地改了就是了。”

从这以后，楼道里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有的同志说：“最近比较安定。”我们笑了笑，从未吐露出真情。这样既保护了孩子，又教育孩子，也给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灌输了做诚实的好孩子的信念。

我先生本人做人诚实、正直，不爱阿谀奉承别人，不喜欢两面逢迎，不喜欢看领导脸色办事。有的时候他对我讲，自己不能说违心的话去附和别人的错误。他有一个信条：“有些事，我宁肯不说，也不说违心的话。”他做学问如此，为人处世也如此。他也对孩子们这样讲：“有些事情，特别是发生在



你们小朋友之间的事情，你们能说就说，能帮助就帮助，一时说不了也可以不说，但绝不能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对的。”他反复地给孩子灌输这个宁可不说，也不说违心话的信条。所以，我家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敢于直言。有时候确实不便直言时，宁肯不说，也不说违心的话。

台湾的《树德体育网》登了一篇文章很好，叫《“巅峰体验”，心理健康的添加剂》。这篇文章写了一段话，很符合我先生和我的心意。其中说道：“心理更健康的人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八面玲珑的‘应声虫’或者毫无原则的‘和事佬’，而是巧妙地抵制有缺陷的习俗的改革者。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们不适应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适应不等于盲从或者随波逐流，也应包含合理的对抗。他们在该‘我行我素’时就‘我行我素’，表现出心理的高度自由，更具自主性和独立性。”（《参考消息》，2003年8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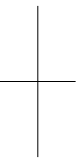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快乐的“老教练”

游戏对于学前儿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游戏对于他们是学习，游戏对于他们是劳动，游戏对于他们是重要的教育形式。

——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





带孩子玩的“大哥哥”

爸爸在玩中便于和子女沟通，增进亲和力，能够和孩子建立更深厚的感情。这对于教育孩子大有裨益，是家教的良方。

“狼爸”不主张孩子玩，更不会带着孩子玩。他认为“玩物丧志”，从而规定“三步不许孩子出‘闺’门”。他有时也申辩说：“我还常常带着他们去各地旅行”，但是萧尧却不认同，并表示：“胡说！就连高中毕业旅行都不情愿答应我去！春游从小到大就去过两次！”

我家孩子爸爸在休息日，是很主动带孩子出去玩的。

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了。我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中央党校团委书记，最早被打成“黑帮”。后来，党校所谓的大“黑帮”被“揪出来了”，造反派关注热点转移，对这些小的黑帮管制就放松了一些。经过一段时间后，造反派慢慢准许他们不必请假走出校门了。

当时，我先生非常高兴地同我商量：“今天，我想带三个儿子到温泉去玩一玩，你和小萤在家里搞家务吧。”

我特别乐意他出去散散心，说：“好，家务不多，我做得过来。”

接着，我问他：“你怎么去？”

他说：“骑自行车驮着他们去。”

我惊讶地说了一声：“一个车子怎么能驮三个孩子？”

他说：“我有办法。”



父爱如山

这样，我也高兴地说：“你们走吧！”

可是，回来我听几个孩子快活地抢着对我说：“妈妈，今天去温泉好玩极了，爸爸给我们‘老鼠搬家’。”

我说：“什么叫‘老鼠搬家’？”他们说：“就是一点一点地来呀。”后来我才知道，我先生先把大儿子放在一个汽车站边，让他等着，随后骑自行车把两个小的驮到另外一个汽车站，又让他们在那里等着。于是，再回来接哥哥。哥哥见了弟弟后再等，我先生又送两个小儿子。就这样往返几十里路接送多次，搬来搬去，多骑了两倍的路程，四个人才到温泉。他们在温泉疗养院附近买了一些点心和几瓶汽水，爬了山，玩得非常开心。在山上见到“滦州举义纪念碑”，我先生还给孩子讲了历史故事。可是，当往回走的时候，我先生“搬”不动了。后来，他就让大儿子坐公共汽车回来。从温泉到北宫门，汽车费是两毛五分钱，可我先生以为是两角钱，少给孩子五分钱。最后，儿子下不了车，是旁边一个好心叔叔给垫了五分钱，乘务员才让下车的。

这件事情给孩子的印象很深。有些小朋友到家玩，他们还经常和他们说：“爸爸跟我们玩‘老鼠搬家’，好像个大哥哥，我们真开心。”

可见，爸爸在家里不摆家长架子、不要家长威风，学会同孩子玩很重要，能够和孩子建立更深厚的感情，对于教育孩子大有裨益。不过，家长和孩子玩要保持适当的分寸，像脸上贴纸条、钻桌子或其他有损人格的游戏，他们是从来不玩的。失去了分寸，就会使父亲在孩子的眼里失去尊严，有损于父亲教育孩子的严肃性。



注意锻炼孩子的胆量

胆量教育在家教中有特殊地位。孩子自幼有胆量，长大才能敢想敢做敢为。为让孩子听话，常常吓唬孩子，在家教中是一种低俗的做法，坏了孩子的现在，又害了孩子的未来。

“狼爸”不是使用这种低俗的办法吓唬孩子，而是高出一筹。他以人来吓唬，以惩罚来吓唬。他告诉孩子，他自幼念书总挨奶奶打，少考一分，打一下手板，考的分数越少打得越多。他说自己就是照此办理（只不过不是板子打手，而是用藤条和鸡毛掸子打）。萧君有一次到同学家玩，只玩了半个小时，爸爸知道了，她说自己“真的是吓得魂飞魄散了”。萧君到了家，挨了打。

“狼爸”说：“对于这次受罚，萧君至今谈虎色变。”一个孩子如果“谈虎色变”甚至“魂飞魄散”，那还何谈胆量呢？

我先生特别注意锻炼孩子的胆量，给他们承受风雨的力量。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去爬香山。他一路上带着孩子走在前面，金莹和金煜两个人跑得最快。我先生两只手分别牵着两个孩子走在前面，我始终走在后面。

我先生带着孩子在前面走，让两个孩子回头喊：“妈妈，加油！妈妈，加油！”当我赶上去的时候，听孩子问：“爸爸，爬到‘鬼见愁’还很远吧？妈妈能爬上去吗？我们会不会害怕，爬不上去？”

“鬼见愁”是当时人们对香山公园最高峰的称呼。香山公园现在有缆车，已经很容易上去了，但那时只能靠双脚。对孩子来说，第一次爬那么高的山，



父爱如山

名字又叫“鬼见愁”，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鬼见愁”有些神秘，让他们有点怕。

我先生就鼓励他们：“咱们都能爬上去，妈妈也能爬上去，你们更能爬上去。”他还开玩笑地对孩子说：“那里是‘鬼愁人不愁’。你们到那儿就知道了，会有很多阿姨、叔叔，还有小朋友都能爬到最高处。”

老三反应得总是很快，立刻问：“爸爸，你不是说没有鬼吗？”

我先生回答说：“是没有鬼，人们是把它比喻成‘鬼见愁’。”

我也对孩子说：“世界上就没有鬼，人们想出来一个鬼，觉得鬼特别厉害、可怕，比人还凶。所以，人们在那个山头上写了三个字，叫‘鬼见愁’，好像鬼见了都愁，人就更上不去，是说明那里很难爬上去。”

由于爸爸一再鼓劲，孩子们就嚷：“我们能爬上去，我们能爬上去，我们什么都不愁。”当登上“鬼见愁”时，我先生和孩子们的情绪都非常高涨，激情满怀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个“胜利”不仅给孩子带来了好身体，而且磨炼了孩子的心灵。有一位名叫马斯洛的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巅峰体验’的人，心理会更健康……他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以及欣赏文艺作品、投身大自然时，能感受到一种非常奇妙、着迷、忘我，并且能与自然界融为一体的体验。这时，他们表现为情绪饱满、高涨。”马斯洛把这一体验称为“巅峰体验”。（《“巅峰体验”，心理健康的添加剂》，《参考消息》，2003年8月12日）

在我们家，我先生和我从来不给孩子讲鬼怪故事，也不用什么“狼来了”“虎来了”之类的话来吓唬孩子。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都能成为勇士。即使是我们的女儿，我们也希望她外柔内刚，不仅不屈服别人，而且能够“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所以，我们很少听到孩子们说有什么害怕的东西。

只有一次，在“文革”初期，有的小朋友往“黑帮”家里的玻璃上甩泥巴，孩子们真的害怕了。那个时候，我们晚上总去开会，都把孩子们锁在屋里。



有一次回来，我们看到两个孪生兄弟钻到床底下，姐姐和哥哥躲在书桌下面。我和我先生一进屋，姐姐、大哥哥跑过来抱着我们哭，两个小弟弟还战战兢兢地不敢出来。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次，他们不是怕鬼，是怕人，怕外面的孩子打碎玻璃爬进来，打他们。我先生和我虽然当时心里很难过，但还是极力安抚孩子，告诉他们：“不要怕。”

我说：“党校有规定，谁也不敢打坏玻璃。打坏玻璃，他们的爸爸妈妈是要赔偿的。”我先生还特别加了一句：“他打坏了玻璃，他的爸爸妈妈会打他。你们长大一个一个都得成为小伙子，现在得学当‘男子汉’，怕什么？”他还冲着女儿说：“你不是看了不少革命故事、小人书和大人书吗？你得带头当小英雄啊！”

我和我先生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对孩子进行教育，为的是使他们有一个善良的心，有一个不畏强暴的性格。那次，我们告诉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鬼不怕，咱们什么都不怕。”当时孩子们还不太理解这句话，但是，我先生在讲这句话时是意味深长的。



勇于自我批评

做父母的，对孩子该管的要管，该教育的要教育，但该关心的一定关心，该安抚孩子的时候绝不能去骂他、打他。父母也要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你是否告诉过孩子正确的该怎么做？

“狼爸”的大儿子萧尧，学习一向很好，但有一段时间成绩下降了。“狼爸”没有向老师做调查，也没有向同学了解原因，更没有对自己那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法做出自我反思。总之，他没有做自我批评，反而说打球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命令孩子不许打篮球。萧尧说，看到别的孩子们“痛快淋漓地打着篮球，而自己却在接受父亲的‘棍棒’惩罚时，我的心里就特别难受”。

我联想起这样一件事，虽不是关于学习方面的，但却是关于我先生自我批评方面的。

那次我先生和我带着四个孩子去郊游，也是去爬香山。这次骑了三辆自行车，女儿骑一辆，我骑一辆，我先生骑一辆。我先生的那辆车带着两个孩子，前面是老三，后面是金煜。我带的是老四。那是北京一个少有的晴朗的日子，我们玩了一天，又在那里野餐，非常开心。几个孩子活蹦乱跳，高兴极了。

可是，傍晚回来的路上，发生了险情。从山上往山下有一条路可以骑自行车，但是有一个较大的滑坡。金萤骑自行车在前面。我们忘记告诉孩子在下坡路骑车要慢刹闸，所以到了滑坡的时候，她就不会处理了。自行车飞一样地往下跑，我和我先生都在后面喊“慢刹闸”，但她可能听不到，也不懂如



何慢刹闸。当时真是把我们两个人吓坏了。她的车子一直飞跑了好长一段路，直到平地。但是，平地上那段路汽车很多。她当时也慌了，不知躲哪一辆车好，所以差点和迎面来的一辆大公交车撞到一起。幸好那时的公交车速度慢，又是上坡路，特别是司机眼疾手快，才避免了一场车祸。

我们到山下时，见金莹正在那里哭。司机也向我们发火：“你们怎么带孩子，差一点钻到我的车底下。我要是不把车刹住，你们的孩子今天就完了。”

汽车司机个子很高，身体很健壮，看来是个好心人。他特别生气，一会儿批评我们，一会儿又骂孩子：

“你还要不要你这条小命？我问你有几条命？……骑自行车是好玩的吗？下坡得慢刹闸。”

我先生和我，你一句我一句地向司机做检讨，“是我们忘了告诉孩子这里坡度大”，“我们没有告诉孩子慢刹闸”。虽然我们两人心惊肉跳，但对司机一再表示感谢，检讨我们的不是。司机看我们态度很好，感觉两位比较有礼貌、近人情，也就不再说什么，把车开走了。

金莹这个时候还在哭。不知道她是因为车子下滑，惊吓过度，受了刺激，还是由于司机骂她，感觉委屈。我们问她什么话，她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哭。我们看到她的车子和人没有摔着，也没有必要检查她哪里有伤痕，只是一再安慰她不要哭了。

我一再说：“怪妈妈，下山前该告诉你，山坡大，需要慢刹闸。”

我先生却抢着说：“爸爸这个教练当得不好，教你骑车，怎么没教你慢刹闸呀！别哭了，都是爸爸教得不好。”

他还说：“不怪你，都怪爸爸。司机叔叔骂你，是为了你好，让你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但这事不是你情愿的，是你不懂。”

经过反复劝慰，孩子觉得父母没有一个责怪她，也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全是在安慰她，金莹才慢慢不哭了，情绪也从震惊中镇定下来。然后，我们



父爱如山

又骑车上路了。从香山脚下到党校这一路，马路宽，车子当时也不算多，所以一路到家还算顺利。

现在有些做爸爸的年轻人，脾气特别暴躁。孩子有时候磕了、碰了，或出了点什么事，不是安慰，而是一味责怪孩子，似乎自己没有一点问题，有错也从不做自我批评。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做客，那是东北的冬天，孩子滑冰摔坏了腿。回来之后，爸爸见孩子腿摔破了，不是检查有没有什么骨伤或者肌肉撕裂，而是张口就骂：“你总是不小心”，“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让你出去瞎胡闹，你总是不听”。有的说得更重：“你再这样不小心，摔死了我们不管。”

听到这样的话，我在旁边觉得很寒心，立刻说：“你们赶快给孩子检查检查腿，是不是只有表皮流血，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肌腱。伤筋动骨得一百天啊！”我还特别强调了后一句话，说：“肌肉扭伤和腿骨骨折不容易好，起码得三个月。一百天不就是三个多月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孩子？”

后来，这两个年轻人才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孩子的大腿，让孩子伸伸腿、弯弯腿，看有没有更重的创伤。这件事给我的感触比较深。父母是否告诉过孩子运动前该热身，运动中该如何自我保护？孩子身体受伤，已经受到皮肉之苦，心里也很难过，爸爸又为什么火上浇油，让他心灵上再受到更多的苦、更大的伤害呢？有些父母怪孩子和自己疏远、有代沟，不愿和自己谈心……碰到这样的“申诉”，我常常请父母反省一下自己对孩子是否关心、体贴，是否在什么问题上伤了孩子的心，是否由于教育不得法而造成逆反心理等。现在人们常常议论“代沟”，似乎只要有一定的年龄差距，“代沟”就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年龄差距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但决定性的还是亲情。亲情的淡漠和利益的矛盾，才是“代沟”生成的土壤。“代沟”不是一天形成的，只有用深深的爱和细致的工作去慢慢地抚平。



别让神经绷太紧

父母应给孩子定下规矩：孩子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一定要他们自己做，不能凡事都依赖大人，必须耐心地帮助孩子，让孩子自力更生，学会自己走路。这实际上是训练孩子的自立信心和自我控制能力。这种能力会使他们健康成长，一点一点地学会从容地、自信地去处理各种问题。

“狼爸”在孩子幼年时就开始打。他不是耐心教孩子怎样“自己走路”，只是相信他的打。他有一个理念，即“在幼儿、小学这样的性格成型期，一定要严厉管教”。

在孩子幼年时，我先生是怎样训练孩子“自立”的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居住在沈阳市。有段时间，我先生在中共东北局党校工作，后来又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工作。我在沈阳师范学院当大学教师。有一次，我们到二哥二嫂家，坐公共汽车去的，也是坐公共汽车回来的，但到站下车后离家还不近，有一段路必须徒步行走。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金萤三岁多，我怀着老二，肚子很大。我们开始拉着金萤的手走，走一段之后，金萤就不愿意走了，要大人抱。我当时已经不能抱孩子，心想：我先生把孩子抱起来，不会成为问题。然而，我没料想到的是，我先生怕孩子变懒，不爱走路，就说什么也不抱她。

他一再笑着对女儿说：“再走走看，再走走看。”

他们两个人，一个让女儿走，一个说什么也不走。



父爱如山

我女儿脾气也还是比较犟的，那个时候长得特别胖，满身的肉，小腿也很壮实。其实，再走上一段路，爸爸抱起，也累不着她。可她提出来让爸爸抱，就必须抱，不抱不行。

我先生硬是要磨一磨她的性子，说什么也不抱。

两个人在路边面对面相持起来。

我看着没办法，就坐在旁边一个土墩上了。那是一段土路。后来还是我说情：“以后再锻炼小萤走路，这次，爸爸抱起来走一小段。”

这个时候，爸爸把小萤抱起来，她当然十分高兴，因为妈妈给了她台阶下。

我先生说：“其实，你很可爱，爸爸抱抱你也很好玩，就是想让你自己学着多走路，好好锻炼锻炼。不要什么都依赖大人。你懂吗？”

金萤答应：“我懂！”

其实，金萤懂事很早，说话也早，两岁多爱听收音机，学习背诵，三岁多，已经能背很多歌谣和不少唐诗了。我们的女儿不是神童，当年，孩子主要接触的媒体是收音机，听“小喇叭”广播。同龄孩子，会背歌谣与唐诗的也有不少。给他们讲一些浅显的道理，他们懂得，能听进去，并不像“狼爸”所说的“幼年的孩子，连字都认不全，跟他讲道理，不可能听得进去，唯有用‘棍棒’教育”。

就这样，爸爸抱起孩子后，走走抱抱。到该下来走的时候，我女儿也要求自己下来走走。她很懂事，好像知道爸爸不抱她，是怕把她惯坏了。到了家，小萤又跑出去玩了。看来，她不想走路，不是因为累，是想撒娇。

我和我先生开玩笑说：“你们二位，两个犟脾气，在路上面对面站着，都快二十分钟了。”

我先生说：“哪有那么长时间？”

我说：“我怎么会骗你呢！”

他对我开玩笑说：“不是也想让你歇歇腿吗？坐一会儿。肚子太大了，走



路腿当然沉重。”

我笑了笑说：“你不愿意抱孩子，还找个理由，说让我歇一会儿。”

他说：“我到该抱的时候，肯定会抱。我发现她撒娇，不爱走，依赖大人。”

这件事情看来很小，但是也反映了我先生这辈子对孩子的态度。他从来不娇惯孩子，总是希望孩子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不能从小就依赖大人。让孩子能够自力更生，这是他一贯的态度。美国《新闻周刊》2004年9月13日刊登了文章《专家答疑：如何对孩子说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马丁·塞利格曼说：“如果一切都能毫不费力地得到，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心理不可能健康，生活也不可能幸福。”（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年10月19日）。看来，虽然中美文化不同，但在教育孩子方面，主张对孩子不娇惯，敢于说不，让他们自立，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有共识的。

几个儿子出生以后，凡是我先生带孩子，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孩子刚迈步，他就蹲在前面，离孩子有一段距离，总是在那里喊：“自己走走看，往爸爸这边来。”他还鼓励孩子说，“摔不着。”有时候，看到儿子一扭一歪地走过来，快摔了，他急忙跑上前去抱起来。这也是父亲严以教子的一个表现吧，也可能是传达他对孩子爱心的一种办法。他希望自己的儿女自幼学会自己走路，少一些大人的搀扶。

在老三、老四有小车后，我们常常推着他们在院里转。我先生有时候会把孩子轮流从车子里抱出来，让孩子自己走路，训练他们。

我看到这种情况，总忍不住提醒他：“你小心，别把他们摔坏。”

他说：“你放心，我训练他们，不会摔着的。”

我先生总是通过一件件的小事，想办法锻炼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自己有信心走路，有信心走好这一生的路。这一点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所以，孩子可以主动地抓住任何时机，从容地、自信地去处理问题。后来孩子们都到国外去留学，有朋友问我们：你们夫妻都是教授，国外可能有关系吧？也有



父爱如山

的问：四个孩子出国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其实，那时我们两个穷教授既没有海外关系，也没有钱。从申请到出国以及几年的留学生活，全都是孩子们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老实说，作为父母，我们既没有操多少心，更没有花多少钱。孩子的爸爸有一次同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孩子们出国，我们唯一的资助是给邮票钱，帮助孩子给外国大学寄申请材料。联系学校，办出国手续等，全是孩子们自己解决的。”我想，这些同从小锻炼他们的自立精神是分不开的。

有一篇文章叫《别让你的神经绷得太紧》，其中关于自信心和自立谈得很好。里面讲道：“这里所说的自信不是狂妄自大，也不是自以为是，而要学会自我控制。”还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不靠自己，我又靠谁呢？如果我只想着自己，我何以应付世事呢？’如果只指望他人把事情办好，或坐等他人把事情办好，就可能使你处于被动地位，也可能成为环境的牺牲品。因此，办任何事情，首先要相信自己，依靠自己，不要将希望全部寄托于别人。”（《参考消息》，2003年8月12日）这里谈到的和我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



小病小痛不是事儿

当孩子有了伤痛或疾病时，父亲应该鼓励他，而不是吓唬他，要夸奖孩子同伤痛作斗争的精神。这对孩子的康复以及健康成长是有益的。

从《所以，北大兄妹》一书中，我们看到“狼爸”四个孩子身上的伤，多半是他打出来的。而且，“狼爸”不许孩子哭，哭加倍地打。姑姑爱抚，妈妈忙上药，爸爸无情地走开，没有甩下“活该”二字，就算是留情了。

我家的四个孩子小时候好像都有一个特点：爱笑不爱哭。我母亲说：“这和你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先生性格比较温和，他对人家是很爱笑的。我的性格也比较温柔。我母亲还说：“你们两个不爱吵架，整天高高兴兴的，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总是高高兴兴的。”

但是，小孩难免磕磕碰碰，在摔倒以后也会哭。

平时，我们告诉妈妈：“孩子摔了，不要去扶，让他自己爬起来，鼓励他不要哭。”我们认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长大不怕摔打，能够正确面对困难。不过这里谈的不是指学走路摔跌一类的小伤，而是比这严重得多的、真正的伤病。

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老三金侠和老四金延还在读小学，老三受了重伤。他们放学比金萤姐姐和金煜哥哥早。中央党校有些工作的大哥哥，特别喜欢他们。有一次，有几个大哥哥来找老三、老四，邀他们去颐和园游泳，两个孩子都跟着去了。孩子们开始玩得很开心。后来，老三想要学跳水，也没告



父爱如山

诉大哥哥，自己在昆明湖的浅水区猛地跳了下去。有一个姓郭的大哥哥，当时正坐在岸上休息，看到老三跳下去之后，很久没有浮上来，却看到血漂了上来。他急了，一个猛子扎下去，摸到了老三。老三沉在湖边的水底鹅卵石上，大哥哥急忙把他拽上来。上岸后，老三昏迷了，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口子。大哥哥背着老三就跑，老四在后面跟着跑。

当时，颐和园门前有一个解放军开的诊所。到了那里以后，老三已经苏醒了。军医叔叔立刻给他上药、缝针和包扎，免费治疗。包扎以后，姓郭的大哥哥又把老三背回来，送到家。

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下班。我先生和我当时上班的地点就是现在的中央党校大院学员区，家住在颐和园的对门，当时叫作中央党校南院。从办公地点走到家，一般是二十多分钟。我通常是不骑车的，爱走路锻炼。

在颐和园往香山去转弯的路口上，当时有一个大镜子，老四站在那里。我看他很紧张，脸色也很苍白，就问：“老四，你在这儿干什么？”

“等你。”他很紧张地说，“妈妈，你不要哭，不要怕，脑浆出来了。”

我一听，吓了一跳，立刻问：“谁的脑浆出来了？”

他说：“老三。”

我吓得撒腿就跑，他跟在我后面跑。到了家以后，我看老三坐在那儿。可能是因为头痛吧，他没有躺着，整个头上包的全是厚厚的白纱布，只露出两只小眼睛和一个小嘴巴。

我一看，心跳得更厉害了，问老三：“老四说你脑浆出来了？”

老三这个孩子平时话就少，这个时候可能是纱布把嘴捆得比较紧，也不好张嘴，所以就点了点头。我吓得马上又往颐和园的诊所跑，去问医生。老四在后面跟着跑。

我跑到诊所，立刻找医生问：“是哪一位医生给金侠包扎的？”

有一位军医走过来说：“你问的是不是一个中央党校的小孩，头摔坏了，



叫金侠？”

我一听这医生在众多患者中能够记住金侠的名字，更感到金侠问题的严重，所以就率直地问医生：“是金侠的脑浆摔出来了么？”

这位医生让我给问愣了，半天没说话，上下打量我。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后来，他说了一句：“你是中央党校的教师吧？”

我说：“是。”

他说：“真是‘行外不行’！你孩子的脑浆摔出来，怎么能那样清醒地回到家里？”

我问：“那为什么孩子们都这样说？”

他说：“你的孩子摔得十分严重，但这孩子苏醒以后始终不哭。头上有一道很长的口子，但他消毒不哭、缝针不哭，最后打破伤风针，还是不哭。我觉得这孩子太倔强，免不了还会出事，所以就对他说：‘金侠，你知不知道人的头是不能往石头上碰的。你要再不小心，下一次还这么干，摔坏了我就不给你缝针了。你看这口子摔得多大，脑浆都出来了。’”医生笑了笑又说，“脑浆没出来，是我吓唬他的。但是，你的孩子摔得特别重，要仔细观察他这几天的精神，看大脑是不是有轻微的震荡。”

这时候，我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样，心里轻松许多。向医生道谢后，我带着老四回来了。

回来后，老四对老三说：“妈妈问了，医生说你的脑浆没有出来，是医生叔叔吓唬你的。”老三微微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我先生下班，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他以后，他表现得十分镇静，并对老三大大地赞扬了一番。他说：“我的儿子都是男子汉，都是小英雄。摔了不能哭，怎么会哭呢？”在孩子重伤的情况下，他还不忘鼓励孩子，念念不忘让孩子当“小英雄”。可能也就是这种鼓励，在精神上支撑着他们。所以，老三始终不哭，不叫疼。去拆线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医生，医生很



父爱如山

高兴，说：“这个孩子有个倔强劲，以后有出息。”

这也是一种很特有的教育方式。当孩子有了大的伤痛时，爸爸鼓励他。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益的。

去年，我看见有一个孩子，样子大概六七岁，滑着旱冰，往前跑，奶奶在后面叫：“小心！别摔了，摔骨折不得了。”她这一紧张，孩子可能也跟着紧张，一下子就摔了。我这个人是很喜欢小孩的，急忙上去和老太太一起看。因为孩子滑得慢，只是擦伤了一点皮。

孩子们一生要走很长、很多的路，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大人应该做的不该是吓唬他，而应该时时注意给孩子壮胆。当然，也要随时教会孩子们做事情，包括锻炼身体，要注意自我保护，不能莽撞，要谨慎从事。



鼓励孩子玩游戏

我大儿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小时候贪玩，和小朋友赢烟盒、杏核和石子，赢回来就堆在家里，弄得满屋子都是，父母没有给我扔了、烧了，而是告诉我，收拾好放在属于我自己的角落。”（《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

我儿子讲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在他们小的时候，正处于“文革”时期，那时的中国市场上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同今天花样繁多的玩具市场比，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当时，我家的孩子没有一件像样的玩具，许多小朋友也是这样。孩子们总是要玩耍的，而玩总是需要玩具。市场不供应，他们就自己创造，就地取材。他们自己做一些东西，当作玩具，比如捡点小石头、杏核。孩子们会到大人那里去要抽完烟剩下的空烟纸盒，叠成一个一个三角或者菱形的小纸片，拿来在手心手背上翻着玩。纸片如果掉在地上，就算输了。有的时候，一群孩子围在一起，把纸片放在地上，用小手在旁边使劲拍打，如果有哪一个纸片蹦起来翻转了，就赢了。金煜很会玩这些东西，所以在我家经常看到他拿回很多这样的东西，而且常常散乱地扔在地上或者床上。

我当时想，孩子没有玩具，很可怜，这种东西一件也不能给他扔。所以，我就在他们卧室一个墙角的地上，擦干净一块地方，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里，并且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再拿回来，都要放在属于你们自己的这个



父爱如山

角落里，最好不要乱扔。妈妈也一件不给你们扔。”几个儿子特别高兴。

我还特别叮嘱我先生：“你千万不要给孩子扔了，那些东西在他们的眼里都是好玩的。”

我先生说：“得鼓励他们游戏啊，对小孩有好处。那些烟盒是玩具，又是‘战利品’，我怎么能给他们扔掉呢？”

记得有一次，我先生有空了，还跟我大儿子比试手心手背翻烟盒，当然总是爸爸输。对我爱孩子和尊重孩子的这种举动，他非常赞同。后来，我读到鲁迅《风筝的故事》，讲述鲁迅后悔当年踏坏了小弟弟自己制作的风筝的事。其中，有一句话使我感触很深，他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我看了鲁迅的话，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明智的。现在有些父亲给孩子买玩具，好像就是哄孩子不要哭，至于孩子游戏不游戏，玩不玩，他们并不管。他们认为那是小事，大人不用管。我先生对孩子玩游戏却很重视。当然，这种重视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还是真的想到了游戏的意义，我们没有交谈过。不过，我心里始终认为孩子能够多玩，起码会给他们带来欢乐。尊重他们的玩具，也是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后来，我看到沙巴耶娃主编的《教育史》，上面引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夫人、教育家克鲁斯卡娅的一段话，深深感到了孩子们游戏的意义。她说：“游戏对于学前儿童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游戏对于他们是学习，游戏对于他们是劳动，游戏对于他们是重要的教育形式。”（《教育史》中译本，第398页）所以，我先生说“得鼓励他们游戏，这对孩子有好处”，是一个好爸爸应有的见识。

“狼爸”的大儿子萧尧，在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迷上了各种植物。书上说：“无论是去植物园、公园，还是在路边，只要看到有趣、奇怪的植物，他使用刀将植物偷偷挖下来，小心地用报纸把泥土包好，再带回家种植……家里的阳台上也摆满了他种植的各种植物。”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当好的游戏，一个明智的家长是理应给予支持和鼓励的。然而，“狼爸”却说这些植物影响



学习，让孩子全部拔掉。萧尧顶撞了几句，却挨了藤条的抽打。萧尧难过地说：“对于爸爸的‘暴政’，我早已经习惯了，知道反抗也没有用。”

我们和“狼爸”一起再回顾一下鲁迅的名言：“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那种所谓的“木本植物”，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也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玩具罢了！有什么值得“狼爸”那样大动肝火，大甩藤条的呢？！

家长不要怕孩子玩，会玩可以长智慧，变得手勤、脑勤、腿勤，整个人轻松愉快。

提起四个孩子，“狼爸”说：“从小到大，萧尧一直是最让我操心的一个，他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我倒觉得萧尧很会玩，学习也很好，成绩下降是偶然的。他在童年就会玩植物、种花草；长大篮球打得又非常好。而爸爸却把玩和学习对立起来，认为影响学习，没少打儿子。

我家的四个孩子中，最让爸爸操心的是大儿子金煜。他玩得很广，打鸟、摸鱼、跳高。从小学到大学，他一直在校乒乓球队和校篮球队，有时把握不住分寸，自己爱受伤，有一次还伤了别人。可是，我先生从来没有打过他，连打的念头都从未有过。

金煜小时候很爱玩，也会玩，常常带一帮孩子玩。我有些担忧，怕他闯祸。我先生总对我说：“不要忧心忡忡，孩子还小，会越来越懂事的。往前看，淘气也不完全是坏事。玩耍是孩子的天性。”“慢慢来，别着急。他会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如何掌握分寸的。”“有信心，才会有耐心，再花点苦心，多提示就是了。”应当说，在他的提醒下，我们对孩子都十分有耐心。

金煜在接待记者采访时，曾说：“我小时候很淘气，不好管教，在幼儿园里不睡觉，到处跑，被老师罚站。”（《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年3月11日）金煜在幼儿园的外号叫“小闹”，不大好管，属于“问题孩子”。



父爱如山

金煜是1959年9月27日出生的。按北京当时的规定，小学一年级只收满七周岁的孩子。金煜不满七周岁，不能上学。可是幼儿园的大班最高只收六周岁的。这样金煜就不得不在家里待一年。他身边最要好的小朋友都上学了，他只能同一些和他一样不能上学的小朋友在院子里一起玩，果然是接连不断地出事。

第一次是一个星期天，金煜竟然爬到党校礼堂东面的教室窗台上。窗台很窄，他站在那里，很危险。但小孩不知天高地厚，满脸得意，显得自己是个英雄。

小朋友也不懂危险，反而说：“金煜，你有本事就从那里跳下来！”

窗台离地面两米多高，小孩不知深浅，金煜竟然真的跳了下来。下面的水泥地很硬，他跳得又猛，脚扭伤得很厉害。虽然没有骨折，但却不能走路。有一位熟人见到了金煜，赶紧把他背到我家。我们带他到校医院上了药，休息好一阵子。

第二次，脚伤刚好不久，他在外面跑着玩时，摔倒在一块破缸碴上。我们赶到时，看见金煜蹲在那里，腿上满是血，伤口往外翻着，像小孩的嘴一样。当时，我不知所措，我先生说：“我们马上用自行车带他上校医院包扎。”爸爸驮着他，我们一起到了校医院。医生当即要了校车，把金煜送到海淀区医院。外科医生见情况严重，不能一般包扎，于是在腿上正面缝八针，侧面缝四针。处理后，我们回家给孩子吃了消炎药，安抚他躺下休息。

随后，我先生和我走到我们的卧房。我对先生说：“金煜把我搞得胆战心惊，这孩子这么淘气，可怎么办呢？三天两头就得受点伤。”

我先生说了一句我料想不到的话：“孩子会玩有智慧，不要怕淘气。淘小子出好样的。”他又安慰我说，“平时多叮嘱他小心就是了。不过，你放心，他不会总这样受伤的。一年比一年长大，自己会慢慢知道深浅的。”听到他的安慰，我心里稍微宽松了些。



但没过多久，又出事了。这一次把我吓得更厉害。

一天上午，他满腿鲜血地跑到家。他一个人在中央党校院内玩，走到东灶食堂时，一群住在 41 楼的工人子弟在后面叫喊：“打黑帮崽子。”他们一边追，一边打。没有一个好朋友在身边，金煜自己反抗，被打得遍体鳞伤，腿也被打出了口子，鲜血直流。孩子见到姥姥哭了，姥姥迅速通知我们。我和我先生赶到家，急急忙忙又一次陪他上校医院治伤。“大人挨斗，孩子跟着遭殃。”这就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所谓“红色恐怖”气氛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

一段时间里，我对“淘小子出好样的”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但这一次却感受到了。我的淘气儿子是真有胆量，遇事不屈服，蒙受欺负与侮辱时，能够反抗，坚持跑回来。虽然他受了重伤，我很心疼、难过，但多少也感到一些骄傲。

这一次，我倒是反复地考虑了我先生的这句话，心想：“金煜这个淘气的孩子，说不定长大会有出息。”

“会玩的孩子有智慧”，这句话似乎好理解一些。因为会动脑子的孩子，才能够玩得更“高明”。金煜打鸟比同时玩的孩子打得多，摸鱼也总比别人摸得多，学习也比别人学得好。

然而，我还是对先生说：“你可别把‘会玩的孩子有智慧’，‘淘小子出好样的’这两句话跟金煜说。一说，他以后更得淘了，搞不好，会不可收拾的。”

我先生说：“那当然不会。”

金煜“能玩”“淘气”使我始终很揪心，因为我家坚持不打孩子、不骂孩子，一直坚持对孩子说服教育的原则。然而，金煜经常因各种原因而导致身体受伤，不能不引起重视。我们跟他谈过多次，也讲过很多道理，但总是解决不了问题。我是学哲学的，“性本善”“性本恶”两种说法争论了几千年。我看金煜心地善良、宽厚，自小就是个“乐天派”，觉得这孩子好像是“性本善”。但是，他又比别的孩子都淘气，玩起来猛得没边，生气起来就跟人家拼



父爱如山

命。想到这里，我十分忧虑：我们的儿子性格这样矛盾重重，可怎么管教得好啊？能像他爸爸所说的吗？淘小子还能出好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多次和我先生探讨。

我先生告诉我：“金煜只不过是玩得厉害，不太懂得分寸罢了。”

我问：“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懂‘分寸’呢？”

我先生说：“慢慢来，别着急。他会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如何掌握分寸的。”

金煜上小学还是很淘气，尤其到河南“五七干校”期间，成了“打群架的孩子王”。但是，我们和老师相互配合，极力抓他的学习成绩，他的兴趣更多地转移到书上。

他淘气、受伤的毛病日渐收敛了。在“五七干校”的农村小学，同学们选举他这个“孩子王”为班长。在学校里，老师教他怎么做好班长；回到家，我们让他在家也当“班长”，要求他：“把你带领打仗的那帮小朋友都变成好孩子。”可能由于这种家庭和学校的共同努力，最后金煜变成了班上的“好带头人”，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他就更懂事了。那时候，他不再没有分寸的淘气，而是把这股劲头转移到课内学习上。金煜高中全年级考第一，老师让他在101中学介绍学习经验。他在课外学乒乓球、篮球，假日和叔叔们一起去钓鱼。

从金煜的身上，我深深地感到孩子的可塑性是非常大的。淘气的孩子会变好的；淘气的孩子会玩，还会带着别人玩，说明他有智慧；在玩中，他也在不断地锻炼聪明才智。只要家长引导好，孩子会将这一切都用到正经的地方上。

我在全国的巡回演讲中，有人提出：“你家孩子怎么都成了博士？是不是自幼都非常听话，服从管教？”她还接着问：“我的孩子可特别淘气，怎么办？”

我说：“哪有自幼就非常老实，服从管教的孩子？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



小孩子天性就是玩，玩得厉害就是淘气。”我还对她说：“要有信心，我的几个儿子都是比较淘气的，可能大儿子是最淘气的了。”我还告诉她：“可能，你还要和自己的先生很好地配合。”

她说：“我先生一急就是打。”

我说：“请转告你的先生，千万不能这么做，这不仅使孩子皮肉受苦，在心灵上也会留下创伤。他也不会服输，不会自觉地去改正错误。要让孩子爸爸和你很好配合，心平气和地想出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

我还希望他们对孩子有耐心，说：“我先生一直很有耐心，总是同我配合，并不断地提醒我，对孩子不要失去信心。有信心才会有耐心。”

最后，她向我表示感谢，说我给她鼓了劲。



学一样，精一样，狠练基本功

孩子不论学什么，父亲都应帮助和鼓励“学一样，精一样，狠练基本功”，浅尝辄止不可取。然而，基本功要在实践中练。学习要将书本结合实际，去观察、体验、实践，才能够学好，学一点精通一点。不管是文化知识的学习，还是体育锻炼，都应如此。

上面曾谈到，“狼爸”的大儿子自小很热爱自然，特别是植物，还愿意结合实际，在阳台上种不少蔬菜、花草。这本是从书本向实践迈开了第一步，也是精通学业很好的一步。可是，“狼爸”却认为这些东西耽误学习，逼着孩子全部拔掉。孩子心疼地拔掉了，心中留下了遗痕。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我先生帮助、引导、鼓励孩子在实践中学习，特别注意让孩子亲自观察、亲身体验、自己经历。

我家小孩学游泳很有意思。每个孩子年龄不一样，老大和老二以及后来的孪生兄弟，他们之间相差大约都有三岁。所以，孩子学游泳的起步时间不一样。但是，刚开始学都是由父母二人一起带着下水，用一个小救生圈，陪他们在水里“扑通、扑通”。

后来，每个孩子开始学游泳的时候，我们都征求他们的意见，要学什么姿势。我先生一直是游侧泳，虽然侧泳游得很漂亮，但其他泳姿不会。我的蛙泳游得距离很长，但不会侧泳。每个孩子学游泳起步时，有一个很奇怪的



现象，一问他们学什么姿势，是跟妈妈学蛙泳，还是跟爸爸学侧泳，他们都说：“学蛙泳。”

他们还讲了理由：“打起来，能把头露在外面，手会托枪”，“到河里，谁要淹着了，还能救人”。

我先生说：“你们也学点侧泳吧。”

可是他们都不学。所以，我就成了几个孩子的蛙泳“教练”。孩子们学得很快，进步也很大。

蛙泳掌握得比较好的时候，爸爸又提出来：“你们游泳姿势多一些，能够休息。”于是，爸爸主动地教他们侧泳。可也奇怪，他耐心教，孩子也热心学，但侧泳游的姿势似乎都有问题。后来，我先生说：“可能我的侧泳不专业，是自己练的，也给你们讲不出更多的道理。还是跟妈妈学游蛙泳吧，你们讲的托枪、救人，也有道理。”



爸爸一直到七十多岁还游泳

当时正是毛主席号召“准备打仗”的年代，流行“武装泅渡”的训练，不仅是部队的军人和民兵，一般的青少年也搞这种训练。所以，我先生看到孩子有自己的爱好，也没有勉强他们一定要学侧泳，只是支持他们学好蛙泳，而且告诉他们：“学一样，就要精一样，把动作学正确。动作对头，基本功好，你们就会游得很远很远。有紧急情况，才能真正有用。”

为了让孩子学好蛙泳，有一个星期天，爸爸和我带孩子上颐和园去玩。他特别租了一条小船，让几个孩子上船，由他划，我在下面游。他对我说：“这一次对你的体能和耐力做个测验，能游多远就游多远，游累了就上船。让孩子们在船上好好看看蛙泳动作，学得扎实一些。”于是，我们从“排云殿”



父爱如山

出发到“龙王庙”，在“龙王庙”没有停，又转划回“排云殿”，也没有靠岸。

我先生问我：“累不累？”

我说：“不累。”

我当时年轻，体力好，也可能是由于在水里活动开了。人游泳有这个体会，一旦活动开了，游再远也不感觉累，而是感到非常舒服。所以，“排云殿”没上岸，他又接着划，我也接着游。一直到“石舫”，我们才上了岸。

在这长距离游泳的过程中，我都是把头露在外面的，可以跟孩子说话，能够开玩笑。而我先生很注意给孩子们讲妈妈的游泳姿势，告诉他们，看看妈妈的手脚是怎么配合的，以及为什么会那么轻松。实际上他用我做样本，给孩子当教练，讲蛙泳的游法和一些基本功。

由于我家的这个快乐的“老教练”这样耐心地同我配合，最后几个孩子游泳都游得相当好。大姐姐十几岁时，蛙泳就游得特别轻松、快捷，像飞燕似的，而且还学会了仰泳；老二九岁就在松花江里救了一个快淹死的落水儿童，受到表扬；老三虽然曾摔破头，但好了以后，仍继续到颐和园游泳；老四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冬泳爱好者队伍的队员。



学习与健身要兼顾

孩子的健身必须引起充分重视，要做到学习与健身两不误。健身是学习的资本，是学习的智力源泉，是学习的大脑供血库，是精气神的充足氧舱。

“狼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偏重孩子的知识学习，而不注意孩子的健身。他制定了许多家规，就是没有一条是关于健身的。他说：“我的家规归纳起来，就是‘几不许’——不许看电视，不许自由上网，不许随便喝可乐，不能随便打开冰箱门，不能吹空调。”

我们家把健身看得十分重要，省吃俭用也得给孩子攒钱买健身器材。

我先生和我是在 1952 年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的老同学相识、相爱的。1953 年，我们回到哈尔滨，哥哥问了我们的情况以后，说：“你们两个都是爱学习的人。但你们不要光学习，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不然学习也学不长久。”哥哥的话说得语重心长。当然，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鞭策。我这唯一的哥哥，从小和我感情特别好。当我们离开哈尔滨的家时，他送给我们二人每人一件礼物，送给我的是一双很漂亮的女式冰鞋，送给我先生的是一双皮子上等的男士冰鞋。

哥哥还叮嘱说：“回去看着哥哥给你们买的冰刀，就会注意锻炼了。锻炼好了，你们的学习会更上一层楼。”

哈尔滨是北国的冰城，滑冰的季节很长。所以，哥哥给我们买的冰鞋，质量都相当好。在当时来说，价钱也比较高。



父爱如山

他还说：“妈妈觉得春明有点瘦，你也不胖，你们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要吃好、睡好，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休息。”

我们东北局党校的操场里有一个滑冰场，修建得较好。回到沈阳以后，我们每天一有时间就到那里滑冰。星期日、午休时间、晚饭前，我们都去练习滑冰。所以那几年，我们的滑冰技能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在东北局党校毕业以后，曾经到一个大学去教书，后来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班。恰巧这时候，我先生请求领导批准，从东北局党校考入了中央党校的师资训练部。于是，我们二人一起到北京学习。北京的滑冰季节虽然比较短暂，但是，除了晨跑以及我作为人大的校排球队员练球以外，其他时间都在滑冰。

虽然是同时起步，但我先生滑得比我好。我只是锻炼身体，出一身汗就满足了；而他除了锻炼身体之外，还特别注意技巧。所以，我先生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1956年正赶上中直机关（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联部、中央党校等）召开冬季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我先生就是穿着哥哥赠送的冰鞋，参加了四百米的比赛项目，获得第三名。当时参加比赛的人很多，获得第三名是很不容易的。回来后，他高兴地给我看所发的奖品。虽然只是一件秋天穿的薄运动衫，但是我印象却很深刻，是蓝底白字的，袖子上带有白道，很漂亮。我们俩当时很高兴，激情满怀地吃了一顿饺子，庆贺了一番。

我生了孪生儿子之后，可能由于失血过多，又工作忙，家务累，所以每天都头痛。为了能坚持工作，缓解头痛，我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孩子都在熟睡的时候，就到校内的人工湖滑冰四十分钟，常常冰场上只有我一个人。开始冰冻得不牢固，我还有点怕，但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冰就结实了。等我滑完冰回来时，孩子们正好起床，于是帮孩子穿好衣服，再做其他家务，什么也不耽误。



可能因为每天都去滑，再加上冰鞋已经用了一段时间，我那双漂亮的小冰鞋后来“张嘴了”，不能穿了。家里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太好，买一双冰鞋是很困难的。我先生说：“你试试我的冰鞋，看能不能穿。”我试了一下，虽然大不少，但前面塞上棉花，穿一双厚袜子，也还可以穿。后来，我就每天穿着他这双大两号的冰鞋去晨练。

我先生对自己的东西，保管得十分精心。那时候，这双冰鞋还是黑亮黑亮的，一点都没有坏。这双冰鞋我穿过以后，也保护得很好。后来孩子们上了大学，我们的家境一有好转，就给在北京念书的三个大学生每人买了一双冰鞋，希望他们像我们当年那样，学习的同时也不忘锻炼身体。

本来我们也想给在青岛海洋学院学习的老二买一双冰鞋，当时在电话里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告诉我们：“学校没有滑冰场，买冰鞋用处不大。”可能因为青岛的天气更暖和，结冰季节太短吧。后来每年冬天他放假回来，和两个小弟弟去滑冰时，都穿着爸爸这双二十多年的老冰鞋。爸爸五十岁以后就很少上冰场了。老二脚上那双冰鞋几乎成了我家的传家宝，倒不是什么贵重的传家宝，但它在我先生、我和我们的后代身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先生这双冰鞋，传递着一种精神，传递着我家克勤克俭的家风，也传递着我们对孩子的一种寄托。一双冰鞋在现在来说算不了什么，不过几百元，再好的也就只是上千元。但是，像我先生这样的一双冰鞋，能为我家两代人的冰上运动做贡献，能在我家大人和孩子的心中刻下那样深的烙印，恐怕不多吧！



老二金煜（中间）脚上那双冰鞋是传家宝，
老三金侠（左一），老四金延（右一）



父爱如山

我们的四个博士儿女，也在教育子女上传递着热爱运动的精神。

老三金侠在女儿三岁时，就把她拉到滑冰场上去学滑冰。老大金煜的女儿也在七岁时，就上了冰场。这些孩子今后一定会在学习中运动，在运动中学习，做到学习与健身两不误。



和孩子一起增强体能

爸爸和孩子一起锻炼，互教互学，是家人健康、家庭温暖和谐的好办法。

“狼爸”不太提倡大人孩子一起锻炼。不仅这样，他还坚决杜绝孩子参加课外活动，限制孩子的体能锻炼。有一天，看见萧尧在篮球场打球，他立刻制止了。萧尧说：“上了一天课，很想运动运动放松一下，我很长时间没打了，我就打一会儿，也就半小时。”爸爸说：“半小时也是时间！半小时的时间，你可以背多少单词，写多少作业？”

当时，萧尧虽然服从了，但心里并不服。后来他说：“其实我学习成绩下降，跟打篮球没有直接关系……我看爸爸的目标就是把我培养成跟他一样的身材。”我家的四个博士，都是很小就学习打乒乓球，喜欢乒乓球。而老二和老三最喜欢乒乓球，又坚持锻炼。他们到了大学，双双成了校乒乓球队的队员。

小时候，我先生和我是他们的家庭教师。我先生非常认真地履行他这个教师的职责，经常在练球的时候叫孩子一起去练习。家中多年来都有乒乓球拍，而且不止一副。

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人的乒乓球打得并不好，除了自己锻炼身体，就是想引起孩子锻炼的兴趣。有一段时间，我还请我们校内参加过体校正规训练的韩旭畅老师指导我的两个儿子。我先生和我做他们的“陪练”。两个儿子乒乓球打得都很好。当他们在学校里接受了老师的正规训练后，有很多动作打得非常漂亮。他们有时候回来说：“妈妈爸爸打球的动作不标准”，“抽球的姿



父爱如山

势不对”，“抽球的胳膊太开，需要挥小臂”……孩子还开玩笑地说：“妈妈抽球真难看。”我也开玩笑地回敬他们：“再难看，可把你们都带出来了。”话虽如此说，但我心里是高兴的，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孩子们的意见。

这个时候，我先生和我又反过来向儿子学习，向他们学习那些标准的动作，但积习难改，进步不大。有一句成语叫“教学相长”，其实在家里也是适用的。父子互学，其乐融融。

尽管我打得不标准、不好看，但是我先生一直很支持我，鼓励我参加比赛。他说：“重在锻炼。”在我参加比赛时，他常常以极大的兴趣观看。

孩子们到大学的时候，乒乓球技术进步飞快，经常参加比赛。他们回来再同我们一起打球，我们就离他们的水平太远了，上去没有几下子就会被打下来。

我先生站在旁边看老二和老三打球，对我说：“看着孩子的进步，真是高兴。”

我笑了笑说：“你这个‘教练’爸爸有功啊！”

他也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忘了你这个妈妈也是‘教练’？”

有不少人问我们：“你家的孩子怎么学习好，身体也那样棒？”这时候，我总是很欣慰。我们几个儿女的个头都超过了我们。大女儿一米六八，在当时的女孩子当中属于高个头。老二一米七八，老三一米七九，老四一米八四。孪生兄弟的老三在他的同学当中，也算是高个头。但他总觉得有点遗憾，不如孪生弟弟老四高。但是，我家孩子一走出去都是大高个儿，而且身体很强壮。爸爸在他的同龄人中本来是高个子，但三个儿子都超过了他。我在我们同辈的女同志当中，个头也算比较高的，但是女儿又超过了我，我成了家里身高最低的人。

所以，对于人们提出的问题，我总是说：“让孩子多吃、多睡，猛锻炼。”

我家的孩子向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补养，吃得都很一般。因为在相当长的



时期里，国家的供应状况和家里的经济收入都受限制，能吃饱就不错了。所以孩子们在儿童时期从来没吃过什么营养品。但是，他们吃得多，吃得香，每上饭桌都抢着吃，像几只小老虎似的。我家从来没有孩子不吃，大人逼着吃、追着喂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锻炼得多，锻炼时间长，强度大，所以食欲好，饮食的需要量大，人也长得强壮。

人的身体是一个载体，是干好一切事业的基础。有了一个好身体，脑子供血足、供养足，对学习大有益处。我们的孩子学习都显得比较轻松、愉快，而且成绩优秀，就是因为从小就锻炼出了好身体。



让孩子自幼经受各种“洗礼”

“洗礼”是一种宗教仪式的称呼，我们不信宗教，也没有带孩子接受过宗教洗礼。这里只是用来形容人的一生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变故和际遇，以及各种形式、大大小小的考验。无论何种情况，为人之父者都要教会孩子勇于面对，思考和学会如何去应对，千万不能控制孩子、束缚孩子，造成思想禁锢、心胸狭窄、自我封闭，最终妨碍孩子成长。要做到这些，首先需要爸爸理性，遇事会冷静沉思，不感情用事，善于将感性的东西升华为理性的认识。社会上有恶人、丑事，但不是整个社会的全部，绝不能以偏概全，限制孩子对社会的接触。其次，相信别人，特别是老师的良好意愿和善举，不拒绝别人带着孩子认知世界。

“狼爸”不是这样，他的大儿子萧尧说：“学校、班级、同学组织的活动，都会被爸爸说成是‘不安全的’‘不良的’‘有不好影响的’‘没有必要的’！”“狼爸”自己也说：“我无法让我的孩子独自或者由他人领着去认知世界，至少在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过程中，我需要知道这一切是我所能控制的，他们是我所能控制的。”这种话似乎反映了一个爸爸对自己子女极强的控制欲，缺乏基本的信任和信心。

我先生的身上表现出一种大丈夫应有的理性，他主张让孩子自幼就大胆地往前闯，父母少一些忧虑、控制和阻拦。

人们说我是一个很有理性的妈妈，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可是比较起来，



我觉得自己和我先生还有很大的差距。在教育孩子上，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他都能讲出一些道理，显出特有的冷静和深思熟虑。

而我的理性中却夹杂着女性的胆小多虑。我对第三代格外小心，特别对我最小的孙女。她爱学习体育项目，比如冰上舞蹈、滑冰、滑雪等。孩子穿得很单薄，参加冰上跳舞比赛，我担心冻着；滑雪又怕摔着……总之，忧心忡忡。

有个星期日，二儿子金侠打来国际长途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今天卓安娜滑雪了。”本来是应和儿子同喜同乐，可是我却未假思索地说了一些泼冷水的话，大致是：“她才四岁，学滑雪，太小了吧！”“那大滑雪板，她能控制得住吗？”“可别摔坏了。”

我儿子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一再强调：“有小孩子的滑雪板，我们还想给她报名参加小孩滑雪训练班。”

2005年3月7日上午，二儿子金侠又来了电话。电话里，儿子又是高兴地告诉我：“卓安娜今天和培训班的孩子们一起滑雪去了。”

我急忙问：“是你们陪着她吗？”

儿子说：“不用家人陪，孩子自己滑，有老师教。”

接下来是我们的对话：

“滑雪还是太小了！才四岁。”

“没有关系，快五岁了。”

接着，我很不理智地说了一句：“要在我的身边，怎么也舍不得让她这么小就去学滑雪。”

儿子笑了笑说：“年龄小，学得快。”

放下电话，我觉得他这个爸爸谈话很轻松，特别了解孩子从小锻炼的好处，显得十分理性。这种理性显然来自他的爸爸——孩子的爷爷。

可是，我这个奶奶出现了无穷的忧虑：卓安娜是不是又去滑雪了？每周滑



父爱如山

几次呢？可别摔着，小胳膊、小腿经不住……

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一天夜间，我梦见卓安娜在一个空旷的雪地里，穿着一双长长的滑雪板，站在那里哭。周围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女老师在那里给她解滑雪板的鞋带，并说她自己不会解，已经哭好久了。我听后特别心疼，一下子醒了，再也没有入睡。

第二天吃早点时，我对我先生说了夜里的梦。我先生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就是想得太多了，其实不必挂念。”他又说：“卓安娜的爸爸妈妈都会滑雪，滑得也都很好，能够掌握得住。你想想看，当初咱们孩子小的时候，你就把他们带到中央党校的游泳池去游泳。别人不也说怕淹着吗？主要是你会游泳你不怕。咱们孩子学滑冰的年纪不也挺小吗？现在是你不会滑雪，一听孩子学滑雪，就感到很可怕。”

我先生的一席话，使我想起当初我们的孩子学游泳时，我母亲就一再对我说：“孩子太小，能行吗？大点再学吧！”我也总是对我母亲说：“越小学得越快，妈妈放心吧！”今天想起来也很可笑，我在重复我母亲当年的忧虑，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方面，我先生很显然胜我一筹。



搞好素质教育，让孩子全面发展

综合素质教育，是整个教育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家庭教育好坏的风向标。搞好素质教育，为孩子一生的发展打下了一个牢靠的基础。

我先生和我在教育孩子上有个共识，就是特别强调孩子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先生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解毛泽东所提出的教育方针，也就是下面一段话：“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今天虽然有的人对毛泽东这个教育方针提出疑义，但我们还是认定这个方针是对的，需要坚持的，特别是德智体必须全面发展。我认为我先生的这种强调以及对孩子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我也在日常生活中、家教中努力贯彻这种综合素质教育。

“狼爸”和我们其他的父母不同。他不崇尚“综合素质教育”，而崇尚“打”。在同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香山郊游时，大家谈起了孩子。有的朋友说自己常常和孩子“沟通交流”，“做朋友”，“狼爸”不以为然。当朋友说他的孩子教育得好，让他介绍经验时，他说：“他们全都是打出来的！是硬生生打出来的！”“狼爸”认为：“一席话，虽然没能够震住在场的众位朋友，但是也更加确认了我内心的教育理念，就是要破现今的所谓‘素质教育’！就是要让大家更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传统教育，才能救当下的青少年。”

“狼爸”所说“现今的所谓‘素质教育’”，实际是指今天所提倡的“综合



父爱如山

素质教育”。这种教育要求培养素质高的优秀人才。这种人才，靠打是打不出来的。而且他把“传统教育”只概括为一个“打”，这也是对我国传统教育理念的扭曲。不难看出，“狼爸”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很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打着“中华传统教育”的幌子，实则摒弃了“传统教育”的精华，并将其中的糟粕发展到极致了！

我家孩子爸爸曾说，没有“综合素质教育”，对孩子的培育很容易走向歧路，出现偏差，做出误导，使孩子成为一个畸形的人。特别是当我看到斯特娜夫人尖锐的，也有几分对畸形教育所做的批评，更觉得我先生的考虑是非常必要的。斯特娜夫人讲：“理想的人是品德、健康、才能三位一体的人。只重视体育，孩子将成为可悲的兽人；只重视智育，孩子会成为弱不禁风的病夫，或者成为社会上的恶棍；然而只重视品德教育，孩子会成为懦夫。这种人对社会，对人类都是无用的。因此，孩子的教育必须三方面并举。”（《早期教育和天才》中译本，第 175 页）

我的四个博士儿女都非常感谢我们，感谢我们的辛勤哺育。他们认为这种基础教育，使得自己全面发展，为后来学业的成就以及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的大儿子金煜在接待报社记者采访时说：“我家出了四个博士，没有什么仙丹妙药，我看就是重视抓基础。父母从来没对我们提出过高的希望，只要求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教会我们游泳、打篮球和乒乓球，这些就是教给我们基本的生存能力”，“我们的成长与神童一点联系都没有，就是小时候父母给打的基础好”（《终生难忘的教诲》，《南国都市报》，2002 年 3 月 11 日）。金煜多次谈到这个“打基础问题”。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与上海东方卫视到我家做电视片的时候，正赶上金煜回国办事，他又一次谈到感谢爸爸妈妈教育他们全面打好基础。

这种给孩子打好基础的教育，就是我家在家教中的“综合素质教育”。这



对我们四个孩子的成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的儿女们又把爸爸妈妈这个经验传授给他们自己的子女们。当然，他们的子女有的是独生子女，处于美国那个同中国不同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大环境中，现在生活条件又比较优越，教育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他们还是顽强地坚持着。

金煜曾对记者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孩子的生活条件太好，使他们很难有心思坐下来啃书本，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容易教育。现在我有两个孩子，我只是让孩子学会基本的技能，打好必要的基础。”

给孩子们打好基础，这是我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当然也是我的一贯的思想。我们认为，这是为人父母者必须承担的责任，不能轻易推开自己的孩子，或者随便把孩子送出去，转嫁义务，由别人代替你来承担这个责任。

这里顺便回答一个不少家长关注的问题。在这几年的讲课过程中，我和我先生接受过很多次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台的采访，回答读者热线，还曾经到演播厅去做过节目。在诸多的场合，常常有爸爸妈妈提出什么时候把孩子送出国外去学习比较合适。看来出国留学已成为不少父母关注的热点。

我先生在回答时，总是直截了当地表示：“读完大学，考研究生的时候把孩子送出去比较合适。”他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那种过早地把孩子送出去的做法，指出：“有些家长小学或中学就千方百计地攒钱、往国外送孩子读书的做法，对孩子并不见得有好处。很多时候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只是就通常情况而言。如果国外有亲人照顾，或者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小适应外国的语言环境，就另当别论了。”

2003年，法国留学生中出现一件事，令人很不愉快，也让人为现在的一些留学生感到担忧。2003年7月20日晚，法国留学生的一个公寓，遭到了抢劫，不仅给学生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有的女孩子在事情过后，还惶恐得不能入睡，每天特别紧张。像这样的学生，很可能精神上会出现一定的毛病。这件事也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猜测和



父爱如山

不安。所以，一家驻法报刊的记者走访了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白章德参赞。

这位参赞所谈的话特别中肯，他要求家长和孩子做好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后再出国。他说：“有些家长跟风跑，硬将子女送出国，造成一些学生在外国因压力过大精神出问题，或学习跟不上，在外打工混日子。”谈到什么年龄段来法国留学最好，白参赞认为：“来法的最佳阶段是大学毕业，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世界观基本形成，有了判断是非的能力，能较好地适应变化的社会生活。利用大学阶段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加深了解，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很有好处。年龄过小则不容易把握人生方向，独自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容易出现偏差，而且大学毕业后出来也比较经济。”（《参考消息》，2003年8月14日）这位教育参赞的看法，同我们对自己孩子们出国留学实践的切身体验，是完全一致的。孩子出国留学是一件关乎整个家庭特别是他们自己一生的大事，一定要多方考虑，反复研究，审慎决定，千万不要听风逐潮，轻率行事。否则，也许会把好事变成坏事，甚至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耽误了孩子的一生。

孩子不出国，在国内也会事业成功。俗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关键是要打好基础，抓好综合素质的教育。



后 记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狼爸”自称是“天下最好的爸爸”，不知是通过哪些资料同天下父亲做过鉴别，究竟通过多少父亲和自己做了比较？

2012年，“狼爸”萧百佑做客江苏教育电视台。没想到在现场就遭到众多专家学者的尖锐质疑，不过“狼爸”毫不示弱，坚称自己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我是天下最好的爸爸，我应该叫‘好爸爸’。”

记者问：“‘狼爸’称呼是怎么来的？你自己会叫自己什么？”

“狼爸”答：“‘狼爸’这个称呼是一位好友起的，只是一个符号，不存在褒贬。如果给自己起外号，我认为应叫好爸爸，即天下最好的爸爸。”

“狼爸”称自己是天下最好的爸爸。我不敢说我先生是天下最好的爸爸，但说是一个好爸爸，当之无愧。这从孩子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来。

一次，在纪念我先生的生日时，接到一封从加拿大温尼伯市寄来的邮件，是老四金廷的信，祝贺爸爸生日快乐。随信寄来一个生日卡。信上说：“我在杰乐斯（音译）商店找了半天，挑出了这卡片。它中间的短诗，最能代表我的心情。”

于是，他翻译了生日卡上的短诗。诗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不说它，

像我们能够做的那样多。



父爱如山

但是，在我们的心中，
您的位置仍然很高。
我们赞赏您，敬重您，
非常爱您。
我们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虽然我们不曾告诉您，
您有多么特别重要。

直到像这样的一天到来。
我们希望您知道
我们多么看重，
照亮我们生活的父亲。

金延还满怀激情地写道：“最后，还想再对您说一遍，您的确是个好父亲。有您这样的父亲，我感到很幸运。”信上还说：“我、老三、哥哥、姐姐，所有的孩子都非常敬重您，爱您。”

从这封信与生日祝福卡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先生是个对孩子情深意长的好爸爸。这是我全家的共识。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存留我经历的各种美好的记忆，留下孩子爸爸对子女的谆谆教诲，留下他那勤奋、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留下他的那种善良的心与人格魅力，以传给我的第二代、第三代……然而，我更大的企盼是，希望普天下的孩子都有一个好爸爸，都有一个情深的爸爸。

感谢为我出书辛勤操劳的出版社的编辑，感谢我的女儿、三个儿子与三个儿媳阅读初稿并提出意见。当然，更要感谢助我成书的该书的主人公——我的先生！他虽然不愿意自己写自己，但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始终给



父爱如山

予我关心和帮助，帮助我酝酿和构思，帮助我共同回忆那些难忘的时光和至今谈起仍历历在目的往事，帮助我进行文字上的修订。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两个人教育孩子的共同回忆。

李振霞

2014年6月修改于上海